

炎黄春秋



梁少群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入府后
与夫人就澳门内人们和平政策

“文革”中章士钊忧国上书
谭震林清廉的一家
国共秘密使者张子华
船王董建华和他的父亲
他看守张学良25年

童小鹏谈：
西安事变中的周恩来
陈独秀秘书黄玠然谈：
大革命前夜的陈独秀

1997

1

总第58期

《老将军寄语青少年》 编辑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12月6日,《老将军寄语青少年》编辑出版座谈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这一活动是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公共关系部与京华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出席座谈会的老将军数十人。

①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冯征同志讲话。

②出席会议的部分老同志。

③老红军代表莫文骅同志讲话。

④京华出版社社长齐立讲话。

⑤少先队员向老同志献花后请老同志签名留念。

1997/1 (总第 58 期)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锲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 社 长: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洪 炉

执行主编:刘家驹 王恂 舒元璋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简祖扬 李华鹏

理 事:敖立本

秘 书 长:徐 孔

副秘书长:段向群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邮编:100802 电话:66170955

排版:北京维科电子技术研究所

印刷:丰润县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
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M

出版日期:每月 8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 价:4.00 元

目 录

②新年寄语 本刊编辑部

春秋笔

③童小鹏谈“西安事变”中的周恩来 陈清泉

⑨“文革”中章士钊忧国上书 许门友

⑪红四方面军铁流三千里 朱秀海

⑬陈独秀秘书谈大革命前夜的陈独秀 辛 平

⑲《三上桃峰》的被诬与平反 陈英茨

英杰谱

⑲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 倪良端

⑳同盟会首名会员曹亚伯 汪承武

㉓罗炳辉将军在淮南 周世民

㉔张云逸与红军第七军 张广华

殒星篇

④①国共秘密使者张子华 韩培基

④④谭震林清廉的一家 邓湖生

时代风

④⑥老科学家陈芳允 60 岁入伍 马京生

④⑧珠海的“土地神” 刘宏伟

人海浪

⑤①李立三和他失落的女儿 李思慎

⑤⑤汉口故里,蒋介石未来魂归处 徐 刚

遗闻录

⑤⑧他看守张学良 25 年 窦应泰

赤子心

⑥①“保钓号”保钓吟悲歌 祖 范 忠 诚

⑥④船王董建华和他的父亲董浩云 吴跃农

同心结

⑥⑦斯特朗热爱中国,苏联克格勃生嫉 舒 云

⑦①华人文杰王方宇在美国 甘耀稷

古今谈

⑦③李准率水师驱出入侵西江英军 杨肇林

⑦④上海滩青红帮元魁张锦湖传奇一生 肖 石

文荟园

⑦⑦百岁剪纸艺术家胡家芝 王明永 许康波

编读窗

⑦⑨于光远、李庄、李普、张黎群谈《炎黄春秋》

“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不觉中新的一年又来临了。在1997年一月号杂志付梓之际，特向广大读者、作者和所有给本刊以支持的人们致以节日的祝贺。这里，我们简要谈谈新的一年的打算，以求得到大家的理解、支持和监督。

本刊创刊时就明确了的办刊方针，五年多工作实践中形成的刊物的风格，已为广大读者所熟知、所认同，我们将坚持不变，一以贯之。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既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又为我们展示了广阔的活动空间。我们一定要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这篇大文章做好。

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人民，爱自己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要搞好爱国主义教育，就有一个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萧克同志不久前在《长征大事典》序言一文（见本刊1996年12月号）中再次强调，研究历史应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最重要的就是力求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的真实”，“必须‘求实存真’，不能作违心之论”。以主要篇幅评介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炎黄春秋》，始终把“实事求是”作为办刊准则，须臾不敢懈怠。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还注意了“有错必纠”，注意了不同意见的发表。毛主席曾就学术上的论争问题说过“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话（1965年7月18日《致郭沫若》）。邓小平在重申“双百”方针时，谈得更为具体：“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分析”，“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

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我们企冀的是，在倡导科学严谨学风的同时，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的相互切磋，真正造成一种错误意见可以批评，正确意见得以坚持，不同意见允许保留的舆论氛围。

目前报刊市场的竞争是很激烈的，本刊矢志保持其严肃性，努力保持其高品味，以提高稿件质量、提高刊物的权威性来争取读者。决不为一时的经济利益所动，而降格以求。在全社工作人员中树立精品意识，精选精编，

可登可不登的文章坚决不登，可删可不删的段落坚决删掉。腾出一些版面扩大刊物内容，既要纵向延伸，又要横向开拓，使其更为丰富多彩。

服务读者，奉献社会，是我们的宗旨。我们要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力所能及的事要多帮读者办，这是本刊今年另一个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办报的好传统我们要继承，邹韬奋办《生活》杂志的做法也值得仿效。为此，编辑部决心把“编读窗”办得更好，及时反映读者意见，沟通编者与读者的联系；我们的读者服务部可以在代购图书方面，多多效力。读者有什么个人的想法和需求，希望及时告诉我们，我们将努力相助。

本刊自创刊以来，向来不以盈利为目的，在与同类刊物相比，定价偏低的情况下，1997年不仅不提价，还更换了较好的内文用纸。若想将这一势头保持下去，我们也希望热心的广大读者，给我们以帮助，都来宣传《炎黄春秋》，使她得到更多的人支持。在本期签字付印的时刻，本刊1997年订户又增的消息传来，让我们高兴地再向大家道一声谢。

“立志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我们将为实现自己的承诺，脚踏实地，一步一歩向前走。

新年寄语

● 本刊编辑部

童小鹏谈

“西安事变”中的周恩来

1936年12月14日，作为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的童小鹏，随同周恩来离开陕北保安，16日到达西安，耳闻目睹了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现将他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整理于后。

● 陈清泉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张学良和东北军从临潼的骊山山穴里捉到蒋介石，带回西安新城大楼里。与此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扣押了住在西安城内高级宾馆西京招待所的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等人。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主张。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紧急受命，义无反顾，投身“西安事变”旋涡

12月12日零时，张学良一切布置妥当后，才告诉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并请其电告中共中央：“我已发动捉蒋，请予支持。”

12日凌晨，保安中央军委机要科接连收到刘鼎从西安发来的几个十万火急电报，说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逮捕了蒋介石和陈诚等一批高级军官。译电员朱志良叫醒机要科长叶子龙，叶立即将来电送给毛主席和周副主席。

随后，叶子龙传达了周副主席的指示：三局和西安联络的电台要加强力量，日夜值班；电报要随译随送。

早晨5时，张学良又向毛泽东致电：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接着，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请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计”。

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中央领导人整天都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央军委致红军各军团电报，告以蒋介石已在西安被张、杨扣留，各军加紧准备，待命行动。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张学良电，建议以可靠部队守卫蒋介石，以防意外；应全力团结好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红军即南下向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靠拢，以应付各种事变。周恩来又起草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杨虎城复电，“恩来拟到西安面商大计。”

13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发言

说,根据情况的变化,有可能逼迫蒋介石与我们联合。我们的原则是逼蒋抗日。周恩来分析了南京政府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提出要努力争取冯玉祥及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孤立何应钦等亲日派。我们党应准备走上新的政治舞台,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运动。张闻天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代表团去西安工作,电告张学良派飞机到肤施(即延安,下同)来接。

中央连续发了电报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西安事变的情况和我党采取和平解决、逼蒋抗日的方针。有人说,中共中央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作出的。这不符合事实。西安事变后,中央即把情况告诉共产国际书记处。13日政治局会议后,又把新的情况和我党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逼蒋抗日的方针电告共产国际。16日,共产国际发来电报,因电码错乱无法译出,中央要求重发。20日,中央才收到共产国际发来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复电。共产国际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与中共中央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中央的方针是在共产国际来电之前就定了的。周恩来16日到西安时,并不知道共产国际有电报,他根据中央决定的精神与张学良、杨虎城磋商,三方一致同意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这一史实是应当澄清的。

14日,周恩来率罗瑞卿、杜理卿(许建国)、张子华、童小鹏、龙飞虎、陈有才、杨加保、邱南章及警卫战士共18人,每人骑一匹马,在寒风中离开保安城,向肤施方向前进。

16日,于肤施登上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刚刚坐下,周恩来就要刘鼎汇报西安的情况。刘鼎说:张学良这次扣留蒋介石,是逼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他交代执行捉蒋的官员时说,要捉活的,保证其安全,促其反省,如他答应抗日,还要拥护他。周恩来对此情况很重视,他对刘鼎

说:西安事变只扣留了蒋介石,并没有打垮他的军事力量,所以蒋介石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尼古拉二世,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要逼蒋走抗日道路,不要爆发内战。周恩来又详细了解了从张学良到东北军、杨虎城到十七路军的思想动向以及蒋介石的态度,刘鼎一一作了汇报。

进了西安城,刘鼎把我们安置在七贤庄一号休息。这里是刘鼎布置的联络机关。

周恩来一直是蓄着胡须的,来到西安,接触的人多,留着长须不便,忍痛剃掉了。

张学良急于同周恩来见面。刘鼎根据张学良的安排,把周恩来和我们带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这里有三座楼房,中楼和西楼是张学良的起居处和会客室。我们住在东楼,周恩来住



“西安事变”中的周恩来

在三楼,我们几个工作人员住二楼,电台设在底层。安顿下来后,张学良在中楼设宴招待周恩来和随行人员。周恩来由刘鼎陪同先到中楼见张学良。八个月前他们在肤施第一次见面,这次重逢彼此都很高兴。张学良看到周恩来没有胡须,比上次见面时年轻了,惊奇地问:“哟,你的美髯呢?”周恩来回答,刚刚剃掉了。张表示惋惜。接着我们随行人员也入席了。张学良首先举杯欢迎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周恩来举杯祝贺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为了抗日救国而发动兵谏成功,并转达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对张将军的问候。随行人员中,除张子华、罗瑞卿、杜理卿有社会经验外,我们都是土里土气的“红小鬼”,居然成了“剿匪”副总司令的座上客,不免感到手足无措。宴会后,刘鼎立即向中央发了代表团到达西安的消息。我准备密码等待周恩来向中央发电,并通知报务员彭绍坤每小时都要同保安的中央电台呼叫一次。

宴会后,周恩来同张学良单独长谈,开始肩负起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历史重任。张学良对周恩来说,蒋介石被扣后,起先拒绝商谈一切问题,现在已允许谈抗日问题了。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周恩来赞同张学良的对蒋方针。他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但他的实力依然存在,西安与南京处于对立地位,因此对蒋的处置要十分慎重。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说服蒋介石团结抗日;一是蒋介石拒绝谈判,那就公审他,宣布罪状,予以处置,但这样将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亡华制造便利条件。应该力争好的前途,避免坏的前途。也就是采取说服蒋介石的方针,只要他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拥护他做全国抗日领袖。我党中央的态度和张学良的方针原则上是一致的。

午夜12时,周恩来拿给我“毛并中央”的第一份电报。我译好交电台发出,报告周恩来后就去睡觉了,而他仍在思索明天见杨虎城的问

题。

17日上午,周恩来到止园杨公馆拜会杨虎城,讲了他与张学良商谈的情况和中共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这使杨虎城大出意料之外。他原以为中共和蒋介石有十年内战的血海深仇,不会同意放蒋。想不到中共着眼大局,不计前嫌。但他很担心蒋介石阴险毒辣,被释放后会翻脸报复。周恩来对杨虎城的顾虑表示理解,但他认为只要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团结一致,蒋介石想报复也难办到。

折冲樽俎,因势利导,促使“西安事变”妥善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受到极大的震动。亲日派的何应钦等筹划以大军进攻西安,发动大规模内战,欲置蒋介石于死地,由他取而代之。

以宋子文、孔祥熙、宋美龄为代表的英美派,首先关心的是蒋介石的安全问题。他们看出何应钦包藏祸心,“戏中有戏”,又得悉张学良、杨虎城并无伤害蒋介石的意图,就坚决反对对西安用兵,主张和平解决。

日本帝国主义希望中国打内战,以便坐取渔人之利。

于此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周恩来经过缜密思考,决定加强对国民党内部“主和派”的工作,引导事态向“和平解决”方向发展。首先,周恩来通过随同宋子文来陕的郭增恺向宋转告:这次事变中共未曾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这是中共团结抗日方针的继续。望宋认清形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作出贡献。郭增恺向宋子文转达周恩来的意见,宋大感意外,对中共的态度和方针十分赞赏。他回南京后,大力宣扬蒋介石很安全,并赞扬周恩来承担风险营救蒋委员长。

21日,孔祥熙以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同意宋美龄、宋子文去西安谈判。23日,周恩来

第一次和宋美龄作了长谈。周恩来首次说明中共没有参加兵谏,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接着他指出从“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希望团结抗日,但蒋介石对团结抗日要求始终置之不理,当前是改变政策的好机会,希望他们兄妹劝告蒋先生。宋美龄说:既然中共有诚意,应该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24日,周恩来和宋美龄进行第二次谈话,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以政治方式解决内政问题。

经过各种努力,蒋介石也终于同意西安方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决定由宋氏兄妹出面谈判。西安方面提出以“八项主张”为谈判基础,宋子文表示同意,并说,由他们兄妹作代表,商定几条但不签书面协议,以蒋介石的“领袖人格”作担保。西安方面觉得只要大的原则达成协议,不签书面协议也可以。

当时在西安,不少人把张、杨联合红军抗日的局面称为“三位一体”。所谓“三位一体”其实质就是以共产党和红军为政治领导,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现在要以“三位一体”为一方,二宋为一方进行谈判,成功与否关系到能不能建立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3日上午,正式谈判开始,地点在张学良公馆中楼二层,蒋方由宋子文代表,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出席。我们住在东楼,只看见这天张公馆戒备森严,气氛神秘,有几部汽车进来,似有重要人物在这里开会。事后才知道谈判一开始,先由周恩来发言,他谈了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一、停止内战,南京方面撤军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允许中共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张、杨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并以它作了谈判基础。宋子文表示个人同意,并答应转达蒋介石。

在下午的谈判中,宋子文先提出组织过渡政府、撤军等问题。张、杨、周提议先成立西北联军,由张领导进行抗日。宋答应此事可向蒋转达。

24日上午谈判继续进行,除头天参加的人以外,蒋方增加了宋美龄。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并说:“我们都是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都应在政治上解决,不应动用武力。”她和宋子文对谈及的一些问题都明确地承诺。周恩来对此表示肯定。

当天晚上,周恩来由宋氏兄妹引导,到高桂滋公馆会见蒋介石。周先向蒋说:“蒋先生,我们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以前苍老了。”蒋点点头,叹口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抓住话题针锋相对地说:“只要蒋先生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

这时宋美龄说:“以后不要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西安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周恩来具体地说明中共当前的方针:一、为抗日救国,共产党坚持联合国内一切党派军队共同奋斗,组成民族统一战线,互相尊重信任,以谋共同发展;二、共产党目前决无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图,它目前的政治目标是对外实行抗日,对内争取民主共和制度;红军在南京中央政府抗日时愿意服从统一指挥,但必须保持其独立系统,不得由中央政府任意改编或变更指挥人员;四、抗战发生时红军可改变名称,在全国民主共和制确立之后,苏维埃可取消,实行全国一样的民主制度,但共产党的组织及信仰不能改变。

蒋介石作了三点表示:一、今后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说完这三点,蒋介石表现出疲劳的样子,对宋氏兄妹说:“你们可以同恩来多谈谈。”

周恩来到张公馆，立即把谈判及与蒋介石会见的情况给中央作了详细报告。这些电报移交给给我时，我看后晓得谈判取得巨大成功，十分敬佩周副主席精明干练。

这时西安发生了放蒋与扣蒋的激烈争论。

宋子文、宋美龄都坚决要求让蒋介石在25日回南京。张学良表示同意。周恩来认为蒋走以前须有一个政治文件来表示，不赞成蒋在25日就走也不赞成张学良亲自送去。许多人提出，如果没有具体保证，只凭空口说白话就把蒋介石放走，万一以后他不认账怎么办？有人主张南京军队必须撤出潼关以东，解除对我们的军事威胁后，才能放蒋。

张学良以为自己和蒋介石私交很深，对蒋的阴险估计不足。这时他很担心夜长梦多，闹出乱子，觉得不如把蒋早点送走，免生意外。

25日下午3点多钟，张学良拉杨虎城陪着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等悄悄离开住地，乘车直奔机场。因为怕他们的部下知道会发生意外，行动非常秘密，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到了机场，蒋介石重申停止内战等六项诺言后，即登上飞机。张学良也乘上自己的飞机起飞。

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住地，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才得到卫士的报告，他连忙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大为惊愕，立即和孙乘车赶往机场，想劝阻张学良不要亲自送蒋去南京，可是为时已晚，飞机已腾空而起。周恩来叹息地对人说：“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他不仅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处变不惊，艰苦卓绝，协调“西安事变”善后工作

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即背信弃义，组织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旋又假惺惺地要南京政府将张“特赦释放”，“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遭到长达数十年的软禁。与此同时，蒋介石调集五路大军37个师向西安推

进，企图压迫西安方面屈服。

这个突然的变化使西安方面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周恩来和后来来到西安协助工作的博古、叶剑英研究，又同杨虎城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协商，由杨虎城领衔发出措词强硬的电报，抗议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和准备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他还在报中央批准后，电调一部分红军主力开进关中，西安方面十分感动。

不幸的是面对这种新的复杂局面，西安方面特别是东北军内部出现了分歧甚至分化。

由于张学良迟迟不能回来，东北军少壮派加紧活动，他们大都是团营级军官，对张学良怀有深厚感情。为了营救张学良，他们力主与中央军开战，同时，对东北军中的元老派的和平主张十分不满。

周恩来敏锐地认识到如战端一开，有违西安事变的初衷，也不利于争取张学良回来。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看到当时的复杂情况，无不忧心忡忡。为力挽狂澜，周恩来做了艰苦卓绝的大量说服工作。1月27日晚上，周恩来邀请少壮派主要人物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到张公馆东楼会客厅谈话。从客厅里不断传来慷慨激昂的声音，原来少壮派坚持要张学良回来才撤兵。周恩来耐心地进行说服，指出这样做有可能引起战争。我们现在退兵，“三位一体”好好团结，仍然可以要求张将军回来。少壮派不同意。应德田说，张将军如不能回来，不惜破釜沉舟和蒋介石打一仗，请红军全力帮助。苗剑秋大哭大闹，要红军帮助他们打仗。孙铭九也痛哭流涕向周恩来请求红军出兵。

1月29日，东北军在渭南召集团长以上军官40余人举行军事会议。王以哲因病没有参加，何柱国发言主和。应德田坚决反对和平解决。与会军官情绪激烈，都表示不惜与中央军决一死战。

2月1日晚上，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五个人代表三方面在王以哲家中开最高军事会议。应德田也参加了。于学忠说：“我个人意见，还是应该和平解决。打仗不

可能把张副总司令打回来。”王以哲、何柱国都同意于学忠的看法。杨虎城也说：“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益上讲，应该主和。东北军方既然主和，那么我们还是实行和平解决吧！”周恩来说：“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面有许多人坚决主战，为了团结，只要你们双方一致主战，我们也可以保留我们原来的主张，参加作战。现在你们双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他又提出请双方注意内部团结，防止少数人进行分裂活动。

少壮派原来以为这次会议会作出打仗的决定，会议的结果大出他们的意料之外，以致甚为气愤。应德田、孙铭九等认为王以哲、何柱国没有反映主战派的要求，背叛渭南会议，就是“出卖张副总司令”，“出卖东北军”，要“拼一死战”，要“除奸”，等等，气氛十分紧张。

2月2日一早，东北军一批主战军官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何镜华等十几个人到孙铭九家里开会。随后，王以哲于家中死于“少壮派”枪下，何柱国躲入杨虎城公馆幸免于难。这件事当时称为“二·二”事件。

这天上午，我上街买东西，回到金家巷路口，看到警卫森严，架了铁丝网、路障和轻机枪，几个警卫营士兵持枪守卫，气氛很紧张。

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后，异常气愤，立即要李克农和刘鼎追查是什么人干的。

苗剑秋把周恩来生气的消息告诉孙铭九，孙铭九知道他们犯了错误，就同苗剑秋到张公馆东楼向周恩来承认错误，并下跪请罪。周恩来气愤地说：“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救张副总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总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正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

这时周恩来心急如焚，为了表示对最早接受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对红军和东北军亲密合作作出贡献的王以哲的悼念，为了抗议少壮派的错误行为，周恩来不顾安危，带着李克农和刘鼎，赶到王以哲家中吊唁。周恩来的

慰问，使王的家属和在场的人深受感动。

王以哲是东北军中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被杀的消息传到前方，激起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愤慨。东北军前线部队调转枪口，撤出渭南防线。刘多荃部队开回临潼，声言要开回西安为王以哲报仇。中央军开进渭南，逼近西安。少壮派原以为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和中央军开战，救回张学良，那知道事与愿违，出现这种局面，许多人惊惶失措。

2月3日清晨，周恩来和杨虎城、于学忠商议，认为少壮派的严重错误可能导致内部分裂，必须严肃对待。但他们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杀王以哲的动机是为了拯救张学良，不能随便处置他们。于是决定派刘鼎把应德田、孙铭九和苗剑秋三人送到云阳红军总部，以免他们再闹事，也使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失去了打击目标，从而避免东北军内部一场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为了避免意外的损失，周恩来同博古、叶剑英商议，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罗瑞卿等及代表团大部分人员搬到云阳红军总部，周恩来坚持在西安。代表中除周恩来外，仅留下刘鼎和警卫人员龙飞虎、杨家保；机要人员只留下我和两个报务员，保持同中央及云阳总部电讯联系。

“二·二事件”破坏了东北军内部团结，两个师长通电投蒋。十七路军离开西安撤到三原。“三位一体”就此解体。

2月9日，周恩来和我们几个代表团工作人员由张公馆东楼搬到七贤庄一号，成立红军联络处。他又肩负起国共正式谈判的艰巨使命。

西安事变虽然以张学良被扣，杨虎城被迫出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被调动和肢解而告终，但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和历史作用不可磨灭；而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所表现的大智大勇，在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上所做的卓越贡献，也将光照日月，永垂史册。

（责任编辑 一 尘）

“文革”中章士钊 忧国上书

● 许门友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早在1920年,毛泽东就与章士钊相识相交,此后近五十年始终没有中断交往。

1966年8月19日晚,一群身穿旧军装、袖戴“新北大红卫兵”臂章的男女青年闯进章士钊的家。他们一进门,就命令当时已86岁、行动不便的章士钊到院子去接受讯问。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挡在父亲的面前,对红卫兵说:“我父亲年纪大了,院子里有风,是不是就站在屋里说?”几个不讲“温良恭俭让”的红卫兵,不容分说,上前推开章含之,把章士钊拽到院子里。章含之的母亲见状,一下子瘫坐在沙发上。红卫兵喝道:“臭老太婆还想坐沙发,滚开!”把老太太从沙发上揪了起来。

在院子里,红卫兵在章士钊面前挥舞着皮带,粗鲁地辱骂:“你是鲁迅笔下的落水狗!”“你是个老混蛋!”“你是个寄生虫!”……

对于红卫兵的凌辱,章士钊既不反驳,也不低头,一个红卫兵气急败坏地上前摁他的头。章士钊打了个踉跄,险些摔倒。章含之急忙上去扶她的父亲,红卫兵拦住了她,并将她推进屋里。接着,红卫兵宣布了章士钊的“罪状”,并要他表态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章士钊依然沉默不语。红卫兵勒令他站在原地不许动,便一窝蜂似地冲进客厅,开始抄家。

红卫兵逼迫章士钊的家人交出箱笼的钥匙,他们翻箱倒柜,把大批珍贵古籍线装书扔得

狼藉遍地,还任意践踏。有人还钻进天花板里进行搜查。他们翻腾了近两个小时,在书架、书橱、书桌、沙发等处贴上封条,然后,带着大批书籍和信件扬长而去。

红卫兵走后,章含之急忙把在院子里晃悠悠站了近两个小时的父亲搀回屋里,让他在床上躺下休息。回想起刚才那一幕,她不禁难过地伏在父亲怀里哭了起来。章士钊拍着女儿的头,轻声地说:“不要难过,他们迟早还会来的!”章士钊在床上躺了半个小时,起身下地走进客厅,伏在写字台上给毛泽东写信,诉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

毛泽东接到信后,很快批示道:“送总理处,应当予以保护。”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对红卫兵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命令他们立即把抄走的东西送还章士钊,还指派两名便衣警卫在章士钊家里值班,不准任何人再冲击他家。

9月1日,毛泽东亲笔给章士钊复信表示慰问。不久,周恩来指示解放军三〇一医院把章士钊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一批党外人士接到医院住院保护。

1967年3月初,章士钊从三〇一医院回到家中,这时,“文化大革命”正在向“纵深”发展,打倒“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反击“二月逆

流”的运动已在全国展开。面对这种混乱不堪的政治局面，章士钊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如焚。

一天，他突然对女儿说：“这个运动再搞下去，国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刘少奇。这些家伙（指江青一帮人）要把中国毁掉！”老人决然表示：“我要给毛主席写信，请求制止打倒刘少奇。毛刘分裂就会使国家分裂。”

但章含之心里明白：“此时刘少奇实际上已经被打倒了，如果再给毛泽东写信，毛再把信批转给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那不是要招来杀身之祸吗？上一次，红卫兵抄家，不是毛泽东出面保护，父亲恐怕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想到这里，她决定阻止父亲给毛泽东写信，以求平安度日。

章士钊态度却非常坚决，他说：“我非写不可！我不能看到国家这样毁掉！”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40年之久。两公（指毛泽东和刘少奇）皆始终其事……此何等珍贵友谊……实不宜于国内延长动乱，阻吾进路……”“凡事毋为亲爱者所痛而仇见者所快。吾为此惧深有感于斯言……”章士钊希望中共团结，毛、刘握手言和，以民族利益为重，以国家兴

盛为念，切不可打倒刘少奇，停止“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

章士钊同时也给刘少奇写了一封长信，大意是说不相信外面对刘少奇的诬陷不实之词，但从大局着想，劝刘少奇能主动做些检讨。但刘少奇能否收到他这封信，就不得而知了。

毛泽东毕竟与章士钊有着近50年的交情，他没有怪罪章士钊“大不敬”的言行。对其直言劝告，毛泽东回信婉拒道：“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但是，“个别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1967年3月10日，他还派人把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整理的有关刘少奇的材料送给章士钊看。送文件的人还特意告诉他，这是共产党内的机密文件，尚未公开。因为章士钊关心刘少奇，毛泽东特别指示破例送给他看的。

章士钊仔细地阅读了这些文件，一连几天情绪低落，极度苦闷。他对章含之说：“刘少奇同志的这些‘罪状’，纯系蓄意置他于死地。”并且仰头长叹：“国家要遭难，我老了，我的意见也无用了，我只是为国家担心啊！”

（作者系西北大学马列部中国革命史研究室主任。）

（责任编辑 仲文）



1949年2月，章士钊等人，以私人名义抵北平访问，就国共和谈与中共交换意见。

图为离平返沪前留影（前排左六为章士钊）

鄂豫皖苏区“太上皇”张国焘专断独行，杀戮同志，把个刚刚建立起来的红色根据地搞得一片血腥。蒋介石大军压境，已丧失抗衡能力的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东折西突，才杀出重围，可在新的根据地上，张国焘依然故我……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党内的民主与监督，不可一日废止。

红四方面军铁流三千里

● 朱秀海

1932年10月12日晚，风雨交加，夜暗如墨，天空中不时划过一道闪电，照亮了荒野中急速西行的队伍。夜幕和风雪迟滞了敌人的行动，也吞没了大军前行发出的声响。次日拂晓，从黄安四姑墩分道出发的这支红军已跳出敌人合围圈，在广水和卫家店之间跨过了平汉路。率队的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徐向前红军主力在黄安境内突然消失，时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即刻派出侦察机搜寻。他的30万“虎贲之师”虽已连克黄安、新集、商城、金家寨等苏区要地，只要红军主力没有彻底“剿灭”，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匪首”没有被“抓获”，他仍然不敢言胜。

通过侦察机获得的情报，使蒋介石又惊又喜，喜的是红军的主力真的扔下根据地“仓皇西窜”。他连年“剿匪”，殚精竭虑，今日终于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惊的是他的部队到底没能在黄安地区将红军“合围歼灭”，而是让其冲出包围圈跑掉了。蒋介石随即命令全军齐头西进，“追

剿”红四方面军。

19日晨，四方面军主力到达红三军的根据地璆家湾。张国焘看到的已是一片断壁残垣。没有红色政权，没有红军，没有游击队，没有党组织，也没有群众，西出以来支撑着他的那一点希望的力量顿时湮灭，他下了马，瘫坐在路边一块石头上。

“昌浩、向前，怎么办？”他问。

徐向前的心情更为沉重。这一刻对他来说显得格外漫长。一切都改变了：红四方面军反第四次围剿彻底失败，拥有的四万平方公里、350万人口、26个县级政权的鄂豫皖苏区已大部沦陷了。红四方面军几经东趋西折，才在平汉路以西突出重围，眼下找不到红三军和曾有过的根据地，没有方向了，且追兵紧逼，他是总指挥，所剩的一万五千人的命运，紧紧地攥住了他的心。

最先追杀上来的是蒋伏生的八十三师。这是一支十分骄狂的队伍。此刻，他请蒋介石和卫立煌令后续部队加速前进，将徐向前“流氓”包围消灭在枣阳新集。

第一批炮弹落在我军后卫警戒的山头，炸起团团白烟，徐向前登上最近处的一座高地，用望远镜向东

方了望敌情。战斗已经开始。

“情况不太好吧？”跟上山来的张国焘面色苍白，沮丧地问道。

徐向前没有直接回答。反四次“围剿”以来，张国焘给他的印象是每遇险情，神态必大变。他不想再用情况危急之类的话吓唬他。徐向前说，“是走是留，分局必须赶快做出决定！”

枪声越来越密，张国焘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此刻他心如乱麻：是走是留，哪有那么简单？敌追兵已至，往哪里走？重回鄂豫皖？红军刚出重围，还再入重围？四方面军主力西出之日起，张国焘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离开苏区他没有向中央报告，现在到了这步田地，他又如何向中央报告？事到如今，首先要解决的是怎样甩开敌人追兵。红四方面军到了一个严重时刻，她需要一个力挽狂澜的领导者，一个具有远大战略眼光的人，为她重新确定一个新的生存、发展、胜利的方向，但张国焘不是这样一位领袖。

张国焘进退两难，迟疑不决，枣阳新集之战却已展开。倪志亮、李先念率红十一师东出，占领了大梨

树、三家榜一线山头……

敌我两军经过连续三天的厮杀，都陷入了极度疲惫的状态。徐向前让各师领导人汇报情况，得报各部伤亡惨重，需要特别照顾的重伤员就达一千多人。

“部队应当马上突围。时间拖得越长，被敌合围的可能性就越大！”他对张国焘、陈昌浩说。

战争正在改变旧的人际关系，红四方面军现在在全军陷入险境，张国焘本人的性命也不保，与其相信自己，不如相信徐向前。

“那就突围吧，今晚就突围。”他心慌意乱、语无伦次地说，“可是向哪里走呢？”

徐向前、陈昌浩蹲在地下就着手电筒光研究地图。向东突围不行，南面是肖之楚、范石生师，北面是胡宗南师，只有西北方尚没听到枪炮声，可能是条生路。

“那就向西北方突围！”张国焘下了决心。

兵贵神速，徐向前下令各师撤出阵地，红十师做前卫，总部机关、红十一、十二师居中，红七十三师断后，向西北方夺路而行！

方面军总部各位大员上马。上马之时，各师将一个问题提到总部首长面前：一千多名重伤员怎么办？过去在根据地里，战斗打响，重伤员自有地方苏维埃安置，现在没有这个条件了。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沉默不语。带上这些重伤员突围是不可能的，唯一的选择就是将他们留下。留下就意味着让他们牺牲。

战争开始显示它极端残酷的底蕴。军情紧急，方面军主力安危系于一线，突围能否成功还不知晓，带走重伤员很可能会使突围的希望变得渺茫。他们也许十分痛苦，却又别无选择。这是战争，是红白两个阶级的大厮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同志们，我们只能说一声对不起了，我们为着工农的解放而投身革命，每个人都可能牺牲，我们的鲜血流



徐向前

成了河，那是因为工农的敌人太强大了。今天死去的是你们，明天死去的是我们。看在工农解放的大目标上，原谅我们这些后死者吧！

一千多名重伤员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

两支队伍在悲壮的道别声中分手，全军出发时一片惊天动地的呜咽。

后人无法备述这一千多名重伤员的遭遇。天亮后他们的遭遇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仍有一些事情值得记述。在这批将死者身上，蜂拥而上的蒋军官兵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每一个视死如归的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们向敌人最后一战的形式各异，却同样英勇壮烈。烈士们牺牲前的最后一击，只是为了向杀死他们的敌人索命，却迟滞了敌人的追击速度，帮助了突围的战友。

而且，敌人在肆意屠杀红军伤员时虽搜遍了几乎每一个山洞，每一条沟溪，却仍有部分重伤员奇迹般地逃脱了毒手，活了下来。敌大队离开后，他们互相帮助，夜行晓藏，一点点向东方爬行，令人难以置信地回到了黄麻老区，找到了沈泽民、郭述申、徐海东领导的新红二十五军，继续在鄂豫皖地区战斗了下去。

西行的红四方面军已成了一支哀兵，绝境却激发出强大生命力的红色血流。

二

1932年11月6日，红军且战且退，突破漫川关后，为甩掉敌追兵，徐向前令全军向北急走。当夜，全军进至野孤岭。野孤岭是秦岭余脉，由西北伸向东南，山大谷深，红军官兵脚下，只有一条两尺来宽的

羊肠小道,一边是立陡的峭壁,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渊壑。全军将士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夜暗中急行,不断有人和马翻下山去。徐向前果断命令部队砍树铺路,加快速度,又下令将所有的辎重、火炮全部扔掉,轻装前进。第二天中午,红军终于迅速翻越野狐岭,到达陕南重镇山阳镇。

红四方面军再次绝处逢生,张国焘情绪大为好转。中央分局再次开会,决定北越秦岭,进入富庶的关中原,在那里搞一块根据地!

这个决议立即被付诸行动。

19日一大早,徐向前将全军分为两路,同时开始了攀越秦岭的艰难行军。

巍巍秦岭,高耸入云,翻不完的山头,越不完的急流。战士们衣裳单薄,食不果腹,伤病号又多,一边艰难地行军,一边还高呼口号:“打到关中去,吃羊肉泡馍!”“占领西安,找杨虎城要棉衣!”“建立关中根据地,解放陕西!”“红军必胜!工农革命必胜!”

七天过后,这支红色铁流终于征服了秦岭和饥寒,红旗飘飘,直下关中原。

关中震动。西安震动。

杨虎城的陕军拉出了坚决与红军干一场的架式,使四方面军的处境恶化了。胡宗南等人正率军北上关中,从南面对我军形成夹击之势,不但徐向前、陈昌浩明白建立关中根据地的想法已无法实现,张国焘自己对此也没有了信心。眼下最重要的是尽快甩掉在关中地区大量集结的敌军。徐向前提议:全军向南翻越秦岭,进军汉中,再想办法。

张国焘不得不同意。

12月2日,红四方面军与尾追之敌经过一场激战后,两个梯队在周至县南马召镇会合。当日,全军向南进入秦岭。

这是红四方面军主力第二次翻越秦岭。山上寒风刺骨,大雪纷飞,全军粮米匮乏,没有冬装,困苦艰难

之状可想而知。此时别无他计,只有不顾一切,向南急进。经过七天的艰难行军,翻过九座海拔二至三千米的高山,队伍终于12月9日到达秦岭南麓的小河口。

极度疲惫的四方面军在小河口停下来,稍加休整。虽取得了喘息之机,但全军在战略上的不利地位并没有改变。向南出山就是汉中盆地,按照张国焘的设想,下一步部队应在这里开辟新根据地。

部队安顿下来,徐向前不敢休息。当夜,他和王树声率两个团悄悄抵近敌人设防的山口,向敌发起突然袭击。敌人仓皇溃逃,南下汉中的道路打开,徐向前派人急报张国焘和陈昌浩,让他们率领全军,立即南下。

徐向前正忙于红四方面军的生死存亡的时候,小河口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刚刚又经历了一场危机。

这场危机的起因是中央11月7日发出的一封电报。它是中央对鄂豫皖中央分局10月30日发自南化塘的电报的正式回复。在10月30日的电报里,张国焘第一次曲折地向中央承认了四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的真相。临时中央此前一直不知道红四方面军的处境,接报后才如梦初醒,发来一封长电,对鄂豫皖苏区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四方面军的西出明确无误地提出了批评。由于四方面军一直辗转作战,直到12月1日,总部电台才收到这封电文。

四方面军仓促撤出鄂豫皖之日,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等苏区初创时期的领导人就认为,四方面军所以没能粉碎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根本原因是张国焘一开始在战略指导上犯了严重错误。他不顾敌强我弱的现实,一味让红军与敌硬拼,使我军处处被动,张国焘本应接受徐向前等人跳到外线运动歼敌的主张,恢复我军的主动地位,他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地将全军带回

了黄麻苏区,再陷重围。在黄泥畈会议上,张国焘没有就全军西撤的理由对全体高级干部做解释。一个多月来,红军艰难备尝,牺牲惨重,却似乎只是在敌追击下做无目的的无方向的逃跑,致使全军减员到今天的一万五千人。如果再这样下去,红四方面军就有可能完全溃败。现在张国焘的行为又受到了中央的斥责,这些将红军和革命看得比生命还要宝贵的人,就先在下面开了小会。

曾中生还亲自执笔写信给张国焘。他当然知道这件事很可能引出另一番结果:张国焘绝对不是一个能听进批评意见的人,且心狠手辣,自己很可能会因此事遭受更大的打击。

曾中生信的大意是:他和一些老同志认为,四方面军不能再无止境地往西北退却了,应当执行中央的指示,在陕鄂一带建立根据地;当此险难危急时刻,作为中央分局的书记,国焘同志应采纳大家的意见,并将他们的意见向中央报告;至于下一步全军在哪里停下来建立根据地,最好开会研究和确定一下。

第二天上午,小河口会议如期召开。除了徐向前和王树声,四方面军师以上干部全部参加。

出于对红四方面军前途的关心,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等积极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激烈批评了分局领导反四次“围剿”以来包括西出后在战略指挥上的错误。会议几乎开成了对张国焘的批判会。

会议一直开到晚上,最后,张国焘“热情”地说:

“大家都讲了,最后再请中生同志讲讲。中生同志是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水平高,经验丰富。有什么好建议,请他都说出来!”

曾中生站起来,代表大家对张国焘接受众人意见表示感谢,然后又提出了两条建议:第一,恢复军委会,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定,避免在

战略指导上再发生大的失误；第二，提议全军加强团结。“我说的团结，当然是以中央分局为中心的团结。只有坚强地团结在一起，我们这支队伍才有力量，才能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

张国焘带头鼓掌。

张国焘说到做到，当晚鄂豫皖中央分局接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接受曾中生恢复军委会的提议；鉴于四方面军下一步要在鄂陕边界建立根据地，张国焘提议将这个新恢复的军委会命名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报请中央批准。军委会主席仍是张国焘，副主席由陈昌浩、徐向前担任，曾中生出任参谋长，集体决定重大问题。会议的第二个决议是执行中央11月7日指示精神，四方面军出秦岭，南下汉中建立新根据地。

没有人能猜透张国焘内心的全部秘密活动：在中央11月7日电报明确批评自己之后，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在这支红军中的权力基础发生了动摇。曾中生等人敢于在这时“揭竿而起”，正说明自己地位的虚弱。如果他不“以退为进”，四方面军内对他的激烈反对情绪就可能强化，甚至可能造成自己的垮台。小河口会议后，他感到自己的领袖地位已经得到了巩固。

如果张国焘是一个心胸广大的革命家，小河口会议还会对他产生出更为深远的意义：他将和曾中生、邛继勋、余笃三等以前的“反对派”实现和解，四方面军的团结将越来越巩固，而他作为这支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也会在全军赢得更广大更深厚的尊敬，从而在中国革命史上为自己留下光彩的一笔。张国焘恰恰不具有这样的心胸，在他眼中，小河口会议只是他长期职业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大危机爆发点罢了。他虽然依靠自己的手腕渡过了这一危机，却无法容忍这些人继续在他身边长期存在。

三

12月11日，红七十三师打开的两个山口，红四方面军走出秦岭，向南进入汉中盆地。

当夜，徐向前率全军到达城固以西的沙河营渡口，准备渡过汉江。没有船，后面追兵已近，前锋尚在踌躇，徐向前已第一个脱下衣服，跳进了冰冷刺骨的江水中。

总指挥在前面做了榜样，全军官兵纷纷脱衣服下水，咬紧牙关，涉水过江。

在江对岸，徐向前骑在马上，看着一支支队涉江登岸。他大致清点了一下人数，经过五十余天的艰难远征，全军仍然剩下了一万四千四百人。

两天后，四方面军总部进抵西乡以南的钟家沟。这里已是横亘在陕南、川北之间的大巴山的北麓，山大沟深，林密雪厚。

到达钟家沟的当天，地下党的同志就到了，还抱来一大捆报纸。

已经很久不知道天下大事的四方面军的领袖们高兴起来。在这些近期出版的各种报纸中，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正在成都一带展开混战，争夺地盘，打得难分难解。

曾中生的目光首先亮起来。

“川北是田颂尧的地盘，田颂尧全力出援刘湘，川北必然空虚。那里地广人稠，山川险峻，肯定适合大部队发展！”他高兴地大声地说道。

张国焘也十分高兴。“赶快开会，打到川北去！”他说。

西北军委会再次召开扩大会议（史称钟家沟会议）。会议一致决定全军翻越大巴山，南下川北，建立新根据地！

莽莽大巴山，横亘于川北和陕南之间。举首望去，但见群峰耸峙，山势崔嵬，两省交通为之断绝。又值隆冬时节，北风呼啸，冰雪漫山，

一片银白。

红军要南下川北，首先就必须翻越这座天险。

1932年12月17日，红七十二师二一七团作为全军的“开路先锋团”，由师长王树声率领，第一批翻越大巴山，为全军开路。后续部队于两天后跟进。此刻全军仍没有穿上冬衣。出发时，指战员们将一切可用于御寒的东西都绑在身上。徐向前向当地群众请教，规定每人带一把柴草，夜间当火把照明并用于前后联络，遇上难行的路段，又可铺路防滑。徐向前还嘱咐王树声：万一有人掉队，散落在路上的树枝就是路标。

这是红四方面军西出后环境最为艰难困苦的一次长途行军。官兵们忍受着饥饿和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渴了吃一把雪，饿了啃一口干粮，白天一步一步前进，一米一米攀登，晚上就在雪地里相互拥抱着，用对方的体温取暖，和衣而睡，不少年老体弱者睡着睡着就成了冰人。经过三天气壮山河的艰难行程，终于翻越了冰雪厚达一米多的大巴山主脉，抵近山南的两河口。这支英勇不屈的红军，就此结束了退出鄂豫皖苏区后近三个月、长达三千里的艰难远征，开始了这支英勇红军的川陕根据地时期。

四

张国焘一直没有忘记小河口会议。他就要动手剪除“异己”了。

第一个受到张国焘迫害的是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张琴秋成了曾中生、邛继勋和陈昌浩之间的“联络员”，格外让张国焘恼火。部队进入川北不久，他就以工作需要为名，将张琴秋调任新成立的红阳县（通江涪阳坝地区）县委书记。

红军进驻通江后的一天，张国焘把邛继勋喊到了自己在城内天主教堂里的临时住所。

“继勋同志，红军初到川北，势

单力弱，一旦全四川的军阀都来打我们，那可受不了。为了分化敌人，我写了一些‘说帖’，听说你与杨森有旧谊，想请你去江口走一遭，与杨森直接谈判，稳住我军的南线。”

邝继勋出自川军，曾任旅长，与杨森等各路军阀自然并不陌生。但他对张国焘这一做法有疑虑。

“国焘同志，与杨森谈判是件大事，我想请军委会正式做个决议！”

张国焘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

“继勋同志，你不要想得太多嘛！军委当然是讨论过这件事，此事非常机密，不能让太多人知道。……”

邝继勋感到稳住南线毕竟是大局。他是个纯朴善良、性情刚直的人，根本没想到张国焘会用这件大事给自己设下了一口陷阱。

几天后，邝继勋来到通江县与营山县交界处的江口镇，与杨森派来的代表进行了接触。此时的杨森正欲自保，红军主动前来谈判，他当然求之不得。但他又害怕与红军单独“媾和”的事传了出去，一则会在川军中陷于孤立，二则怕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使他无立身之地。因此江口会谈虽进行得十分顺利，杨森却没有马上响应张国焘的呼吁，与红军签订互不作战的秘密协定。

邝继勋回到通江复命。

“杨森是有顾虑呀，需要我们继续做工作，”张国焘说，一边踱步，做沉思状，“继勋同志，你何不以个人名义写封信给杨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其相信我军诚意，与我签订不战协定呢？”

邝继勋回到住处，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给杨森的信，交给一个交通员送到江口去。交通员刚刚出发，张国焘突然让人将这封信“截获”，随即下令逮捕邝继勋，罪名是“勾结杨森”，“准备投敌叛变”！

被关进牢房的邝继勋面对一脸杀气的张国焘，哈哈大笑。

“张国焘，你是一个无耻小人！”

老子早想到你要杀老子，你杀就是了，干嘛还要设下这么一个圈套！”

张国焘翻脸不认人。

“邝继勋，你这个国民党改组派！我让你与杨森谈判，原来你竟借机与敌勾结！证据已在我手里，你还有什么话说？”他咬牙切齿地喝道。

邝继勋怒目叱斥张国焘：“你这是血口喷人！你说我是改组派，我倒怀疑你才是改组派！你陷害无辜，杀戮共产党……”

邝继勋被打得死去活来。

1933年5月，反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进入第二阶段，红军收紧阵地，放弃通江。张国焘借口部队转移期间邝继勋“容易逃脱”，下令将其处决。邝继勋，这位昔日令川、湘、鄂各省白军闻之色变的红色骁将，铁骨铮铮的汉子，至死也没有承认张国焘加在自己头上的罪名。直到在通江洪口走上刑场，仍然放声大笑，毫无惧色。临刑前，他让行刑者松开自己手脚上的镣铐，坐在地下，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革命万岁！”然后含笑闭上眼睛。

邝继勋牺牲时，年方38岁。

诬陷邝继勋的同时，张国焘又以“中央代表”和“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双重身份，在川北根据地内搞起了又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鄂豫皖苏区大“肃反”给他的“经验”是：“肃反”不仅可以消灭所有“暗藏的阶级敌人”，还可成为他维护自己“权威”的工具。

为使新的大“肃反”有个名目，还在这年2月的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他就给小河口会议的“发难者”扣上了“右派”和“小组织活动”的大帽子，公开发出了再次“肃反”的信号。张国焘在会上宣称：

在红四方面军脱离鄂豫皖赤区过铁路西征的艰苦斗争中，右派就开始形成。他们在脱离鄂豫皖赤区

的艰苦斗争中惊惶失措起来，结果滚到了右派的怀抱。他们散布“往哪里去”这种动摇军心的口号，散布“群众不满领导”，“领导内部不一致”以及种种瓦解红军的口号，来助长悲观失望心理。……右派又与托陈派、改组派、AB团、第三党联合起来，形成了小组织活动。

张国焘在会上公开点了曾中生，并给他定下了“罪名”：

曾中生以这种立三路线的观点反对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形成小组织式的斗争，结果助长了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嚣张。

张国焘定性后，新的“肃反”运动开始。张国焘和陈昌浩分了工，陈负责主持军队内部的“肃反”，他负责主持军委后方机关和苏区党、政府、各种群众组织的“肃反”。

像在鄂豫皖时期一样，张国焘规定：新的川陕苏区的全部“肃反”工作仍由“军委主席和方面军政委”也即张、陈二人负责，别人一律不得过问。直接被张国焘以“右派”和“托陈取消派”的罪名逮捕和杀害的就有原红四军政委、现任方面军总经理处（后勤部）主任余笃三和方面军宣传科长王振华等许多人。

张国焘真正要“剪除”的是他认为自己在红四方面军中的最大“反对派首领”曾中生。在“解决”了邝继勋、余笃三等人之后，7月末，反击颂尧三路围攻战役刚刚结束，张国焘即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命令”，免除了曾中生的西北军委参谋长职务，“另行分配工作”。8月初，他又以“托陈取消派”的罪名，将其秘密逮捕。

红四方面军中最杰出的军事战略家曾中生，就此身陷囹圄。

曾中生在被捕的当夜，仍在伏案撰写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军事著作：《与“剿赤军”作战要诀》。在张国焘灭绝知识分子政策的影响下，四方面军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在内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他想用这样一部



曾中生

书帮助各级指挥员提高战略、战役和战术素养。突然的逮捕使他没能完成这部著作。

张国焘亲自主持了对曾中生的审讯。面对皮鞭、棍棒和其它各种惨无人道的刑具，曾中生表现得坚强而且镇静。曾中生拒不承认张国焘给自己定下的罪名，不承认向张国焘“提过意见”就是“反党”。张国焘手中除了那封曾中生曾在小河口写给自己的信，并没有其他证据可坐实曾中生的罪名。

他不敢杀曾中生还因为中央。临时中央接到张国焘的报告，只是同意他对曾中生“撤职审查”。这个指示本身就束缚住了张国焘的手脚，他只能继续“审查”曾中生，直到“审查”出一个可杀的罪名为止。

曾中生被捕的消息传到四方面军总部，徐向前大为震惊，急忙打电话给陈昌浩，怒不可遏地问：曾中生不是反革命，我比你们更了解他！

张国焘需要红四方面军，徐向

前在这支红军中的地位已很难动摇，在没有“坐实”“罪名”之前，他要杀曾中生就不能不有所顾虑。

坐在囚室里的曾中生又想起了那本没完成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也许他还能完成这部书，留给同志们。此时他能做的就是这个了。

他向同情他的看守要来墨水和纸，凭着记忆，忍着浑身的伤痛，日复一日，将这部书从头到尾地重写了出来。

书稿被“收缴”到张国焘手里。张国焘虽然对曾中生恨之入骨，却对曾中生写出的书十分欣赏。

曾中生是黄埔四期生，北伐时曾任组织科长，到武汉后又任汉口《国民日报》主笔。参加“六大”后，又任中央军事部参谋科科长。军事才能和文字功力远在张国焘之上。

“抹掉作者的名字，印出来发给部队做军事教材！”张国焘说。

曾中生一生中最重要的的一部军

事学著作，就这样被留存下来，以后由四方面军的干部带到了延安。有资料说，这部书对于毛泽东日后撰写一系列军事著作，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在这一新的“肃反”浪潮中，被逮捕杀害的红军将领有：方面军总部参谋主任舒玉章；红军“川北独立师”师长任伟章；红十二师政委、小河口会议的发难者之一、“川北独立师”政委刘杞；“川北独立师”参谋长张逸民；该师政治部主任李戴薄；红十师参谋主任吴展；红七十三师参谋主任杨白及政治部主任赵箴吾；红二一七团政委闻盛世；红二一八团政委陈少卿。原“川北民军”的排以上的军官被全部处决。

曾中生一直在监狱里被关押到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懋功会师。曾中生听到这个消息后热泪盈眶，他认为党中央是了解自己的，现在是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了。他瞒着张国焘，偷偷写了一封信，让人送给中央。

这封信到了周恩来手中，很久没有得到曾中生消息的周恩来大惊，专门以中央名义和曾中生见面，张国焘担心曾中生知道的东西太多，与中央领导人见面对自己不利，竟将中央来信扣留，于当年8月的一天夜晚，让人用绳索将曾勒死于川西阿坝卓克基的森林里。

“别人要问曾中生怎么死的，你们就说他通敌逃跑，半路掉进河里淹死了！”他对手下的人说。

一代名将曾中生，就此牺牲，年仅35岁。

值得欣慰的是，1989年11月，中共中央公布了我党我军历史上最著名的33名军事家，曾中生名列其中。党和人民用这种方式，对第一代红军军事将才曾中生，表达了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责任编辑 刘家驹）

陈独秀秘书黄玠然谈

大革命前夜的陈独秀

● 辛 平

我如约叩响了陈独秀秘书黄玠然老人的家门。黄老听说客来，亲自起身迎至门口，我连忙道安，随黄老入室落座。黄老却精神饱满，当我打开了录音机，他就操着浓重的浙江金华口音与我谈起了往事。

一个意外的机会 使黄玠然走近陈独秀，成为第一任总书记的最后一任秘书

问：黄老您是何时认识陈独秀的？

黄：1926年下半年，我从上海大学调到党中央，任《向导》报的工作人员，同郑超麟就是在《向导》报认识的，郑负责编辑，我和另一个同志负责资料，有时可以见到陈独秀。那时有一条规定：不需要见面的就不见面，不需要认识的不认识。因为环境非常复杂，大家警觉性很高，很难保证一个人不会变。我调到中央后，陈独秀经常到我们的那栋房子来，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彭述之的房间里开会。当时《向导》报与中央宣传部在一起，

地点在文滨桥顺安坊。

问：您是什么时候调到陈独秀身边工作的？

黄：那是1926年底至1927年初。我们机关陆续由上海搬到武汉。武汉被北伐军占领后，便成为革命中心，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中共中央等机关都陆续向那里集中。大约在1927年春节前后，我随《向导》报编辑部来到武汉。这时共产党已经半公开活动，党的机关人员比原先扩大了许多。陈独秀到武汉的时间较晚，一方面他留在上海领导工人起义，另一方面他要到上海与汪精卫会谈。4月5日，《汪陈宣言》发表之后，陈独秀才到武汉。陈到汉口后搞了一个总书记办公室，“五大”前七八天，中央将我调到总书记办公室，同时指定我作为陈独秀的专职秘书。办公室共有3人，其他两人是任作民和任淑兰，他俩是兄妹，是任弼时的堂弟和堂妹。我当时的名字叫黄文荣，玠然是我的号。

问：您在陈独秀身边主要做过一些什么工作？

黄：工作很多，但主要的是开

会做记录，整理会议记要。陈独秀要参加的会议很多，有共产党的、国民党的、共产国际的，也有联席会议，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当时武汉的大会很多，什么工人开会、职工开会、青年开会、农民开会、妇女开会，多得很，都希望陈独秀能去参加。工作太忙，会议太多，没有时间去，但他又要了解各方面的动态，于是他就告诉我：“你去看看他们今天讨论什么问题，有哪些代表发言，具体讲些什么内容，你回来后告诉我。”我整天忙于把各种会上发言者的讲话写成记要，然后告诉陈独秀。他每天晚上都要综合一下一天发生的问题，他的工作方法也很好，当天所做过的工作都要进行归纳整理，让我记下来，然后他再收起来，等于他的一个备忘录。我每天就是这样同他接触很多次。国共破裂后，我又同他一起隐居起来，大约在1927年10月，又同他一起秘密回到上海。

到上海一个多月以后，我被调到《布尔什维克》报，仍同郑超麟在一起。我离开陈独秀后，陈常给我们写稿，一直持续到1929年11

月，陈被开除党籍为止。在这段时间里，陈独秀为《布尔什维克》撰写了150余篇短文，均发表在“寸铁”专栏里。

陈独秀对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他不愿意国共分裂，希望国共联合起来打倒北洋军阀，因此采取了一些退让政策……

问：您能否谈一谈您在陈独秀身边工作时的印象吗？

黄：陈独秀到武汉以后，对国共合作是很积极的，特别是在利用蒋汪之间的矛盾以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上，做出了很多努力。陈认为蒋汪在历史上有矛盾，一开始，蒋介石的地位没有汪精卫高，但从蒋到黄埔办军校，特别是陈炯明叛变后，蒋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地位不断上升，这时就发生了蒋汪矛盾的问题。后来蒋介石一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目的是要把共产党的势力从黄埔军校中赶出去，但还没敢公开反共。当时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如周恩来等知道蒋靠不住，要把蒋介石从国民党中赶出去，但陈独秀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这样不利于国共合作。陈独秀认为汪与蒋势不两立，是中共可靠的朋友和合作者，因此与汪精卫进行了会谈，发表了《汪陈宣言》。然而，在中共内也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如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任弼时等人就认为汪是靠不住的，不能相信他，我们应该做好两手准备，可以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共产党就要独立地进行革命，领导革命。陈独秀对于各种不同的看法曾表示过自己的态度：别人可以怀疑，汪精卫不能怀疑，要真诚地合作。所以他批评这个地方过左了，那个地方过火了，一定要改正。

陈独秀对形势和革命的性质曾做过这样的分析：国共之所以合作，是因为国民党在革命的方面有号召力，共产党还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因此共产党同国民党在一起更有力量，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号召革命，但是这个革命暂时还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而是资产阶级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帮助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北洋军阀。

我们当时对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直到几十年后才知道，陈独秀对许多问题的处置来自共产国际。如对国民党的革命性的认识，1926年12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形势的决议》，还是根据斯大林所说的国民党是“工农党”的判断，指出：要“使国民党成为真正的人民政党”。关于要不要组织工农武装的问题，斯大林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

一。”所谓“武装的革命”指的就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至于对蒋介石采取妥协让步策略，也是在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的代表的指示和支持下作出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过高地估计了蒋介石、汪精卫的革命性，负有指导错误的责任。

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后，我们党于1927年4月27日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我随陈独秀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上不少人对陈提出了批评，陈很苦恼，究竟该怎样做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但他还是接受了大家的批评，对自己的问题作了一些检讨，取得了大家的谅解，仍当选为总书记。5月，湖北、湖南相继发生夏斗寅、许克祥叛乱；6月1日，共产国际的“紧急指示”传到中国，提出实行土地革命，吸收工农领袖充实国民党中央，动员两万左右共产党员，加上5万工农革命军组成一支可靠的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自作主张，将这个指示



1932年入狱时的陈独秀

透露给了汪精卫，汪精卫非常吃惊，他的高级幕僚陈友仁闻知“指示”内容后，面如土色，说：“这意味着国民党同共产党之间的战争。”陈独秀听说此事后，非常气愤。此后，形势急转直下，到7月上旬，陈独秀已经感到他领导不下去了，接着，共产国际又要他停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建议陈独秀和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陈愤然拒绝，并索性提出了辞职，隐居起来。

在号称火炉的武汉，苦熬最炎热的3个月，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陈独秀一直在苦苦地思索，找不到任何答案

问：陈独秀隐居以后主要做些什么事情？

黄：大约在1927年的7月9日或10日晚上，我随陈独秀先到一家餐馆的阁楼上躲藏起来；第二天，我们转移到前花楼亚东书局的纸庄，直到离开武汉。

纸庄是一个不太大的二层楼，楼下摆着一个柜台，柜台后面堆满各种纸张。为了掩护我们，纸庄“老板”汪源放把纸的价格标得特别贵，纯粹是为了将顾客吓跑，以求得门庭清静。我的公开身份是纸庄伙计，每天坐在柜台里照看生意。此外，还请了一位湖北农村妇女来做饭、打扫卫生，当着这位妇女的面，我和陈独秀几乎不打招和说话，她只知道楼上住着纸庄老板的熟人——一位从乡下来汉口养病的有钱人。陈独秀住在楼上，从不下楼，他的房间原是存放书籍的地方，里面摆放的许多图书，很合陈的胃口。

我们在这里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发生了“七·一五”事变，

汉口一片恐怖，动辄戒严查户口，到处抓人，那一阵我的精神非常紧张，稍有不慎就可能出乱子。

在隐居的日子里，陈独秀终日沉默寡言，苦思冥想，我在楼下经常能听到他在楼上徘徊的脚步声。过了些日子，他的情绪似乎稳定了些，开始不停地翻阅楼上的藏书，还研究起中国的文字改革。

我们在这里最苦恼的是与世隔绝，外面的情况，时局的变化，一点都不清楚，像南昌起义这样重大的事件，我们也是在“八七”会议之后才知道的。我们在这里既不可能订报纸，也不可能出去与人联络，就连纸庄老板汪源放也极少来纸庄。

我心里也很苦闷，也有许多解答不了的问题，很想同陈独秀谈一谈。有一天，我趁保姆不在，便上楼去向陈请教三个问题：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会落得这样的结局？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今后应该怎样去做？陈独秀听完我的话，凝视了我许久，最后露出一丝苦笑，却未讲一句话。

“八七”会议后的一天，瞿秋白和李维汉突然来到纸庄，一见他们，吓了我一跳，我知道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赶紧请他们上楼，自己则留在楼下放风。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从楼上下来，对我略点了点头，便匆匆离去。他们同陈谈了些什么，陈没对我讲，我自然也不能问。我只是感到，谈话之后，陈显得很是不愉快。那天夜里，陈独秀一直到楼上踱来踱去。一两天后，陈病倒了，情况很厉害，我不得不请来医生给他看病，整日照料他的生活。几天后，他的病好了，但情绪却无好转。后来我才知道，“八七”会议解除了陈独秀在党中央的工作，不过这是到上海以后才知道的。大约在9月上旬，在汪源放的安排下，我们护送陈独秀秘密返回上海。

陈独秀认为中国的问题应该在中国研究，因此他坚决不去苏联，由于认识上的分歧，终于导致陈独秀做出了另一种选择

我陪陈独秀到上海后，住在越界筑路的一幢楼房里。我曾到上海出差，同郑超麟还去看过一次，那个房子已经被拆掉了。

我记得到上海时间不长，瞿秋白和李维汉又来看陈独秀，谈了许多话，分手时给人一种不欢而散的感觉。后来，中央让一位内部交通转告我，瞿秋白和李维汉两次来看陈独秀，都是劝陈去苏联讨论问题，但陈坚持不去，组织上希望我能相机劝一劝陈。

有一天，我见陈独秀情绪不错，我便乘机向他谈起去苏联的事。他马上就说：“我坚决不去！中国的问题，中国同志最了解，不能跑到外国去同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研究中国，材料都在中国，让我到外国去，材料都没有，我怎么去研究呢？”我说：“研究中国问题也可以同外国同志共同研究，互相交流，需要的材料中央可以随时派人送去。”陈说：“靠送材料可以研究问题吗？你为什么来提这个问题？是他们让你来同我谈的？这个问题你搞不懂，他们要我去苏联，并非真的让我去研究讨论问题，而是排挤我！”我认为，让陈去苏联是中央的决定，陈应该服从，因此我又说：“我们党章规定，少数服从多数，中央让你去苏联，是多数同志的意见，你应该服从。”陈听我这么一说非常恼火，质问我：“你怎么提这种问题？怎么能这样和我讲话？”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以后我没有再提这个问题。这时，《布尔什维克》报需要人手，中央又把我调去协助郑超麟工作。

1928年5月，陈独秀拒绝共产国际的邀请和中共中央的劝说，决定不去苏联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并表示再不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陈独秀明显地对“八七”会议之后的领导表示不满，反对他们所执行的盲动主义的路线，加深了与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后来，陈又读了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等文章，逐渐接受了托派的主张，以致最终发展成为小组织活动，被开除出党。

对于陈独秀不愿意去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同志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我曾认真地想过：假如陈独秀听从了去苏联的建议，是否会出现另一个结局呢？也许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陈的认识问题，但有可能被长时间地留在苏联；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不能排除陈独秀接近托洛茨基的观点。

陈独秀学问渊博，一身傲骨，但作为革命领袖，则书生气过浓，且个性过强，听不进不同意见，他的失误与他的性格有直接的关系

问：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郑超麟说：“他在党内有绝对的威权，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威权。”对此您如何看？

黄：陈独秀是一个学者，他的学问很渊博，对待问题也很认真，不论大事小事从不马虎。他一天接触的人很多，党内、党外、开会、报告……工作非常紧张，但他从不放松自己的学习，即使很小的理论问题他也不放过。他的警觉性很高，放东西一直是很有规律的，你

若动一下，他马上就会问：“谁动过我的东西？”他很勤奋，笔锋也很快，一天能够发表好几篇文章；他每天要考虑很多问题，思想非常敏锐，看到哪篇文章有问题，马上就写文章进行反驳，如对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等的论调，从不放过。他对政治和革命的热情的确令人佩服。

你大概看过王森然写的《近代二十家评传》和《郑超麟回忆录》吧？这两本书近年都重新再版。前一本书1932年出版，此时陈独秀正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后一本书完成于1945年，陈独秀已经去世。我认为，这两本书中对于陈独秀都有比较客观的评价。

郑超麟曾说过：“‘陈独秀不是理论家’——托洛茨基这个判断是最正确的。他是个实际的政治家，有敏锐的触觉，事情看得深刻，看得远。在理论方面，他远逊于列宁和托洛茨基，但中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人，没有一个及他……他在党内有绝对的威权，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威权。”郑超麟讲的不错，在“五大”以前，陈独秀在党内一直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甚至在“八·七”会议上，谁也没有公开提出撤销陈的总书记职务。陈独秀的这个地位是通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活动奠定的，向往革命的青年，无不把陈独秀视为自己的导师。郑超麟曾告诉我：他一开始读陈独秀的文章时，还写了长篇日记骂陈独秀，后来渐渐觉得陈的话不无道理，再后来渐渐觉得陈的话都有道理，对陈肃然起敬。我也一样，是受了陈独秀文章的影响才走上革命道理的。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也说：“他（指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准确地讲，陈独秀是一个政治宣传家和革命鼓动家，但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他身上学者

气太浓。当然，在陈身上发生的问题，有他个人的性格问题，有共产国际的指导问题，有党处于幼年期的问题，有哪个小孩子学走路时不摔跤的？

至于陈独秀是不是理论家，王森然说：“其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无畏不顾一切之精神处理之。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己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惜仍以指挥行动之时多，精心研究学术之时少，虽有专一、有恒、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之中心。使先生终为政治家不能成为革命理论家。”王森然的意思是，陈独秀的理论没有形成体系，所以最终未能成为革命理论家，而不是说陈没有革命理论，没有理论如何指导革命？王森然所惋惜的是，陈把过多的精力和时间用于指挥行动上，而未能成就其学说。因此他说：“先生（指陈独秀）书无不读，又精通法文、日文，故其学，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爱；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臻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从我同陈独秀的接触中，也觉得王森然的评论是中肯的。

有人曾问我：“可不可以说，就陈独秀而言是学者与政治家的错位，他本不能成为杰出的政治家，但却可以成为优秀的学者？”我不否定做出这一判断的理性内涵，但仅从理性上来分析还不够。我认为，这个问题应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就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陈独秀的出现是一种必然，不能否认他作为政治家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建立中国共产党，时间比较短，特别是早期的共产党人都缺乏理论的准备，因此只能边学边干，边干边学，难免要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错误和教训中成熟

起来的，没有这种积累，也就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取得成功的。

陈独秀给我感觉最深的，是他的傲骨。由于傲又容易固执，不轻易地同意别人的意见。他如果谈起问题来，要一套一套地说明自己的理由，如果不能说服他，要他同意你的意见是很困难的。在大家都心平气和的时候，陈独秀的态度也很好，可以互相交换意见；在他不高兴的时候，傲慢的态度就出来了，有时采取一种家长式的统治方法，压服对方，不许人家发表不同意见。大家对他又怕，又不满意他的固执、傲慢、惟我独尊。作为学者，坚持自己的观点是可以的，但作为领袖就必须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如果他能虚心一点，多听一听别人的意见，或许可以避免一些错误的发生。

1927年6月，我同陈独秀去团中央开会，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对陈独秀的右倾策略不满，写了一个文件批评陈。陈看过之后，既不解释也不说明，把文件哗啦啦撕掉，丢在地上用脚踩，口里不住地说：“放屁！放屁！”陈怎能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同志呢。可在当时，似乎形成了一种习惯，陈是总书记，他说的话总是最重要的，不能反对他。这是在当时秘密的工作环境中形成的，只有集中，很少民主，实际上等于一种独裁。任弼时是团中央书记，又是中央委员，陈对之尚且如此，对我们又如何呢？

陈独秀对我们工作人员是很严格的，他有一种家长作风，认为自己就是管我们的，所以要督促我们，什么地方有问题，就要训你一顿；他对我们很严肃，从来没有过笑脸；所以我们都怕他。

记得有一次例外，张国焘指着陈独秀大骂陈的失误，我当时在场。由于已经习惯了陈的家长作

风，所以觉得张国焘的举动很过分，奇怪的是陈独秀并没有发起猛烈的反击，事后听人讲，在一次中央讨论北伐问题的会上，陈独秀先发表了意见，张国焘不同意，两人展开了辩论，相持不下，陈大发脾气，拍着桌子训斥张国焘，张是陈的学生，不敢回嘴，缄口不语了。这次，张国焘终于找到了一次报复的机会。

我认为陈独秀犯错误，与他的性格有直接的关系。

陈独秀在生活上很俭朴，从来不讲究吃穿，他除了抽烟外，没有

什么嗜好。他抽烟比较厉害，动脑子的人大概都抽烟吧！如果说他在生活上有什么缺点，就是在男女关系上不够严肃。

后来有人说帝国主义者用300块钱收买了他，把他说成“反革命”、“叛徒”，这些都是对陈的诬陷。不能因为他犯了错误就把他说的一无是处，他在建党，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问题上都很坚决。陈很有骨气，他的人格是应该肯定的。

（责任编辑：刘家驹）

《炎黄春秋》邮购启事

为方便读者，凡延误订阅时间或在当地邮局订阅不便者，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邮购，每月一期定价4元。补购或预订一季度、半年、全年均可，免收邮费。

另，本刊1996年合订本（总46—57期）即将装订完毕，精装每册52元，简装每册49元，免费挂号邮寄。此外尚余少量1995年合订本，每册47元，欲购从速。

本刊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邮政编码：100802；

电话：66170955

开户银行：北京城市合作银行沙滩支行

账号：07680—60

户名：炎黄春秋杂志社北京发行部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书出版

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伦理学会、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共同筹措召开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如何发掘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精华，从理论到现实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并进行了高水平的论述。本书是其中精采文章的汇编，对研究传统伦理道德与当今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较高的理论和实用价值。

本书为大32开本，30余万字，封面压膜

定价：18.90元

本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97年1月出版

《三上桃峰》

的被诬与平反

● 陈英茨

六十九军进山西“支左”

1967年1月12日，山西省委被造反派夺权后，随之而来的是造反派也分成互相对立的两大派，其间，由于江青和康生的插手，更加剧了两派的矛盾和斗争。从互相攻击发展到真刀真枪的武斗，从省到公社甚至村庄的各级领导班子全部瘫痪，工业生产多数被迫停产，特别是太原钢铁公司的高炉停产，大同、阳泉两大煤矿的基本停产，铁路也运输不畅，给经济造成极大损失，整个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被破坏无遗，城乡一片混乱。

为解决面临的问题，中央于1967年4月，命令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和政委曹中南率六十九军进驻山西“支左”。按当时“支左”的紧迫任务，是制止弥漫全省的武斗，由于各“支左”部队的协同动作，山西的武斗被初步制止了，对立两大派之间也开始向联合的方向靠拢。但同年7月20日，发生了武汉“百万雄师”事件后，中央文革小组掀起了一

个“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暴，山西省军区领导被批被斗，不少军分区和武装部被封被砸被抢，行将扑灭的武斗之火，又重新迅猛地燃烧起来，从太原到孝义和离石两县，日夜炮火连天，坦克上街当了指挥车，社会重又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周总理得知这些情况后，于12月在北京召开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总理在会上强调要严禁打砸抢抓抄，立即刹住武斗歪风，拆除一切武斗工事，收缴一切武斗枪支弹药和凶器，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围攻揪斗解放军人员。1968年6月，周总理为解决煤炭系统的停产、减产和武斗问题，再次召开会议，重申了严禁武斗等问题，但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挑动，武斗仍是有增无减。党中央为解决山西问题，于1969年7月再次召开会议，并颁发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七·二三布告》，为贯彻落实布告精神，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一次会议，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宣布：由谢振华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长，免去刘格平这一职务。此后，又经省党代表大会选举谢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中央军委也任命谢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和党委第一书记，把山西党政军的领导工作统一由谢振华担负起来。

谢振华回到山西后，立即调出二十多个团的部队到各地深入宣传《七·二三布告》精神，全力制止武斗，拆除武斗工事，解散了数千个武斗队，收缴各类武器七万多件，积极认真地在“一碗水端平”的原则下，促进两派消除敌对和对立情绪，尽快实现大联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长达两年多的武斗被制止住了，两派的职工、干部回到各自的生产岗位和工作岗位；谢振华并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解放了绝大多数省地市县公社的干部，恢复了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能；从而使得社会和生产秩序得到了恢复，解决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谢振华和山西省委支持各地县因地制宜地修建小型水库和小化肥厂等“五小”工业，勘察修建太原火车站和汾河大坝工程，特别是着重恢复与发展煤炭生产，保障全国对煤炭的需求；同时根据农业六十条和农业发展纲要精神，制订了一些具体的农业政策，因而粮食

产量在1970年突破100亿斤大关后,1971年达到119亿斤,1972年大灾仍达104亿斤,1973年达到124亿斤,1974年达到138亿斤。

《三上桃峰》和 对谢、曹的批斗

1973年,由江青的亲信于会泳把持的国务院文化组,要在1974年举行一次华北地区戏剧调演,要山西省上报调演剧目。山西省文化局认为晋剧是山西著名的地方剧种,应从晋剧中推选,并且由于当时反对演传统戏,只能在新编的现代戏中筛选,有人提出《三上桃峰》是一出歌颂共产主义风格的好戏,可以上报,还邀请党政和文艺界的许多人士观看演出,进行审查,会审的同志没有人挑出这出戏有什么毛病,于是就上报了。

1974年1月,山西省文化局领导率《三上桃峰》剧组到北京参演,并在“二七剧场”进行彩排,邀请文化组领导审看,不料,谁也没有想到的一个大祸临头了。

原来政治那根“弦”一向绷得很紧的文化组成员,见到一个“桃”字,首先就想到了“桃园”,由“桃园”就联想到王光美和刘少奇,一个成员试探性地说:“看这出戏的情节,有类似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歌功颂德的问题,同《一匹马》的通讯有些相似……”边说边看其他人的反应。另一个接茬说:“可以肯定,这出戏是歌颂王光美的,这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新动向,利用戏剧形式为刘少奇翻案。”于是,一份报告材料送到了于会泳手里,于很快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在这次华北调演中,山西省推荐的剧目中有一个晋剧《三上桃峰》,据调查,这个戏的背景是有严重问题的,它是根据1965年7月25日《人民日报》所载的一篇题为《一匹马》的通讯编写的,这

篇通讯所歌颂的故事,正是发生在王光美蹲点的桃园,所以,此剧曾用过《三下桃园》的名称,后来因有人提出要“避嫌”,从而改为《三上桃峰》。此戏在内容上,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无冲突论”的倾向也很明显。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创作思想倾向问题,而是当前文艺领域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动向”。这封信连同那个报告材料,一起送交了江青。

江青看到这个材料如获至宝,她高兴得很夸奖了于会泳一番。并提出“以评论文章和座谈的方式进行批判”。于便赶紧草拟了一个“批判《三上桃峰》的初步计划”,提出“联系当前的翻案风和文艺黑线回潮,着重从政治上进行批判”。

在文化组的于会泳、王曼恬主持下,在京的四个“样板团”和华北调演的代表团100多人,开始对《三上桃峰》进行批判。会后,又派人对山西代表团负责人说:“《三上桃峰》是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并威胁要“深入检讨和揭发”,接着又召开了“样板团”中央文艺单位2000多人参加的批判大会,给《三上桃峰》罗织了“十大罪状”。于会泳还讲山西省委主要领导对此负有责任,立刻正式给政治局报送了一个《关于晋剧《三上桃峰》的情况报告》说:“这出戏有着严重的政治问题,为刘少奇翻案,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招魂。”还说这出戏的出笼并非偶然,它幕后是有后台支持的,这个后台,既有地方的当权派,在中央也有人支持。

在江青一伙的鼓动和操纵下,中央政治局决定召集山西省委常委和其他有关同志来京汇报。汇报从2月20日到3月18日。2月28日一篇署名“初澜”的《评晋剧《三上桃峰》》经姚文元修改后出笼了。当时是个“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年代,一时间竟有28个省、

32家报刊转载和刊登了500多篇批判文章,很多地方还开了批判会。

3月8日,江青这位“旗手”披挂上军装出马了,她带着张春桥、王洪文和陈永贵及一帮随从,来到山西晋剧团驻地“二七剧场”,向全体人员宣布:“《三上桃峰》是出坏戏,是为刘少奇翻案的。”一下把有的演员吓哭了,便又说:“这不怪你们,主要由你们的省委书记谢振华负责。今天,我特意穿上军装,就是来炮轰谢振华的。你们应该起来和他斗争。”

果然,在西苑饭店开始了批谢日程,一直持续到3月18日在京西宾馆结束。斗争的重点主要是《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

在又一次会上,江青瞪着眼睛对谢振华说:“我为什么炮轰你,因为你们的《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你是支持者、批准者,你是山西省委主要负责人,你应当负主要责任。”

谢振华说:“我不懂文艺,也没抓好这方面的工作。”

张春桥立即说:“你不是不懂文艺,你是喜欢修正主义文艺,你是用资产阶级路线对抗无产阶级,用资产阶级文艺向无产阶级文艺进攻,你们这个戏流毒全国。”

江青更发火道:“你假借批极左镇压群众。镇压造反派,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我看到过一个揭发材料,你说‘演样板戏,让我去我都不去,’你说过没有?”

谢答:“那是因为样板戏我都看过了。”

谢振华后来说,那时气得他血直往头上涌,一出《海瑞罢官》,迫害了那么多人,现在又为一出《三上桃峰》这样大动干戈,难道一出戏,就可以兴邦丧邦吗?难道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不是千百万人流血牺牲打败的,而是哪出戏唱败的吗?看不看那出戏还要追查,难道不看那出戏都成为罪状吗?但在那种场

合,他只得强忍下去。

对于谢振华的申辩,王洪文暴跳如雷,他大概还没有看到过有人敢在江青面前持这种态度,便气急败坏地大叫:“你这是无法无天,搞法西斯专政。”这种胡言,实在是把谁在搞法西斯专政弄颠倒了。

一天,在批斗谢、曹的住地,谢看到一幅醒目的大标语:“坚决揪出谢振华的黑后台”。一份简报也明确说:“谢振华所以胆大包天,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旗手江青同志,他是有后台支持的。这不是一出戏的问题,而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阴谋活动。它的矛头不仅是对着江青同志,而是对着整个文化大革命,对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来的。”

紧接着,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一小会议室召开接见会,周总理因患感冒未来,会议由王洪文主持。会议一开始,王就吼叫:“你谢振华不批林、不批孔,却批什么极左思潮,是谁指使你干的?谁是你的后台?只要你能火线起义,反戈一击,可以立功赎罪。”

江青也说:“我为什么炮轰你,就因为你们的《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而你谢振华也未必有这个胆量,背后是有人支持你这样干的。你如果把后台交代出来,就算你立了功,我保证宽大处理你。”

这样无耻的逼供、诱供,激起了谢的愤恨,更引起了她深刻的思索。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不仅是对着他个人的,而且是对着当时处境已很艰难的周恩来总理的。谢斩钉截铁地说:“这出戏是因为文化组要调演才到北京的,我没有后台。”

江青又火冒三丈地说:“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时,你就是我们的大队长,那时你就凶得很,你就镇压群众(指谢曾批评过她的资产阶级作风),现在你是山西的土皇帝、新军阀,你的错误已经发展到十分危险的地步,要悬崖勒马哟!你再不认

账,不好好检讨,我一句话,就叫你这个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司令成光杆司令。”

王洪文说:“谢振华,你回到山西,要在陈永贵同志主持下,接受造反派们的批判。”

谢振华负气地说:“我回去,人家批什么我都接受。”此时,周总理已中途到会了,他听到这话,立即说:“批什么接受什么,不是你的也接受?这话没原则。”

总理看到会场杀气腾腾,便站起来对陈永贵说:“对谢振华你们可以批判,但对他的人身安全,中央责成由你负责保证。”说完就走了。

3月下旬,谢、曹刚一回到太原,省委三届七次(扩大)会议就开幕了,其所谓“扩大”,就是为了安排那些既不是党员又不是干部的造反派骨干参加,结果会议“扩大”到1700多人,对谢、曹进行批斗。

5月31日,谢振华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作了一些违心的检查,但也述说了事实真相,最后请毛主席批评指示。主席在信上批了四个大字:“到此为止”。

中央办公厅再次召山西省委常委到京,李先念副总理对谢振华说:“你给毛主席的报告,主席已批阅了,如果你没有什么意见的话,批判你的问题就此了结。”陈锡联接着说:“你这个时期受的压力很大,现在可以到301医院住院检查一下身体。”但王洪文却要谢去中央党校接受“再教育”,还是当靶子批,不仅撤销了他在山西党政军的一切职务,连原在六十九军的职务也被撤销了。在这期间,谢的全家都受到株连,在国防工办的妻子被停止工作,大儿子、小女儿被处理复员,大儿媳被定为攻击陈永贵的反革命分子,在南开大学刚毕业的儿子因说了几句事实真相的话,被隔离审查并定了攻击江青中央首长之罪,谢则遭受了八年不白之冤。

但江青一伙并不听毛主席的话

“到此为止”,而是要把谢整个永不翻身。她指使人整理出了一个《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解决山西问题的讲话要点》(记录稿)即“十一条”。这个文件一直未经中央正式批准,但却被江青一伙以及陈永贵等作为“尚方宝剑”,来继续打击谢、曹和支持过谢、曹的许多人。

中央批准 为《三上桃峰》平反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中央指示文化部和山西省委,对《三上桃峰》问题进行复查。

文化部在经过复查后,由部党组向党中央报送了复查报告,内称《三上桃峰》是比较好的一出戏。它通过两个生产队买卖一匹病马的故事,歌颂了共产主义风格,批评了本位主义,把这出戏打成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是于会泳在“四人帮”的指使下干的。

报告说:强加给《三上桃峰》的罪名都是“莫须有”的,剧本取材于通讯《一匹马》(载1965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和《三下桑园赎马记》(载1965年10月5日《中国青年报》)。这两篇文章讲的是河北抚宁县刘义庄大队发生的事,与王光美蹲点的桃园大队无关,桃园大队的干部和群众对“初澜”黑文捏造王光美给他们送马一节很有意见,他们说王光美从未给桃园大队送过马。1966年春,他们确实添了一匹大红马,那是在北京红星公社买的,有发票可证。

报告还讲,这件事不但搞乱了一个省,搞乱了一条战线,一时间全国范围内冤案迭出,谈马色变,牛也遭殃,湖南花鼓戏《还牛》,就被打成和《三上桃峰》一样的大毒草。他们淫威所及,使人们连桃字都怕,咸宁地委因儿童剧《桃山新苗》有一桃字,而郑重地重新审查了它的命名

问题,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山西省委也写出了关于为“四人帮”炮制的晋剧《三上桃峰》事件平反的请示报告。对于《三上桃峰》的改编经过作了详细的调查,报告说剧本设计一个女县长送马,是从剧场效果出发,特意为女演员张鸣琴(女)安排这样一个角色。

当时,柳林县剧团在改编《三下桃园》的过程中,曾设想许多剧名,如吕春英、春风杨柳、三上杏花岭、三下桃垣、新风赞、赎马记、桃李争艳等,《三上桃峰》是剧团负责人任之恩提出的,在县委审查时,认为“三上”好,“峰”代表山区,是高的象征,“三上”说英雄人物的境界一次比一次高。所以剧名的提出,也不是有意掩盖这个戏的政治背景。

关于赵云龙的问题,报告说,赵是山西一个年轻的作家,他在1972年10月写过一篇“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问题的一些理解”,这篇文章并未发表,只是征求过一次意见,有人认为这是同江青的“三突出”唱对台戏,后经省委书记张平化批示,开了个38人的座谈会,赵作了检查,就此结束了。《三上桃峰》的问题出来后,于会泳等把这作为是“文艺黑线回潮”,是《三上桃峰》的理论基础,迫使赵云龙自缢身亡。

在接到两单位报告后,中共中央于1978年9月7日,发出52号文件并转发了上述两单位报告,内称:现已查明;当时据以围剿《三上桃峰》的种种罪名,纯属诬陷、捏造。“四人帮”制造的这一事件,在文艺界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中央认为,《三上桃峰》事件应予平反。“四人帮”强加于《三上桃峰》的一切诬蔑之词都应推倒。因《三上桃峰》而蒙受冤屈的演出团体和有关人员应予平反和昭雪。

文艺战线要把对“四人帮”制造的《三上桃峰》事件的揭发和批判,

作为揭批“四人帮”斗争第三战役的一个内容,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它在文艺战线上的流毒和影响,进一步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谢、曹的平反经过

《三上桃峰》平反了,但受害最大的谢振华和曹中南等同志则未获平反。这是为什么呢?这和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虽然粉碎“四人帮”已近两年,但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还在坚持搞“两个凡是”,“学大寨”的运动仍在一浪高过一浪。陈永贵在山西仍处在一个特殊的地位。

1980年6月11日,中纪委派出了以研究室主任刘家栋为首的调查组,专程调查谢、曹事件。

刘家栋向中纪委、中组部写出了调查报告。不久,1980年10月,中央任命霍士廉同志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罗贵波同志为第二书记兼省长。在霍士廉到山西上任前,邓小平同志同他谈了一次话,说:“谢振华同志对‘四人帮’不‘感冒’,他执行的是周总理的指示,所以‘四人帮’就很恨他,支持陈永贵等夺了他的权,你到山西后,一定要同罗贵波同志重视解决这个问题。”

1980年12月30日,山西省委经过认真调查,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为谢振华、曹中南同志平反的报告》,报告说:1974年3月5日至3月18日、6月12日至7月16日,中央两次召集了山西省委汇报会议,对谢振华、曹中南进行了揭发批判,并产生《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山西问题的讲话要点》(记录稿)即“十一条”。这是一起错案。1974年山西省委三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批判“谢振华同志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在一段时间内,跟着陈伯

达乱跑乱说,走错了路线。”经查,陈伯达1970年7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夕的华北之行,到山西时,谢振华同志接待并陪同到过内蒙,是属于工作关系。错定谢振华同志的方向路线错误问题,应予平反。

所谓谢振华同志“在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中,先后犯过不批陈、不批林,批极‘左’、批‘个性’,捂盖子,保自己,整群众的错误,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移了斗争的方向”问题;1972年10月中旬,谢、曹提出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问题,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至于批个性的问题是一个县的小报上登的,与谢振华同志无关。

所谓“抵制和干扰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问题,谢振华反对在农业上推行大寨那套“左”的做法是难能可贵的,给谢、曹戴的这顶帽子是错误的,应予推倒。

所谓“执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支持了大毒草《三上桃峰》问题”,是“四人帮”篡党夺权,强加的罪名,纯属捏造、诬陷,应予撤销。

省委决定:为谢、曹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建议撤销“十一条”,1974年以来,在省委的报告、文件、讲话中有关谢、曹同志路线错误的提法,以及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统统推倒,彻底清理和销毁会议记录、简报、材料、档案。凡因所谓谢、曹问题而受到株连的地方的、军队的干部和群众以及省、太原市等支左办公室的同志一律予以平反。并称:对于一些地方和单位在执行“十一条”时发生的缺点和错误,责任在省委。

1981年1月18日,中央正式发文批复:同意省委的报告。至此,谢振华同志和曹中南同志以及受他们冤案牵连的人才得以平反。

(责任编辑 舒元璋)

秋收起义总指挥

卢德铭

● 倪良端

卢德铭，1905年6月9日出生于四川省宜宾一户殷实人家。自幼聪颖活泼，6岁始读私塾。他熟读了《四书》、《五经》、《史记》、《资治通鉴》等书籍。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这一年，卢德铭从宜宾进入成都公学。在学校，他刻苦用功，勤于思考，革命浪潮席卷到古老的蓉城，卢德铭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向导》、《共产主义ABC》等书刊，从中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他关心时事，密切注视着社会。并积极投入学生运动，参加四川省学联发起的反对省议会及其议长熊晓岩的斗争。

1923年冬，卢德铭得悉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招生，他心花怒放，毅然决定投笔从戎，报效祖国。

1924年新春伊始，卢德铭前往漆树乡拜见他少年时代的老师、曾任孙中山机要秘书的老同盟会员李筱亭。卢德铭向老师陈述了报考黄埔军校、习武从军报效祖国的凌云壮志，深受李老先生的赞赏。李筱亭甘当伯乐，挥毫致信孙中山。

卢德铭赶到广州时，黄埔军校招生考期已过。在这两难之际，经

四川同盟会员石清扬等人引见，卢德铭持李筱亭信函面见孙中山，陈述自己的志愿。孙中山见这位从远隔万水千山的川南而来的年仅19岁的青年人志向不凡，问：“你学历如何？”

卢德铭坦率地回答：“正在读中学。”

孙中山说：“我们招收的是中学毕业生，你的学历不够格。”

“学历不够格，我会自学。”

“你的年龄不够格！”

卢德铭拍打着结实健壮的身躯：“年龄不够，我会长！”

孙中山见卢德铭处事不惊，应变力强，深有好感，便命题令其当面作文。不多时，卢德铭就交了卷。孙中山览毕，觉得文章做得好，很满意，但疑卢德铭曾做过类似的题目，便又命题另作。卢德铭略略思考，提笔成文，在限定的时间内向孙中山交了卷。孙中山见卢德铭确实才思敏捷，当即写了一张便条，曰：“该生经我面试，合格，收他入校学习。”

就这样，卢德铭进入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编入第二期辎重兵队学习。

卢德铭在军校学习期间，各科学学习成绩优异，被孙中山誉为“学生的楷模”。

1925年2月，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国民政府组织了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力的广东革命军讨伐陈炯明。讨陈战役结束，卢德铭在写给父母的信中热情洋溢地说：“……陈炯明叛变了，我们组织了学生军去打他。我提任侦探长，率领学生军打仗，现在已把陈逆驱逐到东江去了……”

同年8月20日，国民党右派杀害了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凯，师生们闻讯后悲痛万分。在军校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卢德铭代表学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阐述国内外形势，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罪行；追述廖仲凯先生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杰出贡献，声讨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行径。讲到激动处，他捶胸顿足，义愤填膺，听众声泪俱下。

卢德铭在黄埔军校内，经过中共党组织的考察和实际斗争考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11月，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正规革命部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在广东肇庆组建成立。独立团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力，又招收一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共两千多人组成，叶挺任团长。党组织选调卢德铭任独立团第二营第四连连长。

1926年5月，北伐战争开始，独立团担任先锋，从肇庆、新会挺进湖南。在救援唐生智的战斗中，他主动果断地带领四连战士阻敌于攸县河南岸。此战例叶挺极为赞誉，他在独立团干部会上说：战功是大家努力争来的……如攸县的占领，就是第四连连长卢德铭同志在指挥我，而不是我在指挥他们。

8月27日、31日，北伐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一举攻下通往武汉的要冲——汀泗桥、贺胜桥，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被歼灭。卢德铭在这场恶战中身先士卒，指挥沉着果断，带领战士英勇拼杀，立下了卓越的战功。战役结束后，卢德铭升任二营营长。

9月初，北伐军直逼武昌城下。敌军依托城墙坚固死守，攻城十分艰巨，将士多有阵亡，北伐军攻攻城为围城。独立团担任通湘门方向的围城任务。10月1日，从通湘门内冲出用大炮和机枪掩护下的敌军“敢死队”3000多人，卢德铭指挥二营奋力阻击，打退了敌军，扭转了局势。10日，叶挺独立团首先攀登城头，二营率先攻入武昌城，把称霸中原、不可一世的吴佩孚打垮了。卢德铭给家里的信中描述了这段情景：“武昌城墙坚固，我们围攻了近40天，组织了几次爬城都未成功。到10月10日，我们终于打进了武昌城。由于我们作战英勇，两湖人民给我们一个光荣的称号——铁军……”

在武昌战斗中，独立团牺牲了三百多人，在收殓烈士遗骨时尚有一百多人不知姓名。为弘扬革命烈

士的英勇献身精神，独立团决定将烈士集中葬于洪山，立一丛墓碑。在拟写碑文时，卢德铭主张每块都刻上“无产阶级的牺牲者”八个字。独立团第三营营长张伯箴等以国共合作为由激烈反对。卢德铭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独立团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不少成员是劳苦大众，即使不是劳苦大众，也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身的，牺牲者中不少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刻写这八个字就是要把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战士的无比英勇昭示于国人之前。报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刻着‘无产阶级的牺牲者’的墓碑，在洪山之麓庄严地竖立起来了。”

攻克武昌后，叶挺升任二十四师师长，独立团改为二十四师七十三团，周士第任团长，许继慎任团参谋长。许继慎调任七十二团团团长后，卢德铭升任团参谋长。

1927年4月19日，卢德铭率七十三团参加武汉政府发动的继续北伐。5月中旬，在河南上蔡县的东洪桥和西洪桥，七十三团和兄弟部队紧密配合，打败了奉军主力。此时，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革命，进攻武汉。卢德铭奉命率部返武汉，随武汉卫戍司令叶挺领导的二十四师，击溃了夏斗寅的叛乱部队，保卫了武汉国民政府。

这年6月，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武汉成立国民政府警卫团，经共产党方面做工作，卢德铭担任了该团团长。他身体力行，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待人诚恳热情，处事公道，深受士兵的爱戴和敬重。

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工农运动，屠杀革命干部，许多革命干部如何长工、何挺颖等都来到警卫团组成干部连。卢德铭对这些干部十分关心，常与他们交谈，征求意见，注意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



卢德铭

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也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革命遭到严重挫折。

在这紧急关头，卢德铭召来指导员辛焕文、参谋长韩浚对他们说：“周逸群号召我们参加南昌起义，张发奎要我们星夜赴九江待命。二者必居其一，何去何从？听听你们的高见！”辛焕文说：“我们听团长的。”韩浚也补充说：“全团官兵都听团长的。”卢德铭放下手中的水杯说：“不是谁听谁的问题，找你们二位来就是商量，现在就要作出警卫团行动的决定。”于是，三人就国内局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最后决定：响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不回电张发奎，但要利用张发奎调动部队的命令率团公开出发赴南昌。警卫团去向决定后，又进一步研究了行动的具体事宜。当辛焕文、韩浚步出卢德铭住室时，已是1927年8月3日凌晨2时了。

4日，红彤彤的太阳刚刚升起，

司号员吹起嘹亮的行军号，在行动的队列中，歌声、口号声在武汉上空回荡，身着国民革命军灰色军装、肩挎挂包、腰系弹袋、手握钢枪的兵士，列成四路纵队，迎着太阳，奔向长江边的黄鹤楼码头。市民们齐集江岸，举着旗、打着鼓、敲着锣、鸣着炮为警卫团送行。轮船徐徐离开黄鹤楼，在汹涌澎湃的长江上乘风东下。

在船上安置好全团官兵后，卢德铭即召集团部领导人研究军事行动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一直东下实有冒险，应向南昌方向搜索前进为妥。根据大家的意见，卢德铭作出部队改水路为陆路前进的决定。

深夜，派往前方侦察的小艇回来报告：张发奎部队重兵布防九江。卢德铭当机立断，命令轮船在黄石港靠岸，弃船登陆向南昌挺进。

在向南昌进军的途中，卢德铭遇上黄埔军校时的同学、共产党员陈烈。陈烈告诉卢德铭，他随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由武汉乘船至九江，船刚靠岸，就被张发奎派来的部队缴了械。只允许教导团官兵徒手随叶剑英回广州。陈烈还向警卫团介绍了他所了解的南昌起义的情况。

部队到达靖安，卢德铭得知，参加南昌起义的叶挺、贺龙部队已撤离南昌南下潮汕；张发奎已占据了南昌，并派出两个团溯江而上截击警卫团。情势十分紧迫，卢德铭与辛焕文、韩浚商量决定：为保全部队，不入靖安城，露营城外小山上。次日，率部向奉新县境前进。

追赶南昌起义部队已来不及，警卫团向何处去？卢德铭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讨论。经过激烈的争论，卢德铭代表团部作出决定：部队折回湘赣边界的修水县，一面整休，一面筹饷，一面扩军；同时派人与江西、湖南党组织取得联系。

8月中旬，卢德铭率警卫团进驻群山环抱、绿水相依的江西修水

县。

卢德铭率部进驻修水后，得知该县桃树巷有一支由罗荣桓领导的从鄂南开来的通城、崇阳的农民武装。即派人与之联系，把他们接来同住修水，编为警卫团特务连。又通过平江农民军与驻铜鼓的浏阳农民军取得了联系。这样，警卫团的兵力得到了补充。不久，卢德铭又收编了一支土匪队伍。并委任土匪头子邱国轩为第二团团长。

正在收编邱国轩团和组建武装力量之时，卢德铭突然接到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夏曦的通知，调卢德铭等去闽粤交界的南昌起义部队中去工作。卢德铭舍不得离开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官兵们也舍不得自己的首长离去。卢德铭等与夏曦派来的人据理说明现在不能离开部队的理由，况且目前形势紧张能否到达目的地也毫无把握。但是，这些正确的意见却遭到拒绝，以“必须服从上级党组织的决定”为由，命令卢德铭等迅速离开部队。

卢德铭等跋山涉水到达了武汉。他们总觉得夏曦调他们离开部队不对劲，于是想起崇敬已久的向警予大姐，决定向她汇报此时此刻的思想，听听她的意见。

向警予是党中央和湖北省委的负责人，认真地听取了他们离开部队的情况汇报后说：“夏曦叫你们离开部队的意见是错误的。在目前混乱的情况下，部队战士更需要他们熟悉、信任的指挥员。你们在，部队就有力量；你们走，部队就会削弱。这个影响太大了！”她还说：“夏曦要你们到广东、福建一带去找起义部队，路上很困难，随时可能遭到意外。我的意见，你们应该马上返回原部队，掌握好党的武装。要知道没有武装，便没有发言权呀！”卢德铭等顿觉心明眼亮。表示接受大姐的意见，立即返回修水。向警予还向卢德铭等3人传达了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中央已派毛泽东发动

领导湘赣边界地区举行秋收起义的决定。向警予代表党组织，派给卢德铭6名年轻的党员军事干部，还发给3000块银元做活动经费，并详细地研究了回修水的路线和办法。

由于白色恐怖严重，沿路盘查更紧，为了安全，卢德铭等保持一定间隔距离行进。行至崇阳县大沙坝时，辛焕文遭地方民团伏击光荣牺牲，韩浚被俘。途中，在农民协会的护送下，卢德铭等越过重重艰难险阻，回到了修水县城。

回到修水后的卢德铭，便与毛泽东取得了联系。

1927年9月初，毛泽东从长沙乘火车来到安源张家湾，主持召开了暴动前夕的军事会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将结集在修水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与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工人纠察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毛泽东、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度。以驻修水的警卫团、平江农民自卫军为骨干，吸收崇阳、通城部分农民组成第一团；由安源矿警队、工人纠察队、醴陵农民自卫队、衡北北岳莲花安福等地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二团；浏阳和平江工农义勇队与武昌警卫团一部分组成第三团；第四团是收编原国民党军队邱国轩的土匪部队。会议还决定了军事行动日期和进军路线等重大问题。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署传来修水，师部和一团官兵群情振奋，欣喜若狂。部队在紧张地训练，在作好起义充分准备的同时，还十分注重抓农民协会的恢复、镇压土豪劣绅等工作。

9月9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将从这儿出发进军平江。

红彤彤的朝阳洒在修水城南的操场上，一排排、一列列脖系红巾的

革命军战士,集合在中国工农革命军军旗下,等待着总指挥卢德铭下达出征的命令。

秋收起义部队总指挥卢德铭来到队列中,恭恭敬敬地向全体将士行过礼,踏上讲话台,用清脆而洪亮的四川口音说:“同志们,秋收起义开始了!”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钢枪,在朝阳里舞动;拳头,在晨风中举起;口号,在宁静的修水城激荡……激情满怀的卢德铭继续讲道:“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人,拿起枪杆子,举行武装暴动,进行土地革命!……”简短、明了的动员讲话完了。卢德铭发出命令“出发——”

司号员吹起了嘹亮的进军号。各营、连、排举着红旗,唱起战歌,整齐而有序地从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度、师参谋长兼团长钟文璋等师团领导人面前走过,奔上秋收起义大道。

出师修水城后,卢德铭率部胜利地占领了湖南境内的龙门厂。

当一团与邱国轩团会合出发攻取工寿街时,土匪出身的邱国轩认为时机已成熟,便起了坏心,假传前面发现敌人。一团长钟文璋未核实情报的真伪,叫邱国轩团向两翼散开,自己身先士卒地带领第二营从中路猛冲过去。占据了有利地形的邱国轩团待二营进入了有效射程后,即从两侧夹击,直冲团部……抢去了大批军需物资,部队也被冲散了。

卢德铭很快查清邱国轩叛变的原委:早在秋收起义前几天,卢德铭曾派参谋彭楷、副官余诒前往邱国轩团考察该部参加起义的诚意。而犯错误受到党小组严厉批评的彭楷和余诒心怀不满,乘机与邱国轩勾结。邱国轩又暗中与湘敌第八军取得了联系,阴谋待机反叛。

夕阳西下的时候,被冲散的战士在卢德铭派出的便衣人员和当地

群众的引领下,到达了指定汇合地。卢德铭清点队伍,看望了归队的部分战士和伤员,鼓励将士们吸取教训,投入新的战斗。卢德铭看到部队虽然受了一点儿损失,但是人员、枪支基本保存下来了,一团官兵战斗士气高昂,锐意未减,十分高兴。

卢德铭根据敌情,改变了攻取平江县城的计划,率部向随毛泽东行进的第三团靠拢。

部队在急行军途中,传递来由毛泽东签发的前敌委员会紧急命令:各路起义部队迅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中。

9月19日,秋光明媚。卢德铭率领的师部和第一团胜利地到达了文家市,与先期抵达的毛泽东带领的第三团会师。

不顾长途跋涉和战斗劳累的毛泽东,在部队会师的当晚,于师部驻地——里仁学校的教室内,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几盏明亮的煤气灯,把教室照得透亮。

毛泽东说:“起义以来,我们打了一些胜仗,也受过一些挫折。……目前,我们这支刚诞生的工农武装,决不能将自己稚嫩的胳膊,送到反动派的刀口上去硬碰。因此,我们主张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先到文家市集中,研究一下全军进军的方向问题……”

经过激烈的辩论,毛泽东和卢德铭终于说服了多数同志,否决了“攻打长沙”的意见。

那么,部队去哪里扎根?已和绿林好汉王佐、袁文才取得联系的毛泽东,指着张开的地图上的一个地方说:“我们就在这里扎下根来。这里是罗霄山脉中段,适宜我们落脚,建立革命根据地。”

会议通过热烈的讨论后,前敌委员会作出决定:秋收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

工农革命军向罗霄山脉进军是

艰难的。江南的九月,炎热尚存,白日行军,汗流浹背;夜间宿营,蚊叮虫咬。还有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主土匪武装的堵截,尾追……

这天,行进在队伍中的卢德铭,听见了从后队传来的枪声,知道后卫被敌人咬上了。即命令部队,迅速强占右前方山头阵地,组织好火力。并要余洒度集合第三团,向萍乡方向警戒。部署完毕,卢德铭登上左前方山坡的一块岩石上,用望远镜注视着前方。此时,密密麻麻的子弹打在第三团行进的路上,掀起簇簇尘土,稻田里水花飞溅。

突然敌阵里响起了紧凑的冲锋号音,嗷嗷直叫的匪众如飞蝗般扑过来,50米、30米、20米……在这关键时刻,三团长苏先骏惊叫:“我不负责了!”副师长余贲民见势头不对,欲抽腿逃跑。卢德铭马上阻止余贲民:“现在不是你跑的时候,师部警卫人员马上在田坎边抵抗。”并指挥警卫人员进入射击位置。敌我双方处于相持状态中。

卢德铭召集师部军事人员研究,决定应迅速撤出战场。

当卢德铭重新回到山上时,大股的敌人从前方小山的右侧蜂拥而来,子弹如暴雨,碰在卢德铭的前后左右的石头上,火花四溅,顿时黑雾腾腾。卢德铭仍伫立在那里果断地指挥着部队撤退……

突然,一颗罪恶的子弹呼啸着击中了卢德铭胸部,警卫员猛扑上去,搂抱着,鲜血涌流,浸透了军装……警卫员失声大声呼喊:“总——指——挥——”脸色苍白的卢德铭微微睁开双眼,望望警卫员、指着皮盒子,低沉微弱地说:“快,快,交,交给——毛——委——员——”

部队突围后,当地群众周仁榜将卢德铭的遗体收殮,安葬在他屋后茶树下。

(责任编辑 仲文)

同盟会首名会员

曹亚伯

● 汪承武



1937年。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市郊昆山县有一位白发长髯，文雅持重的老人奔走呼号，动员民众，救死扶伤，抗敌御侮……这位外貌高洁而衣着朴素的老人，隐居昆山已十有余年了。他就是同盟会首名盟员，长期追随孙中山、黄兴革命，并多次给予他们巨大援助的辛亥革命元勋曹亚伯。

曹亚伯（原名茂瑞，字庆云，1875—1937年），湖北阳新人。他“自幼居乡，每聆乡中父老讲述太平军当年起兵杀贼遗事，辄眉飞色舞，‘他痛感清室的腐败无能，’辄悲愤填膺……而有灭此朝食之志。”他以天下为己任，自名为“亚（洲之）伯”，积极寻求民族独立自强之道！暗自“立下誓愿，非赶走‘外国皇帝’不可。”他生平“赋性率直，嫉恶如仇”，重信义而轻权位，让赏辞荣不居功，积极追随孙中山、黄兴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并成为其亲密的伙伴与真诚的挚友。他曾留学英国，毕业于牛津大学，却坚决避开“仕途经济”之故道，一生不做官，不经商，淡泊功名利禄，待人处世忠心赤胆，具有一种敢做敢为，无所畏惧的傲骨与豪气……和章士钊等，人称民前“三疯子”。

1904年10月24日。

在宁乡中学任教的曹亚伯正伏案编写博物学讲义，突然接到黄轸派人送来的急信：“有要事相商”。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曹亚伯在两湖书院住学期间，与同班学友黄轸（字克强），感情笃厚。相同的理想使他们走上了同一条革命道路——排满反清。随后，曹亚伯皈依基督，以宣传宗教为名传播革命思想，并与武昌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和长沙圣公会会长黄吉亭（时在武昌）等知交颇深，成了两湖地区甚负名望的“基督教徒”，并介绍了黄轸、周震麟等一批重要革命人物“入教”。黄轸自日本留学回国之后，在长沙建立了湖南第一个革命组织华兴会，正在积极准备旨在推翻满清统治的武装起义，二人的来往一直频繁。曹亚伯在长沙宁乡中学、求中学校等校任教，他是湖北第一个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后为日知会）负责宣传的主要成员之一，兼任湘鄂联络员；是时黄轸也在长沙主持明德学堂等校——都是利用学校提供的讲坛，教育和发动青年学生团结起来，进行民族革命！

明德学校的教员，多为革命的

知识分子，如张继、吴禄贞、周震麟、苏曼殊、金封三等，基本都是华兴会的成员和骨干。明德学校便成了华兴会的革命指挥中心！他们计划在1904年11月16日（甲辰十月初十，即皇会之日），慈禧太后70寿辰——“万寿节”那一天，在长沙、岳州、衡州、宝庆、常德、浏阳及武昌等地同时举行起义，不料计划被湖南当局所侦获。巡抚庞鸿书便立即下令缉捕黄轸及其党徒！黄轸急切向曹亚伯求救。

曹亚伯随来人赶到藏匿黄轸等人的龙祝仙家，见了黄轸，弄清情况之后，曹亚伯马上又去吉祥巷圣公会堂，轻轻敲开了黄吉亭牧师的后门。这位黄牧师是一位正直可靠的“革命友人”。他来长沙之后，“在曹亚伯的协助下，专以联络湖南教育界倾向革命而又具有声望的人物”，他既布道，又传播民主革命的思想。黄牧师后来终于成为一名甚受称赞的优秀的同盟会员。

在这危急关头，黄牧师当即表示：“克强的安全我可以担保！”

第二天晚上，黄牧师乘小轿来到龙家。小轿再入龙祝仙的内室，神速地把黄轸换上轿子，放下轿帘，装着龙家“女眷出门”的样子，然后经过小街，到吉祥巷圣公会堂后街

一家娼妓的门口，趁着那些红男绿女来来往往的喧闹劲儿，黄軫大大方方下得轿来，“跟班”张继与早已等候在此，“迎接客人”的曹亚伯也上来打了个照面，互换了眼色，说两句道安的吉祥话，亚伯便上前牵着黄軫的大手，从容不迫地拐进小巷，步向圣公会堂的后门，然后快速进入会堂，藏进了安全场所。

一

黄軫隐藏在楼上不得外出露面，掩护和营救同志的任务就全靠曹亚伯、黄吉亭他们了。黄牧师从长远的大局着眼，在圣公会堂附近给黄家租了一间小屋，让黄軫一家迁居于此，每礼拜日照常坚持到教堂做礼拜，以便掩人耳目。时间将及一个月了，黄軫急欲离开长沙，早日奔赴革命阵地。而曹亚伯更是心急如焚，四处奔走。他利用假日回到武昌，“摇唇鼓舌”，广为申援。不多日，武昌圣公会会长兼日知会（科学补习所被查封后又成立的革命组织）会长胡兰亭牧师来到了长沙，通过曹亚伯的积极斡旋，他们终于与黄吉亭牧师商定秘密送出黄軫的具体方法和步骤。于是，黄軫剃掉胡须，穿上制服，化装成海关办事人员，登上日本轮船“沅江号”，由黄牧师送他到汉口，当晚又再送他到江心，一直待他登上了去上海的“江亨轮”。分手时，黄牧师再三叮咛黄軫：“到达上海之后，马上拍来电报！只用一个‘兴’字就说明一切了。”黄軫照办了。他取其“兴我中华，兴我民族”——“我革命的终极目的”的大义，遂改名为兴。从此，黄軫便以黄兴这个名字出现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成了一个光耀千秋的一代伟人的名字。

曹亚伯虽然借助教会的势力没有遭受什么危险，但他在湖南也站不住脚了。因为新任湖南督抚端方，仇恨革命，大肆搜捕杀戮革命党人，视曹亚伯更加眼中钉肉中刺！

但他又碍于自己曾督抚过两湖书院，与曹亚伯有过师生之谊。而今亚伯还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洋教徒，明面上也不好任意去弹弄他，但又无从下手，莫可奈何！最后只好打发他去了日本，名为调查宗教委员，实则给自己消除了心腹大患。

曹亚伯来到了这个樱花之国。

7月下旬的一天，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介绍，黄兴与孙中山初会于东京神乐坂风乐园（中国菜馆），二人义气相投，一见如故。孙中山热情洋溢，“口讲指画”；黄兴喜之不胜，“大为悦服”。他们畅谈革命大业，坦诚交流建国思想……自此孙黄携手合作，成为志同道合并肩战斗的革命战友。

7月29日。黄兴召集华兴会成员在其寓所开会，讨论关于同孙中山的兴中会联合问题。次日，双方集会于东京赤坂区内田良平家里。这是日本黑龙会的办事机关，孙中山、黄兴都很熟悉。出席会议的各省留日学生约70人。按照孙、黄的意见，要求与会者均须亲笔签名，以作为新建革命组织的正式成员名单。日本人宫崎寅藏当即取出纸笔，提供大家签名之用。这时，会场呈现片刻的沉默，因为这种打破惯例的签名方式，令人感觉甚为异常，人们思想上缺乏准备，有些犹豫不决，致使会议出现了短暂的冷场。猛然间，有位鄂东南口音的青年，离开座位起立，一面高声喊道：“今日大家主张革命，始来此间，如有异议，何必来哉！”一面大步奔向笔墨桌案：“我凭我良心签名！”并挥笔写下“兴国州（阳新县原名）人曹亚伯”几个显赫的汉字。这位两星期前刚从湖南来到东京的曹亚伯，他竟然“抗旨不遵”，没有去“调查宗教”，而是积极参与了孙、黄的“造反”，并决心加入其新建革命组织——同盟会。曹亚伯刚回到座位，孙中山的另一密友，孙、黄结识的主要牵线人安徽休宁的程家桢也站了起来：“我

也凭我良心签名”。于是在曹、程二人的带动和呼唤下，“众皆和之”，与会者便随后一一签上自己的名字，以示正式参加组织的决心和行动。这就是同盟会的第一批成员。而曹亚伯即为第一位在盟书上签名的盟员。时间为1905年7月30日。当时有位广西籍的盟员“不知有兴国州地名，以为儿戏，笑问曹亚伯何意（疑曹不敢写真实籍贯）？亚伯答：“君不知太平天国大败清军时，有兴国州人多次包打洪山之事乎？若无兴国州人，你们广西的天王洪秀全焉能安然在金陵登基也！”说得众人哈哈大笑。

三周后，8月20日，下午2时左右，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在东京灵南坂日人阪本金弥住宅举行。在大会上发表演讲的有孙中山（兴中会）、曹亚伯（日知会）、黄兴（华兴会）3人。演讲之后，大家开展讨论，曹亚伯以其雄辩的口才和严密的论理，一一驳倒了假设的反对论点。他口若悬河，感情奔放，思想深刻，语言犀利，恰似一位修养有素的辩论家。他妙语连珠而充满自信，他豪情满怀而富于鼓动精神！他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热烈的鼓掌欢迎和由衷的赞佩！从而为同盟会成立之初统一思想、共同奋斗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在会上，黄兴宣读了同盟会章程草案（修改后通过），他并提议孙中山为总理（一致同意）。黄兴当选为执行部庶务。司法部由张继领导。宋教仁为检事。评议部长汪精卫、胡瑛、冯自由、胡汉民及曹亚伯为评议员。

不久，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出版，但初期的发行工作严重受阻。长期从事宣传联络工作的曹亚伯，又一马当先，主动请缨，积极开辟发行渠道。他与萧钟英、陈谟、龚国辉等人亲自动手，将报纸一一进行包卷，写信封、贴邮票，然后交付邮局，寄发一空。他还经常手提大包，携带报纸前往有关各校踞

跃发售,因而很快使《民报》得以顺利发行和发展,风行于海内外。同盟会的革命主张,遂得以广泛的传播和深入的扩展。孙中山、黄兴的革命领袖地位也从而由地方性(广东一带和湖南一带)迅速发展成为全国革命的统一领袖。

1909年,孙中山自南洋来到英国伦敦。他因旅资不足而一筹莫展,正在犯难之际,来此留学并已介绍“现代圣人”吴稚晖加入同盟会的曹亚伯,身为留学生会会长,他便急向留英同志筹款80金镑送给孙中山,及时解决了燃眉之急。而曹亚伯自己的学习生活却是极其艰难困苦的:他“能在英继续求学”,完全是“赖英国宰相之子与彼友善,时予资助”的结果。

1917年6月,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国人大愤,孙总理在上海力图起兵护法,而绌于经费”不得付诸行动!国会议员及北洋海军纷纷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相率集中在上海”,只等孙中山的一声号令,便立即奔赴广州组织护法政府。但孙中山感到费用缺口太大,不好贸然从事!紧随孙中山左右的曹亚伯,遂将此情告知其一位富翁好友——驻上海的某外国医生。这位医生原是

一名犹太人,为人通达慷慨,极为同情中国革命。他说:“中国已经大乱,非孙中山先生莫能为力,若中国衰亡,我在上海亦不能立足矣。”他表示“愿助资百万支援孙中山革命!于是,曹亚伯每当夕阳西下,便会同女友吴某,乘马车去到医生住处,但见他出门时,“手提大皮篋一具,其中累累皆各国钞票,外人虽侦伺严密,无疑之者也。”——总共5大麻袋!因此之故,不久程璧光(海军总长)“率海军南下及广州召集非常国会之举,亚伯之功为多焉。”

曹亚伯晚年隐居昆山,国民党军政首领如陈诚、冯玉祥、白崇禧等亦常去拜访。他曾对来访者指着“室中巨篋”说:“此中有孙总理衣物,孙科欲以重金相易,(吾)拒而不与。”他感触良深情意绵长地慨叹道:“我与孙先生当年财帛不分家,因无分尔我也。”他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厚情谊,由此自可见一斑了!

为革命,曹亚伯总是这样不遗余力不畏艰险,而又不显山不露水地默默辛劳着,奉献着……

同盟会成立以后,连续组织了6次较大的起义,均告失败。首脑们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必须把革命的思想灌输到军队中去!团结依

靠革命武装力量以夺取政权,才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而这一任务的完成,湖北日知会则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武昌起义它是冲锋陷阵的一支突击队和革命中坚。因为“日知会在当年革命团体中为实力最强大者”,“当代之菁英,而集中于日知会,以从事革命大业也。”日知会的政治力量和组织力量都是相当雄厚的,做好日知会的工作,是革命党人一时的中心任务。

曹亚伯回国后,首先打通了日知会首领刘静庵、冯特民等人的思想,从而沟通了同盟会与日知会的组织关系。“自此,同盟会与日知会之声气,息息相通矣。”日知会成员集体加入同盟会,更为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提供了军事力量与组织力量的准备……

1903年底,清廷采纳袁世凯的建议:“非练兵无以卫国”,因而成立练兵处,作为陆军参谋本部,督练全国新式陆军,是为“新军”。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则是专门介绍新军入伍的机关,“张之洞所募新军,大半为科学补习所介绍之新货(学员)”。他们在入伍之先,已受过科学补习所秘约:“此次入伍,务学成健儿,待时机一到,即起而革命。”果然,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首先发难的正是新军革命同志。工程八营后队正目熊秉坤(日知会成员)打响了历史性的第一枪!左队队官吴兆麟则脱颖而出,成为众望所归的义军首领,一致推举他为起义军总指挥。吴兆麟也是日知会干事,他与曹亚伯交往密切。

中华民国建立了,革命的任务“完成”了!曹亚伯晚年隐居昆山,遁入佛门,悉心撰写《武昌革命真史》一书,最后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1937年,日军占领昆山前半个月,曹亚伯与世长辞了。

(责任编辑 仲文)

讀書飲酒四十年烏紗頭上是青天
男兒欲上凌烟閣第一功名不愛錢
柔遠剛峯先生詩以奉
入紀慶主正曹三伯回

曹亚伯手迹

罗炳辉将军 在淮南

● 周世民

罗师长的三件宝

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里，二师师长罗炳辉有三件宝：剧团、大刀、小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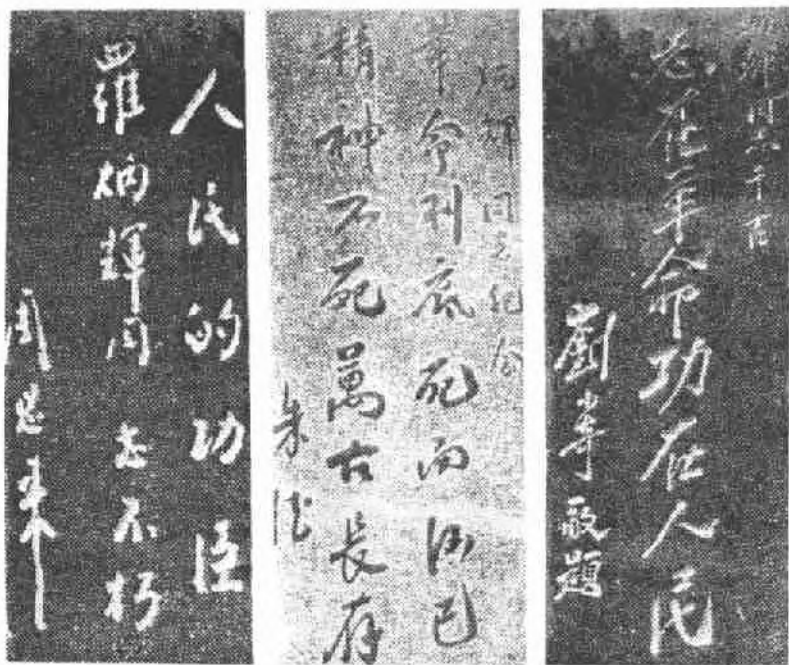
大刀队，是罗师长精心挑选、严格训练的骨干，他们都是些二十上下、五短三粗小伙子。有一百八十人，名为学兵连。连长是老红军金世华。战士们除一支步枪、四个手榴弹，还多了一把大刀。刀种很杂，有关云长用的那种青龙偃月长柄大刀，也有单面鬼头刀（又叫一块肉大刀），还有双面阴阳刀。刀柄子上都系有二、三尺长的红洋布。当时学兵连的劈刀经常到四、五、六三个旅巡回比武。最激动人心的是罗师长亲自做示范动作，只见他那挺立的英姿，犹如一座高塔，粗壮的臂膀，挥刀旋转，如银蛇飞舞，红光闪闪，真有点滴水不进的功夫。他还将十个铜板擦起，一刀劈下，两瓣纷飞。有时，罗师长用雷鸣般的口令声，和全连战士一起列队布阵，劈刀对刺，那翻腾跳跃、杀声震天的英雄气概，真有点山不可挡、水不能阻的气势。谁看到这惊心动魄场景，都深信劈刀是近战慑敌的法宝。不久，我们在金牛山破袭战中，毙伤日伪军八百余人，其中用大刀砍死砍伤近半数。接着又在桂子山肉搏战中，毙伤日伪军三百余人，用

大刀砍死砍伤占三分之二。后来，又在龙王山与敌遭遇，毙伤日伪军二百余人，大部分是大刀砍死砍伤的。罗师长的大刀队，震撼淮南。大刀队每人装备的枪，是缴获日寇的三八大盖，劈刺起来，只见明晃晃刺刀金光耀眼。每人还挎了支盒子炮，更是显出八面威风。

罗师长带兵严字当头，对违犯纪律的处理一丝不苟。学兵连有个18岁的路西兵，因晚上站岗丢了三发子弹，连里关了他三天禁闭。可罗师长知道了要加倍处罚，以讹传讹，说要枪毙他，这位小兵被吓跑了，他认为犯错误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爹娘，就跑到滁县琅琊山大庙里当了和尚，头上做了戒疤，起了法号，后来和庙边上一户人家的一个比他大十二三岁大姑娘喜结良缘。有人提议要把和尚抓回来，罗师长笑笑：出家了，慈悲为本，算了。

我们在金牛山打了胜仗后，淮南大众剧团立即赶编了金牛山凯歌的歌子，使全路东家喻户晓。路东的几万民兵，随口都能唱出来。尤其是淮南大众剧团曾深入边缘区、游击区，演出过“李桂五”、“劳动人民儿子”、“护城桥下”、“送子参军保家乡”、“同志，你走错了路”等剧目，还和二师的抗敌剧团、文工队、五旅前锋剧团联合演出著名歌剧“农村曲”、“黄河大合唱”，盛况空前。罗师长更是喜欢这个剧团。在战火纷飞的1944年，罗师长还挤出时间，参加地方民兵、剧团活动。天高县委宣传部与铜城镇民教馆，在路东名为小上海的铜城，举办天高县一百个民间剧团大会演和二千民兵大演习、大比武、大检阅。有些民兵就是演员，有些演员就是民兵，这一文一武活动，轰动了路东八县，也震惊了长江南岸的伪总统府。那天，罗师长带着一个警卫班，陪同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范长江来了。

铜城镇民教馆，坐落在探扒街一个地主家大院内，院前是一个开阔的广场。上午8时，罗师长和淮南区党委副书记兼天高县委书记李世农，陪同范长江一出现在主席台上，还未等主持大会的何诚介绍，下边几千人掌声雷动。罗师长满面春风，笑的像尊弥勒佛。他身边是誉满中外的大公报记者，写过《中国西北角》、《塞上行》、《西线风云》三本游记，向全世界公开报道



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为罗炳辉墓碑题词

中国工农红军活动的奇迹。他于1939年在重庆经周恩来亲自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而范长江认为能和罗师长亲临大会,也是一种荣誉,因为罗炳辉在长征前是红十二军军长,长征时则是第九军团司令。此时,席地而坐三千多县区乡干部、战士、教师、文艺工作者、社会青年、乡镇民兵、农民剧团演员,人人屏住呼吸,异常肃静,听取范长江流水似的国内外形势报告,报告长达三个小时,当有人用纸条传向主席台,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南京离我们近在咫尺,侵华日军头目之一冈村宁次就住南京,可我们为什么不怕时,范长江说,日军正忙于太平洋战争,无多余兵力抽出扫荡。他望了望身旁的罗炳辉说,更主要的是我们的罗师长指挥了几个旅,十万民兵,保卫了华中。并用许多趣闻实例说,距离南京直径150华里,好马跑五个小时便可到达,可算是一马之地,能够坐在这里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放心安全地进行会演,军民同乐,本身就是一个最生动的说明,敌人是不可怕的,我们必定是要胜利的。

罗师长坐在范长江旁边,不时频频点头。范长江的报告,句句打动人心,沁人肺腑,鼓舞了军民士气。

范长江从眼神里看出罗师长对他的报告支持、拥护,满意地用诙谐语调,即兴作了一副对联:无锡山上本无锡,长江边住范长江。引起了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罗师长和范长江,白天看民兵比武,检阅各种队形,晚上则在汽油灯下看演出。只要剧团演出,不管白天或晚上,两位特邀首长在李世农、何诚陪同下,总是场场出席观看。

会演结束,罗师长亲自送范长江回泥沛湾新四军政治部。

罗师长办的干部子弟学校,校长是资历很深的老红军,名叫廖碧臣,他在大别山商城

起义入伍,后编为红四方面军。廖碧臣到延安后,曾和毛主席在一个党小组,而且是组长。抗日开始,罗炳辉、廖碧臣二人,都被派来安徽皖东,一个在地方搞教育,一个在部队搞军事。罗师长不管战事如何繁忙,军务如何缠身,经常要到新四军淮南干部子弟学校去看望师生。学生来自二师军部和地方,也有来自上海、南京等地下党干部的子女,还有是来这里参加整风的领导干部的子女。如张云逸、郑位三、钱俊瑞的子女都在这里读书。五百多学生有一半是沦陷区的,一半是解放区的,其中小部分是地方干部子女和烈士亲属。这里学生绝大部分是公费,从帽子到鞋袜,连牙刷牙粉都是公家供给,女孩子的卫生费,都和干部一样发给。学生们自己种菜,食堂喂猪,经常可以吃到肉食,蔬菜可自给自足。

这天下午,罗师长在丰塔广场,没有扩音设备,站在那儿,向同学们作了两个小时国内外形势的报告。我当时是报社记者,我还清楚地记下了几句话:“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鬼子的日子不远啦!”并寄予无限希望,说:“你们都是新中国的主人,新中国的栋梁之材。”这

给小同学们很大的激励。

从新四军淮南干部子弟学校培养的数以千计的同学,确实已成为社会主义的栋梁之材。

保护陈毅

刘少奇在华中去盐城转赴延安时,安排了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安排陈毅代理华中军分会书记。1943年1月10日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秘密迁到二师驻地黄花圪。在这里,开始了整风。饶漱石规定新四军各师只去两人,无需地方同志参加。二师谭震林政委和罗师长都去了。饶漱石在黄花圪召开紧急会议,在会上他发动围攻陈毅,采取突然袭击,把事先罗列好的所谓十大罪状公布开来,罗师长不禁咋舌。陈毅从罗炳辉发言中,听出是出自坚持正义、维护真理、团结同志的与人为善态度,不是像有些人那样,用一棍子打死的恶劣手段。

整风正在火候上,陈毅痔疮发着,罗炳辉请来当地名医宫乃泉为陈毅治病。罗师长细心安排食宿和安全保卫工作,和区党委宣传部长张劲夫住一个庄子上的两头日夜守护,使得陈毅稍微安静下来,感到同志式的温暖。罗师长还经常陪陈毅在室内或树阴下下棋。一天,在罗师长连赢两盘棋后,说让军长休息一会儿吃饭,陈毅不答应,要求再下一盘,他一边把黑子抓在手上,捏来捏去,心有所思,再把棋子摆到棋格里,一边义语双关地说:“真理,在我手里,正义一定会使我获胜。”罗师长心领神会,悟出饶漱石已发电报到延安状告陈毅,便随口说:“他发,你也发。”陈毅感激说:“对!他发,我也发,不过,要借用你的电台。”

1943年11月,陈毅奉中央命令返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并代表新四军参加“七大”代表会议。他临离开黄花圪军部时,向当地父老乡亲,依依惜别,并挥笔赋诗:

战斗相依久,初别意怆然。

长记叮咛语,早去复早还。

事过十一年后,北京发生了高岗、饶漱石事件,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开过,各大区、省委进行传达。由陈毅在南京“总统府”向几千人作了传达。我随曾希圣在南京学习一个月,解决安徽党内有关问题,陈毅始终参加了。

一个星期日,我随陈毅、刘伯承、柯庆施、江渭清、曾希圣等,驱车到中山陵,我们顺着紫金山下的谷地,慢慢悠悠走去。这时,陈毅从高饶事件谈到罗炳辉的为人,他高度评价罗炳辉一生的主要长处,缅怀地说:“罗炳辉在我们高级干部中,是一位好干部,好指挥员;在党内斗争中,他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好同志,可惜辞逝过早,他还不到五十岁啊。”

(责任编辑 刘文)



在淮南抗日根据地的罗炳辉

在工农红军长征之前，在广西百色起义的红七军，首先经历了一次曲折艰辛的小长征。本文真实记叙了这一壮举，也真切地记叙了张云逸的重大功绩。

张云逸与红军第七军

● 张广华

—

1929年春，蒋介石与李宗仁桂系双方调兵遣将，将要开始互相厮杀之际，桂系将领李明瑞、杨腾辉等被蒋介石收买，突然倒戈拥蒋，桂系宣告失败。5月初，蒋介石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区主任。

俞作柏多年来接近中国共产党，其胞弟俞作豫（李明瑞姑表弟，李部团长）是中共党员，曾参加1927年12月广州起义。俞作柏、李明瑞执掌桂省大权后，要求中共尽快派人来广西工作。

中共中央当即派出有丰富军事经验的张云逸前往广西。

张早年是同盟会会员，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1926年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上海到香港后，由中共南方局叶季壮写信介绍到广西找党组织。张云逸途经广州时，又让他的同乡、同学，广西海军司令陈策给俞作柏写了推荐信。7月张云逸到达南宁。俞作柏一听张云逸是北伐军铁军少将师参谋长，作战勇敢，谋略过人，立即予以重用。

两个月后，邓斌（即邓小平）、陈豪人、袁任远、龚鹤村、叶季壮、李谦、许卓、冯达飞、李干辉、沈静斋、余惠、袁振武（即袁也烈）等相继到达广西。他们都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领导下进行工作。

张云逸、邓小平等集中主要力

量进行兵运和统战工作。俞作柏很快释放出罗少彦、莫文骅、何健南、吴西、陈可福等人，他们都被分派到省政府和李明瑞的部队里工作。

张云逸先是担任教导大队副大队长。其主要任务是对初级军官进行训练，实际上是培训革命骨干力量，为建立新的革命武装做准备。

全大队共有一千多人，多是由李明瑞、杨腾辉两支部队抽调来的班排长，从两广地方党派来的工人、学生党员，均分派到教导大队各个连当干部或学员。在连队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加紧对学兵进行革命思想工作，及时发展具有思想觉悟水平的人入党，在两个月左右就发展三百多名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我军副总参谋长的李天佑上将，就是这时入党的。

李明瑞知道，北伐战争中张云逸所在的战功卓著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由于有许多共产党员在其中做思想政治工作，这支部队才成为铁军的。张云逸治军有方，就在他抓教导大队很有成绩的时候，李明瑞特地要他兼任第四大队队长，让他来整顿这支由散兵游勇组成的部队。

张云逸带着由他推荐任副大队长的李谦一到第四大队，立即着手发动群众，揭露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的军官。张云逸当即严办了两个营长，连以下军官，除撤职一部分外，多数送到教导大队进行教育改造。同时，由教导大队调来百余名党员，

担任连排班各级骨干，让苻录、何子祁当了营长。连以下军官，基本上都换成了共产党员。在进行整顿教育基础上，大量招收工人、农民和学生参加，只一个多月，部队由原来1000多人发展到2000多人，面貌焕然一新。

—

1929年8月，汪精卫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准备发动反蒋战争，策动张发奎的第四军攻打广东的陈济棠，夺取广东作为反蒋基地。为此，便派薛岳去南宁游说俞作柏、李明瑞一同起兵反蒋。

当时以广西省政府秘书合法身份作掩护的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负责兵运工作的张云逸还没有相互见过面，但一致认为，俞、李返桂只有三个月，政权初握，部队还不巩固，经济困难亦多，反蒋很可能失败。因此，极力规劝俞、李不要冒然行动，以免遭致严重损失。但俞、李不听，遂在10月1日，于南宁举行反蒋誓师大会，宣布由俞作柏任南路讨蒋军司令，李明瑞任副司令，还发出通电。大会之后，李明瑞找张云逸谈话，要把教导大队、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均开往前线作战。张云逸婉转谢绝说：

“教导大队、警备第四大队与第五大队刚组建不久，训练不足，战力有限；更重要的是，你们到前方作战，后方的安全与秩序非常重要，如果把这些部队都调到前方，后方一

旦有情况,那就不好了。我这是为大局作想啊!”

李明瑞觉得有道理,便欣然同意,当即任命张云逸为南宁警备司令。

俞、李率队出发后,张云逸已预感到失败。他立即从四大队、五大队各抽出一个营去左、右江地区,协同当地党组织,做建立根据地的准备。

哪知俞、李反蒋战争刚刚发动,他们的吕焕然、杨腾辉和黄权等师旅长就被蒋介石收买,李、俞只剩下身边的几个马弁,黯然逃回南宁,张云逸得知前方失败消息后,随即以自己合法身份把南宁军械库的大量枪支弹药,搬到邕江的几十艘船上,准备撤退到右江去。

10月14日,警备第五大队由俞作豫率领向左江开去,兵败回到南宁的俞作柏、李明瑞随同第五大队前往龙州。

10月17日,邓小平率领党委和地方干部,随军械船和警卫部队,溯右江而上,张云逸率教导大队、第四大队由陆路掩护军械船前进。军械船抵达平马时,经叶季壮介绍,张云逸与邓小平第一次见面。过去几个月里,为了保守党组织的秘密,他们一直未能相见,现在党组织可以公开了,战友相见,分外亲切。张云逸与邓小平研究决定,暂时用不上的重武器和大批弹药,立即疏散到东兰、恩隆山区去保存,并决定第四大队一个营留驻恩隆,一个营驻恩阳那坡,一个营去果德,领导机构率领教导大队、特务营去百色。10月22日,邓小平、张云逸、袁任远、叶季壮等率领机构及直属队到达山城百色。

10月23日,部队党委(红七军成立后改为前敌委员会)在邓小平主持下召开会议,做出四项决议:第一,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第二,整顿、补充部队,实行官兵平等,广泛

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污与虐待士兵群众;第三,组织与武装群众,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由地方党组织把枪支发给群众,以便开展反霸斗争;第四,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巩固与扩大部队。

按照部队党委的决议,张云逸向官兵宣讲政治形势、民主生活、反对军阀主义。经过发动群众,深为士兵痛恨的警备第四大队第三营营长梁祝南,以及一些旧军官和兵痞,有的被立即撤去了职务,有的被调到教导队当学员,有的被“礼送出境”。同时,开展军事训练,张云逸亲自为官兵讲解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和苏维埃的性质和任务。广大官兵的政治思想觉悟很快有了新的提高,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

为了筹措起义活动经费和实现对右江各县政府的领导,张云逸以“右江督办”名义,通知各县税务局长把税款全部上缴,并召集各县长到百色开会。顺利地收缴三支县警

备队和商队的许多枪支弹药,并征得税款数万元。

此后,右江各县的政权即为革命军队和当地农民武装所掌握。这时警备第三大队长熊镐企图不轨,张云逸决定先发制人,将其一举歼灭,为开创右江局面扫除了最后障碍。

三

11月上旬,中央传来指示:中央批准你们的建议,要你们在左、右江地区创建根据地,创建新的红军。颁给的番号是红七军,军长为张云逸,政委为邓小平。同时,中央也批准左江地区的部队编为红八军,军长俞作豫,政委邓小平。

部队党委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即12月11日,成立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会议结束后,邓小平率领一些干部于11月下旬到左江去布置工作,随之由那里经越南海防、香港去上海报告工作。



第二次国内
革命战争中的张
云逸

在邓小平离开百色后,张云逸根据党委决定,把部队编成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李谦任司令员;第二纵队,胡斌任司令;第三纵队,韦拔群任司令。同时,扩大教导总队,由各纵队和地方武装中,抽调班排连长和优秀的战士来训练,以培养初级干部。韦国清等就是当时从第三纵队调到教导总队学习的。军部的机构也建立起来,参谋长龚鹤村(后叛变),政治部主任陈豪人,供给部长为叶季壮(后为政治部主任)。

红七军在12月11日正式成立的时候,山城百色充满着紧张而热烈的革命气氛。一面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鲜艳的红旗在部队驻地上空迎风飘扬,街头巷尾,张贴着盖有红军第七军大印的布告。

百色城城,工人、市民,近郊、农民以及学生等各界群众,高举大刀、长矛、锄头,敲锣打鼓,走上街头,欢庆自己的解放。

百色起义不久,粤桂战争再起,南宁比较空虚。1930年1月中旬,张云逸参加红七军前委代理书记陈豪人(此时邓小平还在上海)在平马主持召开的前委会议,决定红七军的主力部队向右江下游开进,待红八军成立后,请李明瑞到右江共同指挥部队,两军待会师后共同攻打南宁。

会后,张云逸把这个决定电告在左江地区的李明瑞。2月1日,红八军在龙州成立。

李宗仁得知红军要攻打南宁极为惊慌。他从与粤军作战前线抽调四个团兵力回师进犯右江根据地。经过三昼夜的激战,我毙伤敌500多人,红七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英勇牺牲,我军也伤亡300多人。红七军全线撤退。

红七军在向七里区撤退途中,根据李明瑞的实际表现,张云逸与陈豪人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两天之后,红七军撤到凤山县,

张云逸决定红七军在这里进行休整。

3月初,中共红七军前委在盘阳举行会议。会议一致认为,根据右江地区形势的变化,需要转为游击战争。决定到外线去打游击,方向是桂黔边境。红七军一、二纵共三千多人,在张云逸、李明瑞的率领下,且战且进,于4月初进入贵州境内。

4月30日,红七军出敌不意攻下黔北的榕江县城。这一仗,红军缴获三门大炮,600多支枪,十多万发子弹,还有一座无线电台,其他军用品无数,共计歼敌500多人,红军伤亡200多人,已是特务连连长的李天佑负了伤,连长杨光牺牲。

部队在榕江休息三天,补充了不少新战士,筹得十多万元经费。

张云逸考虑到榕江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后方基地,不宜久留,决定回返右江。部队沿着江岸行进,辎重和伤病员用大小50只帆船顺流而下,五天后即抵达黔桂边的富禄镇。王家烈率领五个团从后面追来,要求红军把大炮、电台等物资留下来,红七军佯装第二天归还,当夜过江时把搬运困难的辎重,包括几门大炮沉到河中,第二天,黔军赶到河边,已无船可用,只好望河兴叹。

四

5月中旬,红七军胜利返回东兰地区后,这时,邓小平于2月7日从上海回到龙州,4月5日由左江来到东兰武蒙。5月中旬,张云逸、李明瑞率领红七军回到河池时,邓小平即由东兰赶到河池与张云逸、李明瑞见面。现在他们了解到百色敌军力量不大,便决定尽快回师百色,再次解放右江地区,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壮大红七军的力量。

6月上旬,张云逸与李明瑞率领红七军第一、第二纵队抵近百色城外。守城兵力不足1000人。战斗到当日黄昏,只剩下长蛇岭的大

碉堡未能攻下。张云逸与李明瑞决定使用山炮轰击,现有山炮只剩下三发炮弹,一定要保证发发命中。张云逸要山炮抬到山上去抵近射击。山炮很快架设在离碉堡200米一个死角处。李明瑞亲自瞄准,碉堡被打开了一个大窟窿,战士们立即冲上去,突入城内,战斗结束,计歼敌人300多人,缴枪300多支。红七军乘胜东下,迅速收复了右江沿岸诸县。

1930年7月中旬,红七军在果化地区,还对滇军打了一次伏击战。此战打了五天,滇军伤亡600多人,我军也伤亡400多人。

与滇军的战斗结束后,张云逸建议在平马进行整训。还补充3000多名新战士,全军发展到9000人。

五

1930年9月底,经过整训的红七军正准备执行新的战斗任务时,党中央代表邓岗(即邓拔奇)来到平马,传达中央指示,提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全国扩大红军百万”等口号。中央给红七军的任务是:消灭两广军阀,建立两广政权,集中力量北上武汉,与朱毛红军会合。

10月2日,邓岗在红七军前委会上传达中央政治局6月11日通过的决议和中央对红七军的指示后,前委成员有不同的意见。张云逸等认为,红七军成立时间不长,武器装备很差,人数不足万人,去完成中央赋予的打下柳州、桂林,消灭两广军阀等任务,是极其困难的,不赞成把红七军拉出去攻打大城市。邓岗与陈豪人、龚鹤村等人则极力主张执行中央指示,并有借此机会不让邓小平当政委的架势。在这种情况下,张云逸意识到,如果一味反对的话,将会造成分裂局面,就对邓小平说:我们还是暂时执行中央指示,待走不通时再说吧;邓小平同意了,于是会议决定按中央指

示执行。

10月3日,在奉议县田州镇东北草坪上,举行了红七军出征誓师大会。

11月初,红七军各个纵队先后抵达河池。

11月7日,红七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河池召开。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在听取邓岗传达的中央路线(即立三路线)后,与会者表示拥护,并决定贯彻中央指示,提出了“打到桂林、柳州、广州去”,“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等口号。

《二》改编红七军为三个师,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为政委。十九师师长由军参谋长龚鹤村兼,邓小平为政委;二十师师长为李谦,军政治部主任兼政委;二十一师师长为韦拔群,政委为李朴。军部设有炮兵营、教导队、特务连等直属队。

《三》改选前委,陈豪人被选为书记,邓小平、张云逸、李谦、龚鹤村、黄一平、袁任远等为委员。

《四》开除雷经天的党籍。

会后,向全军正式宣布:红七军第十九师、二十师攻打柳州、桂林等城市及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二十一师大都编入十九、二十师,由师长韦拔群带一个营返回右江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

11月9日晚上,张云逸为韦拔群送行。在皎洁的月光下,两位战友边走边谈,不知不觉之中,他们已走了二十多里,韦拔群劝张云逸不要再送了。他望望张云逸身后,只带了两个警卫人员,说:“军长,这一带是游击区,这样走我不放心,这一带我比较熟悉,让我送你一程。”于是韦拔群又带着连队回送10多里,张云逸无论如何也不让他再送了。此时,他们才在难舍心情下握手告别。谁知这一别竟成了永诀。

11月10日,红七军占领怀远镇。原来计划攻打宜山县庆远镇后下柳州。到怀远后,弄清了敌情,张

云逸和邓小平、李明瑞等认为,庆远是敌之重镇,敌必死力固守,反对攻庆远,主张及时渡江向桂林前进。把持红七军大权的邓岗、陈豪人、龚鹤村等人坚持按中央指示攻坚,结果,战斗下来,红七军损失300多人。八月下旬,部队进入湖南向武岗发起攻击。连攻六天未果,湘军何健又遣兵来援,只得连夜突围,过河时浮桥折断,红七军人员伤亡很大。第五十五团团长何莽突围时牺牲。此役部队损失500多人。

红七军撤出武岗走了二天,部队已很疲惫,又被敌人派来的特务引入敌包围圈。又连夜突围,进入东安县境。

红七军经过桂、黔、湘边近两个月的艰苦转战,部队减员三分之一以上。中央代表邓岗和前委书记陈豪人见到形势不妙,就借口向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化装成商人离开部队前往上海(邓岗到上海找到党中央后,在做地下工作时被国民党逮捕杀害,陈豪人脱党后到香港参加“第三党”,后亦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前委决定仍由邓小平任前委书记,此时,前委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改变硬打攻坚的办法,到广东小北江一带去建立落脚点。

1931年1月8日,红七军到达江华,此时部队只剩下三千五百多人。

前委决定在桂岭休整几天,并把部队缩编为两个团。新的编制为: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政



李明瑞

委邓小平,下辖第五十五团,第五十八团。

桂岭整编后,红七军打下连县,在那里住七天,广东军阀纠集8个团兵力来攻。部队与敌激战两昼夜。1931年2月初,部队到达乐昌县梅花村。此时,前委根据李明瑞在征战中表现和本人要求,批准他为正式党员,并根据工作需要,补选他为前委委员。

2月3日,红七军在梅花打了一场恶仗,虽然歼灭敌人一千多人,自己也损失七百多人。张云逸回忆说:这一仗我们损失很大,特别是干部伤亡大。五十五团副团长李谦同志(原二十师师长),营长章健同志(原五十六团团长)牺牲了,五十五团团长(原十九师师长)龚鹤村、营长袁也烈(原五十九团团长)及李显负伤了。当李谦同志牺牲前,他的警卫员向我报告,说“李师长要见张军长”,我立即到他那里去,只见一

个同志背他迎面走过来,我赶上去与他握手,慰问负伤情况,他向我告别说:‘我不能同军长一起走了,你要保重、保重。’说完这句话就断气了。当夜我们将他葬于梅花村山地。

六

2月5日,红七军来到乐昌河边。部队决定渡过乐昌河,向江西前进,与朱毛红军会合。当天中午到杨溪渡口时,决定邓小平、李明瑞率第五十五团先过河,张云逸率第五十八团及军直属队作掩护。当时只有两只船,在第五十五团和第五十八团一部分部队过了河以后,大批敌军从韶关赶来,直扑乐昌河,过河的红军与敌展开激战,由于敌军不断增加,第五十五团被迫北退,与未过河的部队失去联系。张云逸随即周密组织未过河的600余人,后撤30余里,沿河北上,快速行军到石坪,在当地群众有力支援下,渡过了乐昌河。

1931年2月中旬,张云逸率领第五十八团到达苏区的酃县黄泥潭,全村群众兴高采烈地欢迎红七军的到来。

正在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开展群

众工作之际,汝城民团地主武装来犯。张云逸指挥第五十五团和酃县赤卫队把敌军彻底击败,杀伤与俘虏敌100多人,缴枪100多支。

2月下旬,第五十八团到达水口镇,与湘赣革命根据地独立一师第三团会合。张云逸与团长王震以及两支部队在山上见面。3月中旬,第五十八团与尾追而来的湘军进行激战,打死打伤敌人三百多人,俘虏一百多人,缴枪百余支。

接着在吉安永阳镇,取得了歼灭敌军一个团、俘虏八百、缴枪九百余支的重大胜利。

永阳战斗胜利后,张云逸经湘赣省委同意,带第五十八团南下寻找第五十五团。第五十五团渡过乐昌河之后,甩掉敌人尾追,于1931年2月上旬到达崇义地区。部队在崇义的工作安排后,邓小平政委前往上海汇报请示工作,由许卓暂时代理政委职务。4月初,第五十八团与第五十五团在永新县天河重新会合。

在张云逸、许卓等主持下,中共红七军第二次代表大会五月间于永新城召开。会议主要内容是总结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的行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宣布到中央苏区与朱、毛

红军会合的任务已经完成,今后的任务是保卫中央苏区而斗争。会议认为,雷经天同志经受了党的考验,在艰难的斗争中表现很好,决定恢复他的党籍。

7月11日,根据张云逸的意见,红七军在于都县的良口渡过赣江,进入中央苏区。22日,在桥头镇与中央红军会师。

会师后不久,张云逸与李明瑞在瑞金北面的壬田寨,受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的亲切接见。中央军委对红七军的战绩和革命精神给予高度评价,特授予“转战千里”的大红锦旗。

1931年10月,红七军新上任的政委葛跃山积极执行“左”倾的错误肃反路线,李明瑞惨遭迫害被打死。正在组织部队打土豪分田地的张云逸,知道这一情况后,不顾个人安危,挺身为其辩护,与“左”倾机会主义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1931年11月,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张云逸当选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随后不久,被调到红军第一方面军任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

(责任编辑:刘家驹)

图春书社邮购热线

《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19.50元;
《沉重的1957》,叶永烈著,百花洲出版社出版,7.50元;
《毛泽东的秘书们》,叶永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3.00元;
《历史的惊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实》,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8.00元;
《宋庆龄流亡海外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0.50元;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8.00元;
《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及晚年生活》,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13.80元;
《江青传》,叶永烈著,作家出版社出版,23.20元;
《乾隆传》,唐文基著,人民出版社出版,23.20元;
《朱元璋传》,吴晗著,人民出版社出版,30.50元;
《开创人生第二个春天》,王兴华著,财经出版社出版,17.00元;
《蒋介石的侧室姚冶诚》,汤雄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3.00元;
《书的

出版知识170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8.80元;
《巴山夜话》,魏明伦著,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18.00元;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58.00元;
《一世枭雄蒋介石》,金城出版社出版,24.80元;
《延安秘事》,红旗出版社出版,39.80元;
《阅微草堂笔记》,纪晓岚著,巴蜀书社出版,18.80元;
《楚辞集注》,朱熹著,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24.80元;
《昨非庵日纂》,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精装),195.00元;
《老宣放言录》,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18.00元;
《为中国声辩》,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29.80元;
《三希堂画宝》,青年出版社出版,150.00元;
《二十四史订补 全十五册》,北图出版社出版,6000.00元;
《北京图书馆藏青铜器全形拓片汇编》,北图出版社出版,2400.00元。

上述图书邮购请另加10%的邮寄费,汇款地址:北京文津街七号图春书社;邮编:100802;联系电话:(010)66175620;66176633-301;联系人:黄文新。

国共秘密使者张子华

● 韩培基



巡视陕北，为 刘志丹和谢子长释嫌

1934年9月，张子华（本名王绪祥）刚20岁，就受到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派遣，赴陕北苏区视察。他化名“黄汉”，职务是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巡视员。

1934年9月陕北的形势是：当地并存着两个边区，陕北边区和陕甘边区。陕北边区的创建人和领导人是谢子长，在不久前的反“围剿”中负了伤，正在安定地区治疗，不能正常工作；陕甘边区的创建人和领导人是刘志丹，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早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区，无论从地区、人力、物力和军事力量都不如陕北边区强大，特别是出于历史上的原因，两个边区的领导人之间发生了

一些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团结，不能充分发挥两个边区的革命力量来反“围剿”；而这个时刻，敌人却积极地准备着第二次“围剿”，形势是严峻的。张子华的到来，正当其时，首先找到了陕北边区的特委组织部长郭洪涛和常委李铁轮，了解到上述形势后，张子华当即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说服这两个边区的领导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张子华以中共北方代表巡视员的身份给刘志丹写了封长信，分析了全国和陕北的斗争形势，阐明了利害关系，希望两个边区（两个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对敌策略，并鼓励刘志丹在大敌当前、陕北革命斗争形势处于十分困难之际，挺身而出，领导两个边区军事力量来迎战敌人发动的第二次“围剿”。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张子华还特别支持陕北特委制定了“坚壁清野”和“平分土地”的政策。

此后，张子华返回北平向北方代表报告了巡视情况，北方代表批准了张子华与郭洪涛、李铁轮所拟定的决策与方案。

刘志丹接到张子华信后，很受启发，接受了张子华的建议。1935年1月，刘志丹亲自来到谢子长医伤的安定，同谢子长研究了张子华的建议。他们消除了误会和隔阂，尽释前嫌，增进革命的团结，并着重商讨了陕北边区和陕甘边区今后的统一领导和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等问题。

1935年2月5日，陕北和陕甘两个特委的领导同志在安定地区的

周家峪举行了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陕甘边区军委主席刘志丹，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惠子俊和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崔田夫和组织部长郭洪涛等。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惠子俊任特委书记，刘志丹任军委主席，统一领导两个边区的工作，统一指挥两支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刘志丹还从他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中抽调了部分干部充实到红二十七军中去。

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以及地方游击队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经过小品沟、杨家园子等几次重大战役，粉碎了敌人精心策划发动的第二次“围剿”，进一步拓展了革命根据地，使这两个边区连成了一片，为后来经过长征北上抗日的中央红军奠定下一个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

国民党发出了 国共和谈的信号

1935年初，张子华来到上海，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负责人），兼任联系河北省委的政治交通。这个时期，正是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

5月，上海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张子华改任豫、鄂、陕边区特派员。同年12月一项特殊使命放在了张子华的肩上，上海中央局特科委派他以“长江局”代表名义，同南京政府交通部劳工科科长谌小岑接触，谈判两党今后联合抗日的问

上海特科曾经估计到：对一个重大问题，决不会是让一个科长来同我们接触和谈判，肯定这位科长是代表着南京政府中一部分人的最新动态。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后，毅然决定派机敏的张子华去会见这位谏小岑科长，着重摸清他们的政治背景。使人赞叹的是，这时候的张子华年仅21岁。

上海特科的判断是正确的，决定这次接触和谈判的，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先生。

1936年元月3日晚上，张子华同谏小岑在上海四马路（现南京路）惠中旅社见了面。三天后，张子华正式向他通报了中共方面同意进行两党言和、一致抗日的谈判。张子华建议：国民党方面应派出一名代表与他一同去陕北苏区和中共中央领导人面谈。

乘张学良座机 由西安飞抵延安

国民党决定了随张子华去陕北的代表，通知张子华时，张发现这个代表原是共产党的叛徒，于是严正予以拒绝。

这个时候，宋子文也接受了蒋的指示，他找到他二姐宋庆龄，请宋庆龄将国民党的这一意愿转达给中共中央。宋邀请董健吾去陕北。

董健吾化名周继武，就是美国记者斯诺在他写的《西行漫记》中的王牧师。董是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地下共产党员，也是宋子文的同学。

上海党组织派张子华与董健吾同行，他们还带上了孔祥熙任命董健吾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宋庆龄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件，于同年1月下旬到达西安。正遇上陕北前线紧张，又降大雪，不能成行。他们携带孔祥熙发的委任状，拜访了张学良，张派自己的专机将他们送到延安，然后又派骑兵护送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中共中央对张子华、董健吾的到来十分重视，当时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秦邦宪和军事领导人张云逸都热情地出城欢迎，及时听了他们的汇报。

中共中央在了解到蒋介石开始转变恐日反共政策，并希望与中共取得某些妥协的情况后，即电告正在山西前线指挥东征作战的毛泽东和彭德怀等领导人。国共两党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在宋庆龄的推动下，经张子华和董健吾的千里迢迢奔走，终于接通了。

毛泽东、彭德怀等经过研究后，于3月4日电告瓦窑堡同国民党谈判的五条原则：

1. 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2. 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3. 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结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进攻；
4. 释放政治犯，允许人民政治自由；
5. 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要董健吾将此密件携交宋庆龄，命张子华即刻到东征前线亲自向毛泽东、张闻天汇报在上海和南京政府接触和洽谈情况及上海地下党的情况。

3月下旬在山西交口大麦郊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还介绍了张子华汇报的南京政府情况。

会后，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去做恢复组织的工作，张子华仍负责与南京政府的联系，冯、张两人同行。

张子华同冯雪峰离开瓦窑堡路经西安时，张子华仍以客人身份，拜见了张学良并向其通报了中共中央抗日的决心和国共两党的联系情况。

张子华回到上海后，四月间，曾

养甫在家中接见了张子华，张子华向他提出两点要求，希望他向国民党最高层反映，即：国民党中央应披露联共抗日的具体办法，形成书面文件；由南京派代表到陕北与中共中央直接会谈。

曾养甫答应将尽快地向他的上级报告。陈立夫于5月间向曾养甫口授了四项谈判条件：

1. 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抗战；
2. 共方武装参加对日作战时，待遇同中央军；
3. 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
4. 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与经济理想。

这是国民党对张子华第一个要求的答复。对第二要求是以目前尚无适当人选可任代表，可由中共方面派人往返联系。不久，曾养甫告诉张子华请他转告中共中央，国民党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来南京会谈。

仆仆风尘，奔走 于南京和陕北道上

张子华于5月间又一次返回瓦窑堡。周恩来听取了张子华的汇报后，第三天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了同国民党进行和谈的方针。周恩来分别给谏小岑、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著名教授时子周等人写了信，阐述共产党对和谈抗日的宗旨，并请曾养甫等人到陕北来共商抗日大计。张子华回到南京向有关人递交了周恩来的信件。

此后，曾养甫给了张子华一个汉口电台的呼号，便于双方联系，还给周恩来写了信，要求派人到南京谈判。

张子华于8月间再次返回陕北保安。

9月上旬，张子华携带中央和周恩来的信件，来到南京。正值曾

养甫和陈立夫在广州，张子华又赶到广州向湛小岑递交了周恩来写给陈立夫、陈果夫、曾养甫的信件，并要求同他们会晤。

9月27日曾养甫与张子华见了面，提出了国民党关于和谈的四点建议：

1. 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
2. 红军的名义可以不要；
3. 中共代表可参加国民大会；
4. 即派人具体谈判。

曾养甫还提出请周恩来来到广州或香港会晤，并取得为周恩来准备好的赴香港的护照。张子华开始了第四次陕北之行。

张子华到达陕北后，因形势有变，联络暂告中止。同年11月，张子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对外称外交部）副局长，局长为李克农。

这时的张子华仅22岁。

西安事变， 随周恩来赴西安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陕北组成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张子华任秘书，随同代表团到了西安。

在西安的一段时间，张子华根据周恩来指示，积极开展了营救被扣押和被包围在青海和甘肃的红军西路军官兵的工作。多次拜访了回族著名人士马德涵，马老是青海军阀马步芳的老师，马老为张子华的诚意所感动，答应去甘肃河西找马步芳，营救那些正在遭难的红军官兵。后来，有不少被营救的同志回到了陕北，为革命继续做出贡献。

英年早逝， 留给后人的叹惜

1938年1月，经陕甘宁边区政

府交际处长金城的介绍，张子华与抗大女学员李德贞女士结婚。

1939年9月张子华以“政治嫌疑”被拘捕，他多次写了申辩，三年过去，仍无答复。1942年因心情抑郁，又患上肺病，含冤病逝于延安狱中，终年28岁。

张子华逝世后将近半个世纪，像众多的无名烈士一样，无声无息地从一些人的印象中渐渐消失，连他的家乡宁夏中宁县的人们也不知道张子华就是他们的同乡、同学和亲属的王绪祥。

41年后，张子华又怎么会被发现是个冤案迅速昭雪了呢？当中央和有关学术机构进行党史研究的学者们在考察抗日战争，国共合作等方面的史料时，在若干焦点问题上，就是找不到张子华这个人的下落，他们长期陷入困惑之中。当他们发现张子华是宁夏人时，才抱着一线希望，来到这座塞上古城，寻觅张子华的历史足迹。

学者们找到了民革中央监委张致和老先生，疑团才被解开。

张致和年长张子华一岁，是表兄弟，又是同学。他同张子华在北平读书时期，经张子华的引见，认识了饶漱石并担任“交通”。

1933年张子华在天津组织工人运动，因被发现有参加工人运动嫌疑被关押在公安局，经饶漱石指派由张致和找熟人将张子华保释（张子华未暴露身份）。

从《文献与研究》（1985年汇编本第196页）所登载的毛泽东、周恩来在1936年发给张子华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张子华的使命是何等艰巨。电文是：

子华同志：

俭日（指28日）电昨收到，兹复如下：

（甲）请告陈委员、曾市长（指陈立夫和曾养甫）日本新的大举进攻，迫在目前，我方切望南京当局坚持

民族立场，立即准备抗战，我方愿以全力赞助，万不可作任何丧失领土主权之让步，再使全国失望，以符蒋先生七月间对全国人民宣示之诺言。

（乙）当此国难严重之关头，我方正式宣告：只要国民党方面不阻拦红军抗日去路，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红军愿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攻击，以此作为我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表示，静待南京当局回答。但在国民党军队向我攻击时，我方才在不得已的防御方式下给以必要的回击。

（丙）我们提议国民党方面，立即下令暂时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进攻，双方各守原防，以便双方派代表举行谈判。至于恩来飞赴广州会谈，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

（丁）国方未下令停止进攻，双方主要代表未会谈前，我方拟派在沪之潘汉年同志，先与陈、曾会谈，望征同意。

毛、周 9月16日

张子华的历史问题，已于1983年9月26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做出了结论。《结论》写道：

张子华同志青年时期就脱离地主家庭，追求进步，参加了革命活动。30年代，他在党的工人运动，地下工作和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对党的事业是有贡献的。在被审查期间，他坚持实事求是，对党忠诚，表现是好的。现决定解除对他的“政治嫌疑”，恢复名誉，承认其党籍，并通知有关地区、单位做好善后工作。

1985年5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召开了恢复张子华名誉的追悼大会。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拨出专款，资助公开出版了《国共秘使张子华》一书，以激励后人并缅怀先烈。

（责任编辑 刘家驹）

谭震林清廉的一家

● 邓湖生

谭震林 1902 年 4 月 24 日诞生于湖南攸县一个贫苦的矿山职员家庭，同胞兄弟七人，他居第三。由于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的心灵深处自幼就萌发了一股强烈的反抗意识。1923 年，他二哥谭寿林投奔广州，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与叛军陈炯明部作战中英勇献身。同时牺牲的还有其叔父谭瑞成。

1926 年上半年，谭震林经余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踏上了革命的道路，担任县工人纠察队队长、工农运动特派员。同一时期，早年因饥饿而出逃茶陵潞水的五弟谭回生也积极参加了农民协会，成了当地农民运动的骨干分子。“马日事变”后，谭回生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1930 年 9 月，谭震林时任红十二军政委，率红十二军一举攻克了攸县县城。在他率部向江西吉安进军的时候，攸县反动势力以“共匪”坐探的罪名，捕杀了他的父亲谭瑞开和他的大哥谭福元。谭震林的一家，为革命牺牲了 5 位亲人。

建国初期，谭震林担任第一届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和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分别二十多年的几个兄弟得到消息后，先后都主动与谭震林接上了头。老四谭云，解放前被抓壮丁在国民党军队干了十余年，1949 年杭州解放时他随部起义，所以第一个见到了兄长。在各自介绍了曲折的经历后，谭震林根据弟弟的要求安排他到一家工厂当工人。弟弟不干，硬要到公安部门去当干部。谭震林严肃地说：“老弟，你要明白，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不再是朝中有人好做官了，你在旧军

队搞了那么多年，难免沾染了一些坏习气，去工厂当个工人，通过劳动可以洗刷一下，使自己的思想改造过来，当干部肯定不行，当公安干部更不行！”谭云见当“官”的要求没有答应，很不高兴地离开了省政府机关，回去以后又和军管会的同志大吵了一场。军管会的领导向谭震林作了汇报，谭震林拍案而起：“你们给我把他关起来！”军管会遵照谭震林的指示，把谭云拘押了一段时间，释放后，仍按谭震林原来的意见把他安排在某工厂当工人，一直到退休。

也是 1949 年冬，弟弟谭乐春专程从老家赶到杭州，一方面去看看多年未见面的骨肉兄弟，另一方面想通过省主席搞点本钱，开个矿山，把家里搞富一点。没料想到，谭震林把他这种光顾自己小家的表现训斥了一顿，然后耐心地告诉他说，我是浙江省人民的主席，不是我们谭家祠堂的主席，我要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现在解放了，没有了压迫和剥削，只要你自己发狠劳动，暂时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谭乐春觉得老兄的一番话很有道理，春节后便告别兄长回到老家，照旧经营着一间小商店。

家在农村的七弟谭德生，因路费困难，没有去浙江谋事，只是在 1950 年初给兄长去了一封信。谭震林及时回了信，他写道：“希望你和全家人听从当地政府的安排，积极参加减租反霸斗争，为彻底铲除农村的封建势力而努力。”按照兄长的意思，谭德生在土改中成了积极分子，以后当上了乡党委书记。

1956 年 5 月，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的谭震林来到湖南。

他托省委通知攸县县委派人同他七弟一块到长沙汇报农村工作。因为将近30年没见过面,所以谭德生在交谈中详详细细叙述了谭家的变迁,并告诉兄长,自己现在落户在农村,一家靠作田营生。谭震林马上接过话头说:“当农民很好,作田也是干革命嘛!要明白,我们中国是个农业大国,都不想当农民,都不愿作田怎么行!尤其是我们当干部的,要教育自己的子女带头在农村干革命,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贡献!”

七弟谭德生认准了谭震林说的这个道理,几十年来,全家一直安在农村,即使是农村户口转城镇户口热的年头,他也没有向组织上开过口,他生有三男三女,除了通过学习走上工作岗位的和一名退休顶班的外,老伴和长子的一家至今还是农村户口。1976年谭德生退休回家,谭震林写信告诫他:“你已回到农村,这很好,希望你利用这个好的机会,很好地教育后代,教育农村年轻人,使他们认识今日之甜来之不易,以最大的努力加快社会主义农村的建设步伐。”

三年困难时期,谭震林听说家乡有亲人伸手向政府要求照顾,他马上给攸县县委的领导人写信强调说:“有人利用我的名义向你们要东西,批供应物资,这种行为是犯法的,你们必须立即制止!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有什么特殊需要,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制度执行,谁都无权违反国家制度批东西给任何人。这件事请你们向县委和县城各单位领导宣布,并把这一段话在黑板上公布,以便你们能主动地拒绝他们的要求。”

1982年谭震林80寿辰之时,谭德生特地赶往北京看望。他发现哥哥和嫂子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儿女又都不在身边,便主动提出,让自己刚刚高中毕业的孙女进京服侍。谭震林当场应了下来。第二天一大早,谭震林的主意突然改变了,他对弟弟说:“七弟,昨天我们那个想法我看还是不行,我们即算要人服侍,应该由组织上安排,我们不能自己安排自己的亲人,别人不清楚,还认为我们是想把侄女通过这个渠道转城市户口呢。”

谭震林解放后曾七次回老家攸县,平时给



谭震林

兄弟和侄儿侄女的来信也不少于上百封。无论是谈话还是来信,他总是教育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勤俭过日子。七弟谭德生回忆说,解放后从第一次见面到1983年谭震林逝世,他们兄弟几个从不轻易向老兄伸手,谭震林也不为接待他们随便花钱。1957年上半年,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谭震林第一次回到攸县,开展民主办社试点工作。四十多天时间里,没有宴请兄弟及家人,只是在返回北京的那天,通知家在农村的七弟谭德生全家,赶到他必须路过的皇图岭镇汽车站公路旁的柳树下一起照了一张照片,请大家吃了几个包子就告别了。他对弟媳和侄儿们说:“今天就委屈你们了,只吃这么几个包子,说内心话,不是伯伯我不肯花钱,因为这是我们共产党的光荣传统,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勤俭过日子。我们当中央干部,和你们这些中央干部的亲人都要带这个头。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会很快建设好的,到那时候,我再请你们吃好一点。”

(责任编辑 刘家驹)

老科学家 陈芳允 60岁入伍



● 马京生

陈芳允近影

60岁对一般的将军说来,也该到退居二线的年龄了。可陈芳允偏偏就在他60岁那年,才实现了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愿望。

那是1976年,陈芳允郑重地向组织上提出了参军要求。其实,他已经在国防科工委所属基地搞了整整10年的卫星测控系统的建设工作,一直盼望着成为这支绿色部队中的一员。就在这重要的一年,穿上军装后的陈芳允,又写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三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任技术科学部副主任。这之后,他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两次、一等奖一次;主持编写了《卫星测控手册》一书,他和三位老科学家一起联名给党中央写信,促成了“863计划”;荣获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称号,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他80高龄又荣获了首届中国航天基金奖。这个有中国特色的老科学家的晚年,展现了一番传奇的军旅生涯。

以完成各自的功能。这个统一系统可以大大节省卫星载荷的体积和重量,同时也大大节省了地面设备的规模和投资。他的建议得到了国防科工委领导的支持。陈芳允和有关科技人员一起精心设计,使卫星应答机和地面系统两套微波统一系统制成后,安装在渭南和闽西测控站。

1984年4月8日19时20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三号火箭托举起中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飞向太空港。此时,陈芳允正坐在卫星测控中心的机房里,密切注视着火箭卫星的“一级脱落”、“二级关机”、“星箭分离”、“卫星起旋”……全部动作。

4月16日,卫星准确定点于36000公里高度的东经125度赤道上空。翌日,卫星通信试验正式开始,中央电视台电视节目首次传输,乌鲁木齐等边远省区第一次收看到中央电视台从北京直接传播的实时节目。卫星通信还应用于跨洋过海、陆地与海上、海上与陆地以及远离城市之间的通信,微波统一系统按设计圆满地完成了多功能、多用途的任务。中国的卫星测控技术从此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

1985年,陈芳允主持研制的卫星测控系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976年我国为发展地球同步通信卫星,专门成立了卫星通信工程技术协调组,刚穿上军装的陈芳允,在这个技术组负责两套地面测控系统之间及其与卫星之间的“对话”。就是说,通信卫星可以使远隔太平洋的东半球和西半球的朋友们通过电话愉快地交谈,使南沙群岛上的守礁战士清晰地看到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使在公海遇险的航船及时将求救信号发向陆地。可在当时,中国的通信卫星还都在科学家们的脑子里。

陈芳允在1970年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后,他就提出了用“微波统一测控系统”和卫星上的一个应答机相结合,来作为通信卫星发射和定点保持时的跟踪、测轨、遥测和遥控,而不必将它们分为独立的系统

离卫星起飞的神秘峡谷九千公里之外的太平洋上,“远望号”远洋航天测量船的任务是在南太平洋美丽的西萨摩亚附近,跟踪观测卫星从主动段进入转移轨道的入轨情况。

“远望号”是主测量船,在它极其有限的空间里集中了多种数据传输设备,因此通信机、导航设备以及卫星的跟踪和遥测设备之间造成互相干扰,尤其是大功率发

射机一开,各种接收都受到了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起初在主测量船附近增加一艘通信船,主测量船用小功率发射机将数据发到通信船上,由通信船用大功率发射机发回国内。这样既延长了时间,而且多一艘船也增加了人力物力的消耗。

陈芳允首先提出:能不能由测量船在测量的同时实现与国内通信,减掉通信船。

陈芳允通过实地考察,认真研究,提出一种频率分配的计算方法,使各种设备得以同时工作而互不干扰。“远望号”终于甩掉了尾巴——通信转发船。

这项科研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有关专家认为,如果能在其它舰船上广泛推广,它所带来的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将是相当可观的。

在茫茫的大漠里,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坐标而不致迷途;在蓝色的海洋里舰船随时知道自己的位置而确定航向;飞机在广阔的天空中高速飞行时刻清楚自己的方位,卫星导航定位是最有效的手段。

陈芳允参加空间工作之后,一直希望解决利用卫星对地球上运动物体的定位导航。他研究了美国的全球定位——导航星系统(GPS),这一系统全时间工作需要18颗卫星以上,而且通信功能需要有移动通信设备支撑,上下系统极为复杂且不经济。于是,陈芳允早在1983年就提出了用两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上的一段频带,即可确定地面目标任一时刻的位置——“双星定位系统”。经过他的同事刘志遒的详细计算证明是可行的。此项目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陈芳允带领课题组的同志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于1989年9月25日,利用我国两颗通信卫星进行试验,经计算机处理参数,一秒钟后显示屏上就出现了用户的精确地理位置。并且这个系统还可以进行简单的报文通信和时间发播。

“双星定位系统”在测绘、航天、航空、航海、矿山、运输、抢险救灾和国防建设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小型卫星发射简便,使用效益高,造价低,越来越受到各国航天专家的青睐。1992年,陈芳允在世界空间大会上宣读了他和我国地球科学家们共同撰写的《地球环境观测小卫星群系统与国际合作》的论文,在国际上首先提出对地球环境观测的小卫星群系统。该系统对于地球环境的动态观测,特别是对自然灾害和环境保护的监测十分有利。

有关资料说,美国农业以前因自然灾害每年约损失120亿美元。如今利用气象卫星及其他遥感卫星等对灾情进行监测,使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少50亿美元。

陈芳允以卓有成效的科研成果,1985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0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

陈芳允和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四位科学家提出的“863计划”已经实施10周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电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自动化技术、激光技术、航天技术、能源技术以及新材料技术等领域,取得了数千项科研成果,其中有的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有的已应用于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对于增强综合国力,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芳允早年留学于英国,建国前夕回到自己的祖国。1957年,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飞向太空。当时中国科学院利用陈芳允等研制的多普勒仪器,测出这颗卫星的部分轨道参数。我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陈芳允担负了地面测控系统的体制设计和设备研制工作。

如今80高龄的陈芳允仍然奔忙在科研领域里。正当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陈芳允的夫人、原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沈淑敏女士因病住院,陈芳允又要照顾老伴,又要忙着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十七届国际宇航联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宣读了《地球环境观测综合卫星系统与国际合作》的论文,赢得了许多国家的宇航专家们的赞赏。(编者注:陈芳允夫人沈淑敏于1996年11月22日去世。)

在荣誉面前陈芳允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告诉我,他最不爱听中国不行。他对我说:“什么东西都是外国的好,是殖民地思想,这种思想势必影响到中国的发展。”

为了使中国的航天技术跨入世界先进行列,陈芳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抓紧工作。对外面的邀请,凡是和科研无关的,老先生不去凑热闹,他认定了“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时间是宝贵的,对那些热闹的应酬场面他能不去的就不去,尽量把时间和精力用在科研上。

我又想起他1993年夏天写的一首诗:

四十京兆一技人,爱研求实不爱名。

一称专家已过誉,惭愧国人赶超心。

我想,这是老科学家的自谦之词,又是他给自己的真实写照。

(责任编辑 仲文)

更正

本刊1996年第12期第6页,在“孙中山与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的报道中,因疏忽,将出席会议的欧初同志误为欧祁,特此更正。

珠海的“土地神”

● 刘宏伟

整治板樟山记

在珠海城的每一个缝隙里，都浸上了温情脉脉的海风。这是一座海的城市。

海水在某个遥远的世纪里退了下去，原先的海山就成了今天陆地。如今的珠海就是建在从前的海底。浪漫的背景给这个城市带来浪漫的名字。

有一座名叫板樟山的小山，由于横亘在拱北和香洲之间，人们一直绕着它的身子来来去去。

1982年的某天，这山脚下响起了开山炮声。一位香港先生带着他的几百万资产来这里开办了一个现代化的采石场。

那港口处常常停泊着前来采购石料的港澳船只，给香港先生描绘着“石头能够变黄金”的美妙前景。

五年之后，香港先生的前景破灭了。珠海市国土局副局长邓雄，代表市政府正式通知他说，他的那个采石场必须立刻停办，因为市政府要在板樟山开一个隧道，缩短香洲与拱北之间的距离。鬼使神差，隧道口恰恰就在他那个石场的正中央！金色财路堵住了，香港先生肝肠寸断。

香港先生不能接受市国土局提出的补偿数额。给580万的补偿费怎么行呢？他的石场一直在建设

中，往后还要大赚呢！于是，他挥笔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要求补偿的数字：1997万元港币。

邓雄看着这数字微微笑了。1997当然是个极有意义的数字。尤其是在他这个大陆官员与一个香港同胞相对而坐之时。1997意味着血浓于水的手足深情和回归祖国的百年等待。或许香港先生非常偏爱这个数字，但是作为补偿数，显然是大得离谱了。

这次谈话没有什么结果。香港先生理直气壮地提醒着，他要告到北京，告到国务院。

香港先生从省里请来了高级律师，一副要跟国土局打官司的架势。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开始了。双方的律师在珠海三月桃花的香气中开始工作，直到十二月寒流来临，才最后握手告别。那位香港先生最后是拿着政府补偿的1300万港币撤出板樟山石场的。平心而论，为了保护珠海的环境，政府在补偿费问题上真是作了极大的让步。

从拱北到香洲不过两平方公里，采石场就有115个，这类的“斗智斗勇”在停办石场的日子里几乎成了市国土局每日必“上演”的节目。

邓雄的“后台”就是珠海市的市长梁广大。梁广大多次痛心疾首地对邓雄说：“乱开石场，破坏环境，是一种没有文化的野蛮行为。你不要怕，大胆去做，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啊！”

这个无量的功德后来被所有的人交口称赞。天南地北来珠海的人，最令他们眼睛一亮的，就是珠海那典雅明净的市容。

板樟山的隧道已经在1991年打通，香洲到拱北的15公里距离缩短到3公里。周围几十万平方米的土地收归国有后又进行了新的开发建设。这里的地价因此而提高了一倍多，政府用这笔钱将隧道的上下内外整治得有模有样。如今的板樟山隧道已经成了珠海的一景。

国土所的片儿警

徐康可、陈寿文两人并不是警察。珠海市国土局拱北国土所需要他们像巡警那样在自己的“管片儿”上不间断地搜寻可疑点，制止违法行为。

他们在大街小巷巡逻监察已十几年了。一年年辛勤监察积累了经验：一片不该出现的混凝土印痕，一堆突然冒出来的砖瓦或沙石，一个外观发生某种变化的房屋……有时夜间出去监察沙石开采情况，他们甚至可以从擦身而过的某辆沙石运输车上发现异常情况：是从外地买来的或是偷挖本地的……

他们这些年为国家收上来的一笔又一笔的罚款金、补交款数目十分可观。在拱北国土所1995年为

国家收缴的 426 万土地款中,有 380 万是通过监察手段收下来的。

新年伊始的一个上午,我跟着这对搭档上街巡逻。因为有我同路,他们改换成一辆面包车。

我们的监察巡逻车驶进一个名叫大姑姆的村子,停在一座正在加盖楼层的房子前。房顶上的人正忙碌着,没人理会我们的存在。我们就像警察“蹲点”似的坐在车里观察着那座房子。这是一个违章建房的案子,通知书昨天就已经发给他們了,看来他们并没有停工的意思。不过我们现在还不能再去制止他们,因为法律规定他们在接到通知书后有两天的回旋余地。这家农民显然不相信政府会把他盖好的楼层再扒掉,所以抓紧这两天的时间拼命地赶进度。

相比之下银行的人就要“机灵”得多。当我们的巡逻车走到一家工商银行的违章建筑前时,那里静悄悄地没有一个人。刚刚砌了两圈的砖墙灰蒙蒙地趴在从前的草坪上,砖缝里的水泥还没有干透。建房子的人或许是办报批件去了,或许是托关系去了,至少他们没有对那张处罚通知不理不睬。可是他们不经意间撒在马路上的一溜沙子出卖了他们自己。我面前的这对搭档那天循着沙子一路找来,转过一片树阴后就发现了他们的犯规。

坐在这样的车子上很难不生出一一种对土地的责任感,所以这个上午我很想用自己的眼睛发现一个违章的。这对搭档说,那得让小路到村里去。于是我们下车走进一个村子。怪不怪?刚到村口就发现了一个违章建房的。那家的女主人一脸的天真无邪:怎么,我在自己家院里盖个仓库还要报批国土局的呀?这对搭档熟练地配合着用皮尺丈量完面积,迅速写完了通知书。让那女人签字时她叫了起来:我们不建了还不行吗?罚什么罚哦?!然后急忙忙地去打电话叫她在外面做事的

丈夫回来。

那个匆匆赶回来的男人倒是挺痛快地点了字。

离开这辆巡逻车前我问他们俩:你们现在最希望的是什么?他们互相望了望后说:“我们希望土地上的违法越少越好。那我们就可以去干别的工作了。”

这很难。就像医生很难指望看地球上不再有病人以便去改行。当这对搭档每天骑着摩托用自己微薄的力量一点点地去改变着这世界的不尽人意时,心里拥有的那份美好理想也许会变得越来越安稳明亮。

守护淇澳岛

淇澳岛是珠海撤出去的一面旗帜,哗啦哗啦地在伶仃洋上飘扬了五千年。淇澳岛充满了对新石器时代和鸦片战争的回忆。隔着一小片海水眺望对面的香港岛,祖祖辈辈的淇澳人幻想着有朝一日将镇上的白石街无限延长,变成一座连接两岛的巨大飞桥,让百年回归后的香港沿着这桥走回祖国来。

幻想中的飞桥终于在 1992 年被珠海政府画进了神圣的规划图纸上。巨大的飞桥有着一个不凡的名字:伶仃洋大桥。这座孕育中的伶仃洋大桥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长的桥,它预示着将有巨大的财富向淇澳岛滚滚而来,于是淇澳人在一天早上醒来后发现:他们僻静的村落里有了许多的新邻居。那些不断涌来的外乡人匆匆忙忙地盖着一幢又一幢的房子,恨不得在一夜之间成为幸运者,以便在未来的经济大潮中与真正的淇澳人分享财富。

淇澳人生性纯朴平和,对于这些热衷盖房的外乡人只是宽容,收取了一些在他们自己看来数目恰当的土地使用费,办了一些简单的手续,就把一块块的地皮让人家拿去用了。

憨厚的村民们不知道他们这是违反了《土地管理法》。当市国土局监察科的王新国科长坐船过海来到岛上处理这事时,他们还懵懵懂懂地问:怎么回事儿嘛?从解放起到现在,我们这里盖房就没有报建的呀?再说岛上的荒地多了,我们自家用得完吗?

王科长耐心说明着事情的原委:淇澳岛上的土地是早在 1988 年就由市政府统一征用过的了,《土地管理法》明文规定,只有土地部门才有批地的权力,而且规定了土地使用费的标准。

村民们认真地听着,渐渐掂出了事情的分量。望着蓝天下大海边那一幢幢新房子,他们点点头表示愿意按《土地管理法》的意思办。问题是那些外乡人的房子怎么办?

市国土局断然作出了处罚决定。决定上一笔笔地列算着补交与罚交的金额。市政府决定立即成立淇澳国土分局。

那段时间王新国经常在办公室处理淇澳岛的事情。有一位离休老干部在这天上午走到王新国面前。他一说出自己的名字王新国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望着这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过青春和鲜血的老战士,王新国充满敬意却爱莫能助。唉,怎么偏偏把这样的老干部也牵扯进去了?老人家把差不多一生的积蓄都投到淇澳岛去盖房,后因资金不够停了下来,那只盖了一层的楼房已经用掉了 20 多万,再让他拿出 50 万的补交款来,谈何容易!老干部无奈中在省里找过老战友、老上级,有关的信件、批条也都如数转到了王新国手上,但是事情关系到《土地管理法》,人情在这里都不起作用了。事实上本来该让老干部交 100 多万的,那 50 万是市政府答应的减半处理。那天,王新国并不好受地送走了满脸失望的老干部。老人蹒跚的身影让他忽然间好恨:当初是谁给老头儿出了这么

个馊主意？

淇澳岛的那批房子闹出的动静挺大，法院发了公告，报纸、电视台也都代表市政府作了必要的说明。因为期限一到就要依法拆除那些违章建筑了。上岛拆除那天，几艘船排成一串开向淇澳岛。那些船上载着几十名国土公安干警，载着市里和市国土局的有关领导，还载着一辆体态庞大的铲车！市国土局监察科专门用这部铲车四处去铲除违章建筑，它那副铁甲威龙的样子，每每让所有的当事人心惊肉跳。

平平静谧的淇澳岛在这天热闹非凡。有关方面决意要将拆除行动变成一次宣传《土地管理法》的现场会。一位位领导义正词严地宣布完执法决心，最后，轮到大型铲车上阵了。几十名国土公安站成一圈维护着现场秩序，引擎的轰鸣声和纷飞的尘土宣告着淇澳岛上的违法建房从此将要成为历史。不知道围观的人群里有多少是那被拆房子的主人，想必他们的心里此时大半在流着后悔莫及的泪水。

后来我专门去了淇澳岛。蓝色的大海边，那些房屋的痕迹很快就要完全消失了，不久之后政府将要在这一带修起一条环岛公路。这公路的另一头就是世人瞩目的伶仃洋大桥，到时整个粤西将因为淇澳岛的贡献而与香港、深圳连成一体。那些在淇澳岛上不幸“栽”了的人若是看到了这一幕，怕是会更深地理解市政府和市国土局的良苦用心。

永远的山庄

马山山庄。读着写在门楣上的四个大字，我走进这个极为肃静的庭院。墙上那无数的小格子，放列着一只只青花瓷罐，我意识到自己正面对着无数的亡灵。这些亡灵们原本安息在方圆几平方公里的山头上、田地间。就为了给活着的后代

子孙腾出更多的土地，他们在某天夜里集体大搬迁来到了这里。

大搬迁的过程充满着心灵上的碰撞。这一带的坟地差不多都是几代祖坟。祖坟的后人们有的还住在周围的村子里，有的到外地工作去了，更有相当一部分去了港、澳、台，去了大洋彼岸。当政府号召大家迁坟以便腾出建设用地时，许多的家庭彻夜不眠，他们心里惶惶不安。

珠海市国土局地政科的周科长不知多少次走进村子去跟农民们讲“死人不可与活人争地”的道理。讲到最后，有一位老汉提出要求说，迁坟可以，但是必须得由政府出钱把他家庭里的人悉数从外地召回来，按当地风俗中的最高礼节隆重地迁走他家的祖坟。

此次行动要迁走几千个坟墓，周科长和同事所面对的，就是几乎上万人的亲属大军，什么样的人没有呢？甚至直至迁坟期限过后，施工人员去推土平地时，还会有全家老少一齐躺在推土机前“保卫”自家祖坟地的情景发生。

珠海的迁坟行动后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除了其他的因素之外，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建起了许多个

如同马山山庄这样的现代化山庄式公墓。这样的公墓散见于珠海的每一个区里，于是差不多所有的珠海先民都住进了这样的美丽山庄。曾经有旅居海外的珠海华侨担心日后无处凭吊祖先，回来后看到山庄的美丽与气派，庆幸政府帮他们做了一件报效祖宗的大好事。建山庄真是用去了不少的钱，政府拨款的，当地农民赞助的，海外华侨捐献的，汇到一起就出现了一座又一座美丽的先人山庄。

此刻，马山山庄静悄悄的，满院是橘树和茶棵，那琉璃瓦顶的殿堂，就掩映在果树丛中。一条宽大的石阶两旁种的是相思树。高大的香炉已没有烟火。我知道来入最多的时节是清明前后。那时海内海外的珠海后人们就会拥到这里来凭吊祖先。这特殊山庄的建成，珠海先人们的安息之地反倒被赋予了庙宇的形式，比起从前散居在各个田头山坡上，少了几分冷寂，多了几分神圣。

我踩着那长长的石阶走上去，我意识到每一级石阶都在说着对于我们生命攸关的两个字：时间。

（责任编辑：刘家驹）



马山山庄骨灰存列墙

李立三和他失落的女儿

● 李思慎

我在李立三身边工作期间，只知道李立三先后共有六个孩子，在李立三去世 17 年后，1984 年 11 月 17 日我到湖南省醴陵县参加李立三故居开放典礼时，见到谢志佩和狄以德夫妇。经人介绍：谢志佩是李立三的第五个孩子、三女儿。不免使我感到非常突然，不知其故。后来才问明了缘由。

1 在李立三被迫害致死 13 年之后，1980 年 3 月 20 日党中央在北京为李立三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给李立三公开平反昭雪。一些报刊先后发表了回忆李立三的文章。在李立三的六个子女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回忆文章后不久，《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上海退休女教师吴钟毓老人写的一封信，提供了李立三应该还有一个女儿的线索：

立三同志应该还有一个女儿，是一生下来就抱走了的。那是 1930 年的冬天，上海地下党的一个组织遭到破坏。我婆婆叫我秘密地从一个交通员的手中抱过一个刚生不久的女孩子，据那个交通员说，孩子的爸爸是李立三，妈妈姓王（化名），已经被捕。我婆婆也是地下党员，她接过孩子以后，经过一段查访，才打听到一个人家，有个男孩刚生下就死了。婆婆就去联系，提出把孩子给他家做女儿。他们好像也是和党有关系的，在得知孩子的来历以后，便满口答应。从此，孩子就吃养母的奶长大，小名叫丽丽。抗日战争以前，我还常去看看，长得很

可爱，养父养母都很喜欢她，对她很好。后来，就失去了联系……1957 年我曾被划为右派，在那种处境下，根本不好谈这样的事情……现在我的右派问题已经改正，我婆婆早去世。如能帮助找到丽丽，不但对已故的立三同志及其家属是一大安慰，对我这个存日无多的生者（还有我的婆婆）也就死而无憾了。

李立三的夫人李莎与子女们推断，吴钟毓老人在信中提到的“丽丽”，该是李立三的第五个孩子、第三个女儿，便要在北京钢铁研究总院工作的李立三的第四个孩子、二女儿李力去设法查找。

李力先同吴钟毓老师取得联系，吴老师回信说，曾听说丽丽很早就进入一个纺纱厂当工人，现在下落不详。接着，由中组部委托上海市委组织部在上海广泛寻找。上海党组织找了好几个月，才在茫茫人海的大上海找到了丽丽的下落。当时，她已按其养父谢庆斋更改姓名为谢志佩，在上海工业大学（现为上海大学）自动化系任党总支书记。

人找到了，关系确认了，先是由李立三的二女儿李力与三妹谢志佩通过信件联系，加深了解。1981 年初，李莎到上海外语学院讲学，第一次同谢志佩及其丈夫狄以德相见；同年 6 月，谢志佩的大姐李竞、二姐李力专程去上海看望三妹；1982 年初，谢志佩与李竞、李力三姐妹到长沙，参加七姨夫杨开智的追悼会，同时与二哥李人俊团聚，然后共同到生母李崇善（1972 年病逝）坟前祭

扫，圆了 50 多年的梦。

追根溯源，李立三的第三个女儿是怎么丢失的呢？

2 1930 年，李立三因犯了“立三路线”错误，10 月，共产国际一再电催他去汇报并检查错误。这时，与李立三同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妻子李崇善正怀着第三个孩子、也是李立三的第五个孩子，即将临产。李立三预计此行短期内不可能回国，为减轻妻子的负担，决定把这个即将出世的孩子托付给一对同我党有密切联系的工人夫妇抚养。他给这个工人留下了一张字条，让他日后拿着这张字条去把刚生下来的孩子抱走。李立三回到家里，沉痛地对妻子李崇善说道：“我这次去苏联，恐怕短时间回不来，孩子出生后，我又不在你身边，不管是男是女，就把他送人吧！”随后，就抛下妻子李崇善、大女儿“小鸽子”、二女儿“八哥子”，于 10 月份离开上海前往苏联去了，10 月中旬抵达莫斯科。

李崇善是李立三的第三位夫人，1903 年出生在湖南省长沙一个书香家庭，李崇善毕业于长沙稻田师范学校。她与李立三的第二位夫人是亲姐妹。其中反映了李立三在婚姻关系上的罗曼史。

李立三于 1921 年底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党中央派遣到安源煤矿去从事工人运动。1922 年 1 月他到北京“取经”。罗章龙带他参观了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和铁路工人俱乐部，向他介绍了北京党

组织在长辛店搞工人运动的经验。李立三这次在北京活动，一直住在杨开智家里，当时杨开智的夫人是李崇英（又名李一纯，是李崇善的大姐）。李崇英是个解放型女性，她与刚从法国回来的李立三，一见如故。所以，在李立三学习“取经”结束后，二月间离开北京时，她就离开杨开智跟随李立三同到安源去了。后来，把她的七妹李崇德介绍与杨开智结婚。

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党中央把李立三调到武汉从事工人运动。当年李崇英在汉口生下儿子李人俊时，李崇善前去照看大姐。从此，跟随李立三参加了革命斗争。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与李立三、李一纯夫妇都在上海。6月，蔡和森因哮喘病发作，去北京疗养，留在上海的向警予同中央执行委员彭述之发生了爱情，与蔡和森的感情出现裂缝。

同年10月，李立三、李一纯、蔡和森、向警予两对夫妇在翻译沈泽民陪同下，前往苏联，出席共产国际计划召开的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在莫斯科期间，蔡和森与向警予的爱情破裂，李一纯也离开了李立三。李一纯与向警予同进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蔡和森在参加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后，以中共代表的身份留驻共产国际，不久就与李一纯结婚。

李立三于1926年4月，只身回到国内，出席了5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6月到9月期间，领导了上海的新的罢工高潮。

李立三回到上海，根据李一纯在莫斯科与李立三分手时的安排，于1926年夏秋之间与李一纯的三妹李崇善结合在一起。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张太雷牺牲后，12月18日中央决定任命李立三为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带着夫人李崇善当即赶赴香港设立广东省委，恢复

广东党的组织，处理广州起义的善后工作。在此期间，1928年3月3日，李崇善在香港生下大女儿，取名“小鸽子”。孩子生下不久，5月，李立三率广东代表团离开香港，前往莫斯科参加定于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临行前不得不把“小鸽子”交给当时党中央的一位领导干部抚养。李立三出国不久，“小鸽子”在上海随养父母被逮捕入狱，被关押了近三年的时间。

“六大”结束后，李立三及时回到国内，实际上主持了中共中央的工作。1929年8月1日，李崇善生下了第二个女儿，取名“八哥子”。

1930年10月，李立三离开上海去共产国际作检查，走后不久，上海一个党组织遭破坏，有身孕的李崇善被捕。在狱中，李崇善生下了第三个女儿。为求生路，李崇善不得不按照李立三临行前的吩咐，忍痛把亲生女儿托全国总工会交通处交通员转交给一名与我党关系密切的青年夫妇抚养。

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李崇善化名李文英，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进入了由中共中央主办的《大同幼稚园》。

大同幼稚园，是在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于1929年底决定筹建，1930年3月建起来的，由上海圣彼德堂主持牧师、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任园长。大门上挂有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的匾额。因有教会的掩护，一时还比较安全。该园设在上海阿尔斐斯路341号（现南昌路48号）的一幢二层小洋房，近靠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坐北朝南，阳光充足。保育员常带孩子们到法国公园去围成一圈，讲故事，做游戏。1931年4月间，全园儿童和保育员一起，在公园的草坪上拍过一张集体照片。

保育员多是地下党员或其家属，有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化名李文英）、李求实的妻子陈凤仙、董健



李立三夫人李崇善

吾的妻子郑兰芳、朱剑凡的儿媳如×××、地下党员陶锡琪等。入园儿童有：蔡和森、李一纯夫妇的女儿蔡转，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彭湃的儿子彭小拜（小名叫小丕）、李立三的两个女儿李竟（小鸽子）、李力（八哥子）、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以及杨殷的儿子、王弼的女儿等19个孩子。

1931年，上海的局势动荡不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操纵和策划下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从1931年1月7日早晨7点钟一直开到晚上10点钟结束，使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继1月17日晚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3人在中山旅社被捕，2月7日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之后，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由于顾顺章的出卖，使早已被捕但尚未暴露身份的恽代英于4月29日在南京殉难；6月，中央特派员蔡和森在广州被害；6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前所未有的

大破坏。中共中央已无法在上海继续开展工作，不得不决定逐步向江西中央苏区转移。就在这腥风血雨之中，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惊恐万状。他采取脱身之计，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名义，于10月离开上海逃往苏联莫斯科避难。在王明离开以前，9月1日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卢福坦三人任中共中央常委，王明在莫斯科遥控指挥。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之后，寻找借口于1932年1月28日夜发动了对上海闸北区的进攻。这时，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共中央机关，难以在上海立足。

在此形势下，“幼稚园”这些革命后代，处境越来越危险。党组织断然决定，立即解散大同幼稚园，并将孩子安全转移。

3

大同幼稚园解散后，党组织安排李崇善化名王秀珍，与张闻天（洛甫）扮成假夫妻，以掩护张闻天从事革命活动。张闻天是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了5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回国的，先是接替沈泽民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中央农民部部长，又被王明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当时打扮成一名巨商。但时间不久，就被反动当局发现，对王秀珍盯梢，甚至直接对她进行讯问。李崇善及时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机智地拿掉了挂在窗户上的联络暗号——一串红辣椒，使张闻天得以安全转移，并于1933年初进入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而李崇善自己却没有逃出敌人的魔爪。于1932年11月29日再次被捕。两个年幼的女儿只得留给房东帮助照看。后来，李崇善被押解到南京监狱，与帅孟奇等要犯关押在一起。由于她毕竟不是共产党的要人，只是一个家属，在党组织的多方营救下，终于获得释放。

李立三于1930年10月被调到

莫斯科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召开的一系列批判会上，一改在国内狂热自大的态度，次次会议上都诚恳深刻地自我批判。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书记曼努依斯在结论中指出：尽管李立三的自我批评精神很好，但他“还是一个很坏的布尔什维克”，“为着（惩）罚立三同志起见……立三同志应当留在这里纠正自己的错误”。李立三起了一个亚历山大·拉宾的俄国名字，以研究生的资格进入列宁学校学习。李立三预感到他短期内不可能回到李崇善身边，就写了一封信通过周恩来转交给李崇善。信中说，“我们远隔两方，革命处在这种形势，很难相聚一起了，是不是可以各自寻找出路”。李崇善看完李立三给她的信，悲恸不已。周恩来对她进行了安慰。

1933年1月，地下党中央机关转移到瑞金，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李崇善从监狱释放出来，再无依靠。她孤身奋斗，艰难度日，不得不带着两个幼女离开上海，回到原籍——湖南省溆浦县，靠教小学为生。后经她六妹李崇本介绍，与六妹夫黄培心的弟弟、教书先生黄希素结合，相依为命。

黄希素比李崇善的年龄要小得

多，他在上海劳动大学农业化学系（土壤专业）上学时，就认识 and 了解李立三。他决心尽力抚养好李立三的两个孩子，自己却不再要孩子。他给李立三的女儿取名为李竞、李力。保留李姓，竞（競）字中有两个“立”字，“力”字是立的同音。两个孩子名字中的“立”与“力”相加是三个“立”，也是“立三”的女儿之意。两个孩子也不把黄希素改称爸爸仍叫叔叔。

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入湖南。李崇善带着两个女儿随黄希素逃到四川省重庆。黄希素后来在重庆大学任教。

大女儿李竞在重庆初级中学毕业后，1945年2月考取了歌乐山中央护士学校上学。抗日战争胜利后，护校于1946年随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往南京。李竞于1948年2月学习结业，分配到国民党中央医院工作。

李崇善与二女儿，也随国民党迁都到了南京。李力中学毕业后，1947年2月又跟随养父黄希素返回重庆，在重庆大学求学。

在南京期间，1946年底，李崇善从报刊上得知李立三已从苏联回到国内，悄悄地向女儿讲明了她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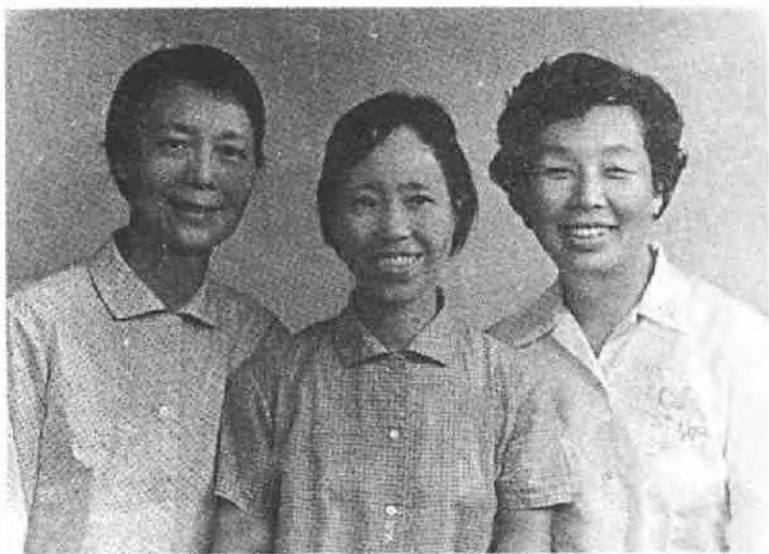
谢庆斋夫妇（1987年）

的身世。但因身处国民党统治区，不能与解放区的李立三取得联系。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重庆的学生运动日渐高涨，李力在“重大”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在教职员中都有影响。一天，李崇善到“重大”女生宿舍去看望女儿，被管理女生宿舍的一位姓秦的女工认出来。原来，这位女工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时，认识李立三、李崇善夫妇。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她不便与李崇善招呼。待李崇善离开后，她才呼唤李力的小名“八哥子”，并告知李力说，他认识李力的父母。从此，在李力的养父、母远离重庆时，她悄悄地对李力以多方面的关怀帮助，1949年底重庆解放后，这位姓秦的女工对李力说，你应该去北京找你的生父李立三。在她的积极动员下，李力鼓起勇气给生父写了一封信。不久，她终于来到生父李立三身边，随即，大女儿李竞也由南京赶到北京与生父见面。

解放后，黄希素在重庆西南农学院担任系主任，搞土壤研究。在1958年向党交心运动中，一天晚上，他给妻子和学校党组织各留下了一张字条。给李崇善的纸条写道：“我以怨报德，我走了，你可以去南京（即大女儿处），也可以去北京（即二女儿处）。”从此，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下落不明。后来，西南农学院给黄希素的结论是：“没有问题。”从此，李崇善迁往南京，与大女儿李竞一起生活。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造反派说李立三是反党分子，说李崇善是叛徒，迫使李竞与母亲划清界线，不准李崇善住在女儿所在的南京军区总医院。形势所迫，李竞经与六姨母李崇本、七姨母李崇德（杨开智的夫人）、八姨母李崇久商妥，让母亲去长沙居住。1968年66岁的李崇善只身一人，先乘船到达武汉，由九妹夫魏开泰（作曲家，《洪湖水浪打浪》的作者）接转去



谢志佩

李竞

李力

长沙学工街希圣巷8号，住在七妹李崇德、杨开智夫妇家中。1972年因癌症病逝。

由于李崇善一生波折，所以只能把第三个女儿的送出深深埋在心里。她没有向任何人连同她的两个亲生女儿谈及过，即使全国解放后，也没有设法去查找她的下落。

4 丽丽的养父谢庆斋出生于1903年，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工作，1925年由陈云介绍入党，参加过“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斗争。1930年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工作。当他得知丽丽是李立三的后代时，更是百般爱抚，比自己亲生儿女还要好，为抚育丽丽付出了大量心血。

谢庆斋在外地漂泊多年，又返回上海，几度失业。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为供谢志佩上学读书，他硬着心肠，把身体瘦弱的亲生女儿送到纺纱厂当童工。因劳累过度，不久即病逝。为求生计，谢志佩读到初中二年级（14岁时）被迫中断学业，也进入日本纺纱厂做童工。不久，养母周素琴也病故。因此，谢庆斋对谢志佩更加钟爱。谢志佩说：“阿爸把对党、对爸爸的真切情义，凝化为对我的深厚感情。我也特别体贴

阿爸。”

谢志佩长期在养父的教育熏陶下，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上海解放前夕，因积极参加进步革命活动，曾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过，由养父花钱保释出狱。

解放后，由于单位党组织早就知道谢志佩是李立三的女儿，在政治上对她完全信赖，始终把她安排在一些重要的部门工作。加上她上过中学，有一定文化基础，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很快被提了干入了党。1961年，党组织把她调到上海工学院（现为上海大学）工作，曾担任过教务科长、自动化系党总支书记、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1984年，党组织为谢庆斋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享受离休待遇。目前，92岁高龄的谢庆斋安享晚年，身体尚健。

谢志佩说：“1980年当学校党委通知我，说有姐姐在寻找我时，并不感到很突然。特别是阿爸（谢庆斋）知道后，非常高兴，更打消了我怕他伤心的顾虑。遗憾的是，我与家里联系太晚，再也见不到亲生的爸爸、妈妈了。”

（责任编辑 仲文）

溪口故里

蒋介石未来魂归处

● 徐 刚

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是蒋介石的故里，地处四明山南麓，山环水绕，风景佳丽。溪口旧称禽孝乡，因刻溪流过镇东注入锦溪，故1928年改称溪口乡。奇秀的武岭横亘镇东，蒋氏对“武岭”十分偏爱，他自书籍贯为“浙江奉化武岭”，1948年为蒋氏宗谱题签亦称《武岭蒋氏宗谱》。

蒋氏在溪口有丰镐房老宅和文昌阁、慈庵（又称坎庄）、妙高台别墅四座居处。

丰镐房

丰镐房是蒋家祖宅，为一幢二层楼房，有十余间，原名“素居”，后改称丰镐房。“丰镐”取自西周周文王建都丰邑，周武王建都镐京的第一个字。

蒋介石发迹后，于1930年对丰镐房进行翻修。

扩建后的丰镐房营造精致，为“前厅皇堂，两厢四廊”格式；后堂为“根本堂”，三字由吴稚晖所题，里面供奉蒋氏祖宗的牌位；蒋介石手书

“浩气长存”悬于堂中，内书“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一段《孟子》语，堂前悬有蒋介石书示蒋经国的“寓理帅气”横额，此额为蒋经国40岁寿辰时，蒋氏为其所题。

前幢楼题额“素居”，正中设佛堂和一套卧室，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信佛，早晚即在这里念经。东厢楼上，布置则全部是西式家具，是特地为宋美龄准备的卧室，不过她并没有真正住过，每次回溪口，她常宿文昌阁。

1937年4月28日，在前苏联度过了12年曲折坎坷生活的蒋经国，终于携妻子芬娜（蒋方良）、儿子爱伦（蒋孝文）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溪口，与生母毛福梅团聚，望着丰镐房里既熟悉又陌生的景物，使异国归来的少主人大有“相逢还疑在梦中”之感。游子携眷归省，按当地风俗，须补办婚事，否则族众不承认这桩既成婚姻，子孙就没法进宗谱了，何况蒋经国归国还乡亦是大喜，更该设宴庆贺，毛福梅提议干脆把两件事合在一起办了；蒋经国为讨亲娘欢心，欣然重做新郎。于是，丰镐房里张灯结彩，与36年前蒋介石、

毛福梅成亲的仪式一模一样。

1939年12月12日下午2时许，从宁波方向飞来了六架日本飞机，对小小的溪口镇狂轰滥炸。15分钟后，溪口镇成为一片火海，文昌阁乐亭别墅被夷为平地，丰镐房周围的民房亦被烧毁，丰镐房侥幸没有被炸弹击中，但后墙弄被炸塌，毛氏失踪。此事惊动了国民党县政府及省政府，搜寻了两天，方在后墙弄倒塌的瓦砾下找到毛氏的遗体，情状极惨……

时任江西省赣州专员的蒋经国闻讯，星夜从赣南赶回溪口，磕首顿足，而后噙泪疾书“以血还血”四个大字，命人刻在石碑上，立在生母罹难处。

文昌阁

文昌阁位于镇口的潭墩山山颠，剡溪在其脚下流过，别名“奎阁”。建筑面积约有五百平米，并筑亭三楹，蒋介石为之题名“乐亭”，并亲撰《乐亭记》一文以记之，文体仿欧阳修名篇《醉翁亭记》，且以砥柱



丰 镐 房

中流自诩。据风水先生说，文昌阁地处“伏虎吸水”又称龙头，因而深得一向迷信的蒋氏的喜爱，成为他的私人别墅和藏书楼，每回溪口，多住于斯。

1930年，蒋介石又在乐亭以北、武岭崖侧，临溪建筑了一幢西式小别墅，溪口人称“小洋房”。1937年，蒋经国夫妇归乡之时，蒋介石命人将“小洋房”按俄式摆设装修，有壁炉、地毯等，并以“补习国文”为名，令蒋经国在此居住读书，其真实目的却是为了消除蒋经国旅苏期间所受的思想影响，继续按照自己原定的模式重新教育儿子。正如其所言“经儿可教”，曾一度与其反目十余年的蒋经国谨遵父命，按照乃父之安排，一步步走上了蒋家王朝接班人的道路。

1939年日本飞机轰炸溪口，文昌阁乐亭别墅被夷毁时，小洋房却完好无损。

慈 庵

蒋母王采玉年轻守寡，便在金

竹庵带发修行。

1886年6月，23岁的尼姑王采玉还俗出嫁到溪口，做了45岁的蒋肇聪的继室，当上了玉泰盐铺的老老板娘。1887年10月31日午后，王采玉在玉泰盐铺的后楼上顺利地生下一个男孩，取名“瑞元”，又名周泰、志清、中正，即后来的蒋介石；其后，王氏又生二女瑞莲、瑞菊和一子瑞青。

王采玉与蒋肇聪虽说年龄相差二十来岁，但婚后感情不错。谁知好景不长，在第十个年头上，蒋肇聪病故，32岁的王采玉再度守寡；其后瑞青、瑞菊又相继夭折；同时，蒋肇聪前妻之子蒋介石又挑起阋墙之争，一连串的打击常使王采玉欲哭无泪。王采玉一生操劳，于1921年6月14日卒于故居内寝，享年58岁。

对于王采玉的故世，蒋介石悲痛异常。他少小顽劣，早年丧父，全靠母亲含辛茹苦，抚养他至于成家立业，所以他是能体谅做母亲的苦心；另一方面，蒋介石深知自古以来的帝王将相无不“以孝治天下”标榜。“孝”是个好东西，所以他努力

将其孝道大事宣扬，以博得“事母至孝”的美誉。

蒋母临终前嘱咐儿子办三件事：其一，为她择地另葬，不与其父同穴；其二，办一所学校，培育乡里子弟；其三，报答几家至亲好友的恩情。后二件事，蒋介石日后遵嘱一一付诸实现，堪令蒋母安息九泉，这是后话。当下蒋介石抓紧要办的便是蒋母临终遗愿之首事——为她择地另葬。

蒋介石居哀期间，谨遵母亲遗命，请奉化有名的风水先生四处勘察坟地，最后选中了溪口以北约1.5公里的白岩山鱼鳞岙中段北面的一块小平地，据说这是“弥勒佛的肚脐眼”，是一块风水宝地。

四个月后，坟墓筑就。墓丘呈圆形馒头状，墓前正中的横碑，刻着孙中山题写的“蒋母之墓”等题字；在横碑上方的扇形应栏里，刻有“壶范足式”四字，意为女中楷模；在横碑两侧，刻有蒋介石的自撰联：“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墓前植有两棵石榴树；周围各处都广种各种松柏，形成一片苍翠林海。是年11月23日举行出殡仪式，各处吊客云集溪口，孙中山亲撰祭文，并派陈果夫代表他前去祭奠。

1923年，为纪念其母60冥寿，自5月起，蒋介石开始在离墓址约250米远的山墩间筑新式洋房三间，称为“慈庵”，历时半年，于12月完工。这次建庵供神，蒋介石极为重视，特请谭延闿书题了庵的门额，中堂悬挂着孙中山亲书所赠的“为国劬劳”、“慈云普照”二匾，他自己又撰写了《慈庵记》一文，文中说明建慈庵不外乎两个用意：一是因为父母没有合葬一穴，把他们神主牌位合在一起，以表示双亲合拢；二是作为蒋回乡时居住的地方，以示不忘母亲、谨守墓园之意。

1930年春，蒋介石已掌握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为了

增光门楣，他命人将慈庵旧宅拆除，另在离墓稍远的山脊平地上，筑造规模较大的坟庄——在白岩山麓竖立一座石碑楼，有三个门，中门上首刻着“蒋母墓道”四个阴字，两边雕有花卉、盆景等各种装饰；从牌楼到墓冢，是一条卵石砌成的小路，路边有石凳，夹在一片松林之中；坟庄位于石碑楼与蒋母坟茔之间，进石碑楼行约200米，路旁有过路岗亭，亭四周有长条玻璃窗，亭内能容纳20人，主要是用作当年蒋介石在坟庄住宿时的警戒亭；从岗亭再上行约200米，是一处院落，外门上题有“墓庐”二字，院内有12间平房，正中数间的屋内依壁而立众多石碑，两旁是会客室及餐厅，另还有卫兵住处及厨房等。

穿过墓庐大门，便可看到慈庵。门首题“慈庵”二字，室内挂有蒋母王采玉遗像，并供奉蒋氏曾祖以下神主的牌位。慈庵左边一个两室套间，是蒋介石回乡居住之处。

蒋介石对慈庵有着特殊的情感，他曾有意百年之后归葬于此。但随着地位的不断上升，以他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的显赫地位，他自认为当葬于南京中山陵孙中山先生之侧，方能流芳百世，遂于1946年亲定墓址于中山陵紫霞湖畔，并筑一亭，谓“正气亭”。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随着蒋家王朝1949年的大溃败，蒋介石退缩台岛，1975年4月5日客死他乡后只能厝棺台湾桃园“慈湖”。

妙高台别墅

溪口胜景，首推雪窦山。雪窦山是四明山脉在奉化七十峰中最享盛名的一个山峰。山顶平地上有一古刹，即雪窦寺，距溪口11公里，为浙东第一名刹。

蒋介石最喜欢雪窦山的风景，1920年冬曾写诗道：“雪山名胜擅

东南，不到三潭不见奇；我与林泉盟东风，功成退隐莫迟迟。”

雪窦山除雪窦古刹外，尚有许多名胜古迹，如御碑亭、千丈岩瀑布、妙高峰、三隐潭等。1927年，蒋介石在妙高峰山建一别墅，自题门额“妙高台”。别墅为中式建筑，中间是三开间两层楼，有围墙连成一个整体。这里海拔700多米，气候凉爽，周围松樟翠竹蔽日，是一个理想的避暑胜地。别墅建筑后，蒋介石、宋美龄夏季常到这里小住。文昌阁被毁后，蒋介石每回故里，必先住慈庵，再移居此地，因此处居高临下，安全可恃。

1949年1月21日上午10时，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宣布从国民政府总统任上“引退”下野。当日下午4时飞离南京，先住杭州，次日转抵溪口。这是他最后一次返回故乡，此时早已没有了往日衣锦还乡的荣耀，剩下的仅仅是时日不多的惶惶。

这次下野回乡是他在溪口呆得时间最长的一次。其间，他也曾携儿孙遍游溪口的名胜古迹，表面上闲云野鹤，内心却充满了悲戚，他知道此次一别，在有生之年是很难再

回来了。

他虽宣布下野，却时时关注着南京，关注着长江，关注着前线，仍然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控制着军政事务。为了便于指挥，他返回溪口的当日，便命人架设了七座电台，不过前方传来的却都是兵败的消息。进入4月，蒋介石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4月21日，南京传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强渡长江的消息，24日凌晨又接报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南京已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蒋介石闻讯，无言以对，沉默良久，颓然地吩咐俞济时：“把船只准备好，明天离开溪口。”

4月25日上午，蒋介石首先带家人去辞别蒋母之墓，然后登上白岩山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众人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表。下山后又乘渡船到达溪南，蒋氏父子在堤岸上伫立良久。遥望对岸故居，似有无限惜别之情。

他们在溪南的武岭门上车后，过奉化县城驶往宁海。下午2时许，他们在宁海县西庖乡下海，登上了太康号军舰，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责任编辑 仲文）



文昌阁

他看守张学良 25 年

● 窦应泰

—

1937 年至 1962 年，刘乙光奉蒋介石之命，负责羁押、幽禁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

刘乙光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1933 年以后在蒋介石侍从室任侍卫，后又调入戴笠的军统局任少校特务队长。1937 年 1 月由蒋介石首肯，派刘乙光任管束张学良的特务队长。1940 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1992 年，台湾专栏作家郭冠英在撰写《张学良侧写》时，忽然想起了已作古的刘乙光。他本来无意去了解这个军统特务，但为了更全面地写好张学良，决定拜访一下刘乙光的儿子刘伯涵。

已经五旬开外的海军退役军官刘伯涵，刚刚在医院里做完肺癌手术，躺在病床上回答了郭冠英的提问。

郭：对你已故的父亲印象如何？

刘：我父亲一生的精华都在陪伴张先生。那段时光也是我们全家最值得回忆的岁月，张先生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想起我父亲就想到张先生。

郭：能谈谈你们一家对张将军的关系吗？

刘：我八岁就和张学良先生生活在一起。张先生、四小姐待我们弟妹如亲生子女一般，我们也把他们视若父母般敬爱。张的书房很整洁，藏书很多。二弟有时穿着臭袜子、脏裤子躺在书房地上看书，张先生也不以为忤，书乱了就由杜副官收拾。后来我二弟学有所成，出国时，张先生还送了旅费，后来他成为海水淡化专家。我妹妹则与四小姐特别亲，四小姐待她比母亲还好。张先生幽默开朗，我们在西子湾的时候，他会在院中挂个大西瓜，叫我回家来吃。我那时已在巡防舰上服务，我在船上用望远镜就可看到院宅中的西瓜。

郭：你父亲对张先生究竟怎么样呢？

刘：有很多人都写张学良的幽居生活片段，甚至提到我父亲，毁誉参半。有些写的是事实，但有些把我父亲写成一个恶劣贪鄙的人，一个无人性寡情的牢头，把张先生折磨得落发掉牙，苦弱不堪。其实张先生身体一向健壮。张严佛与我父亲非常熟稔，但他在大陆写的东西却不甚公正，话一讲偏了常常真相就扭曲了……要说我父亲敢擅自克扣虐待，是不可想象的事。就以同桌吃饭一事，我们与张先生同住一屋的两头，是戴先生决定的，他是想

希望我们家人能陪伴张先生与四小姐。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们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但我们从未见张先生面露不悦之色，他似乎很高兴与我们聚在一起……当然，张先生识事明理，知道我父亲是奉命执行任务，有其职责和立场。在相处的时光中，我父亲有时会因限制张先生的行动，加上湖南人的个性，处事不够圆滑，引起争执不悦是难免的。

……………

刘伯涵这样地为其已故父亲辩解，是人之常情。但是，在那秘密幽禁与辗转迁徙的岁月里，刘乙光究竟对张学良将军怎么履行职责呢？！

二

张学良当他真正恢复自由以后，在公开的场合却很少说到刘乙光。即便面对新闻记者的直接询问，张学良也极少对刘乙光吐露微词。

但是，张学良对刘乙光的评价总会间接地透露出来。1947 年 10 月，张学良被秘密幽居在台湾新竹的井上温泉。当时，因为刘乙光的妻子患精神病，急需刘去医院陪护，国民党保密局长郑介民便委派担任设计委员会主任的张严佛前去新竹

临时替换刘乙光。据张严佛回忆：“刘乙光走的那晚，我在张学良房间里，他当着赵四小姐，仿佛满肚子幽怨，都向我尽情倾泻了。他谈到了10年期满仍然关押不放，也谈到10多年囚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妻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含冤抱屈，无处申诉，无理可说，几乎一字一泪，痛哭不止。赵四小姐也坐在一旁揩眼泪……”

张学良激愤地对张严佛说：“当初宋子文和戴笠对我说，委员长希望你休息几年，派刘乙光是保护你的，你尽可以在屋子里看书，也可以到外面去散步、打球、游泳、钓鱼，刘乙光不得限制你。但是十多年来，刘乙光把我看成江洋大盗，惟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我们一到台北，陈仪主席陪我们来到这里，他当着刘乙光对我们说，这个地方是委员长来电叫我找好的。陈仪交代刘乙光说，光线好的房间，给我住，刘乙光满口答应了。但陈仪走后，一转眼间，刘乙光就变了卦，他夫妻儿女竟占住了我现在所住的几间，硬叫我和四小姐住在那边屋，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只好忍受了。幸而不几天陈仪又来看我，他觉得刘乙光做得不对，叫他把那几间让给我们住，唉！”

张学良老泪潸然，继续倾吐苦衷：“初来的时候，有两名下女，陈仪是雇来照料我和四小姐的，不几天就被刘乙光打发走了。十几年来，蒋夫人和亲友送给我的东西，经常被刘乙光夫妇克扣，有时被截留一半，有时竟会全部被没收了，与来信所写的对不上数。刘乙光公开大胆地这么干，被我们发觉了，他仿佛没有这回事，毫不在乎。我怕为了这些事和他们闹翻了，更受罪，只好默不作声。我们每次吃饭，刘乙光一家六七口，大的十几岁，小的一两岁，都同我们一桌，他们吵吵嚷嚷地

抢着吃。这叫人不值得一谈，可是搞得太脏了，我同四小姐几乎每顿都吃不下饭。刘乙光的老婆还指桑骂槐地骂小孩，实际上是骂四小姐。可好，你来了，刘乙光一家暂时离开了，我们也可以吃几顿清爽饭。你看这样好的饭菜，难道是专为刘乙光一家准备的吗？这些，十几年了，我都向谁说去？”

赵四小姐忍不住哽咽大哭。张学良见张严佛也满面愤懑，继续向他吐苦水：“今年2月28日台湾人闹事，刘乙光也紧张起来。那几天他恶狠狠地盯住了我，好像要把我吃下去，话都不和我说了。他指挥宪兵特务不分昼夜，加倍警戒，如临大敌。宪兵来回不停地在我屋子周围巡逻，并向室内窥探动静。就在那个时候，刘乙光的部下有人偷偷告诉我说，刘乙光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他就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对上面报告则称台湾乱民前来劫狱的罪名！幸而台湾事变几天就平息了，否则，真难说，我今天还能同你在这里见面！……”

不久，张严佛回到南京，将张学良对他的谈话与所赠诗一首，一并上报了蒋介石。解放后，张严佛又将张学良上述谈话公诸报端，从而使更多的人了解刘乙光在幽禁张学良时的所作所为。

三

1961年9月，张学良由基隆迁回台北后，由张自己出资，在台北北投复兴岗复兴三路建的两层傍山小楼落成了。新宅落成不多日，刘乙光要调回安全局的调令下来了。那一天蒋经国带着一套楠木的客厅家具上山来，他是奉蒋介石的命令接替刘乙光的，继续执行对张氏的“管束”任务。张学良夫妇为欢送刘乙光离任，特别在他的北投寓所备下了酒席。当时，除刘乙光、蒋经国和

彭孟缉等官员外，还有张学良在台北的亲友——张作霖的五夫人、六夫人与她们的儿女张学森、张学浚、张学英和张怀敏。这是张学良到台北幽禁以来首次与这么多亲友聚餐。当时张学良很高兴。

刘乙光将要结束长达25年的“牢头”生涯，在酒盏交错中回忆起从前在溪口、黄山、萍乡、郴州、沅陵、修文、新竹、基隆等地与张学良所共度的漫长岁月，回想起他对张学良过分严厉的“管束”与张学良对他的种种好处，在席间不禁泪眼汪汪。似乎在追悔自己的过去，也似乎在留恋从前的岁月。

张学良一贯宽厚待人，他在向即将分别的刘乙光敬酒时，很幽默却很真诚地说了一段话，他说：“刘乙光是我的仇人，也是我的恩人。仇人是他看管我，恩人是他救了我的命！……”

刘乙光当然十分懂得张学良这番意味深长的话。所谓仇人，当然决非仅仅是他奉命看管，而是在台湾“2·28”时他准备紧急时候枪决张氏夫妇，以及在大陆上十分困难的幽禁时期，他对张氏夫妇的虐待性折磨。刘乙光也知道张所说的恩人也是真正的。1941年5月，张学良在贵州修文得了急性阑尾炎，当时病情危急。如果刘乙光依照惯例向重庆军统局打电报请示，等到复电后才作处置，张的病情势必恶化甚至发生意外。刘乙光当即决断，将张学良紧急送到贵阳医院，使其转危为安。刘乙光想不到这一件他份内的小事，事隔多年后张学良居然还记得。张学良当时对刘乙光说：“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现在你要走了，我知道你家的情况，我很想送你一笔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刘乙光当时感动得潸然泪下。但是，张学良的诚意却被在场的蒋经国出面谢辞了。

当时已经是64岁的刘乙光，从张学良身边回到国民党“安全局”以

后,并没有再继续任职。1965年4月刘乙光正式退休,他全家住在台北中华路的一栋平房里,刘乙光的晚年时光是在这里打发的。无边的寂寞伴随着刘乙光的余生。因为他前半生所承担的特殊职责,退休赋闲后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上门。

当他真正离开了张学良,方才知他从前所扮演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不光彩的角色。这是因为自蒋经国接替刘乙光负责对张学良的“管束”工作后,刘乙光曾不止一次的听到蒋经国对他前任“管束”方式的不满与批评。特别是蒋经国升任要职以后,允许张学良与四小姐公开结婚,允许张氏伉俪游阿里山、访问金门,甚至在蒋经国的中秋赏月会上将张氏夫妇邀为上宾等等消息出现在台湾的报端,刘乙光更感到他从前所作所为的失误。本来,他以为奉蒋介石之命对张氏的“管束”越严厉,就越体现他对赐以他少将军衔的蒋介石的忠诚。可是,当他陪伴张氏漫长的25年成为历史之时,方才如梦方醒地认清自己的形象。因为在刘乙光的晚年,随着张学良处境的日益改善与蒋介石的死去,台湾与大陆的报章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各类有关怀念张学良的文章中,几乎无不提到他刘乙光的名字。张学良是举国公认的抗日民族英雄,相形之下,刘乙光无疑成为了国人眼中最可耻可悲的小人!

25年后,刘乙光收存的最大遗产,就是那一卷又一卷写满蝇头小楷的日记。那是刘乙光自1937年1月11日在浙江奉化溪口担负起“管束”张学良那一天始记的“日志”。刘乙光将张学良每一天在他监视下的一言一行,一举一止,全部如实地记录在他的“日志”之中,“像航海日志一样”。当初,刘乙光或许是以此作为日后向蒋介石邀功的一种明证吧!但是,当刘乙光在晚年翻开他从前所记的“日志”,特别是在岛内外对张学良一片赞扬歌颂声

中,刘乙光在忏悔自己的同时,将那些本来可以成为近代史上最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付之一炬了!

1982年,刘乙光以84岁高龄病死于台北。他死后,蒋经国题写“忠诚堪念”四字,以示嘉奖,并派人刻制成鎏金匾额,送至刘乙光灵柩之前。但是,因为刘乙光生前的诸多行为难应民心,所以,参加刘乙光的追悼会者,仍然寥寥无几。

1991年3月10日下午,当91岁的张学良将军偕夫人赵一荻,获准前往美国探亲,他们的身影首先公开出现在台北桃园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时,恭候在那里的数百名中外新闻记者,将真正恢复自由的张学良团团围住。精神矍铄的张学良面对黑鸦鸦的记者,从容不迫地回答记者们各种各样的发问。当台湾

《中国时报》记者杨索问到:“张先生,当您结束了50年的幽居生活,真正获得自由的时候,您一定不会忘记当年管束您、限制您人身自由的刘乙光吧?”

张学良听到“刘乙光”三个字时,脸上的笑纹确实略为收敛。但是张学良很快就恢复常态,坦荡而豁达地说道:“刘乙光前几年才去世,我很想念他。……当然,刘乙光也曾留给我许多不愉快。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夫妻之间相处都会有彼此吵架的时候,何况刘乙光是在做事,再说,他对我也没有什么不好!”见还有一些新闻记者追着他谈对刘乙光的印象,张学良大手一摆说:“记者先生,做人要厚道,我劝你不要对人苛求!……”

(责任编辑 刘文)



一九六二年,张学良(中)、蒋经国(右)、刘乙光(左)在阳明山

海洋权益决定着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未来。随着海洋意识的觉醒,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岛屿和礁盘是生存和富强的基础,它与陆上领土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当今,具有海上扩张野心者,觊觎的第一目标往往首先是侵占他人的岛礁。

“保钓号”

保钓吟悲歌

● 祖 范 忠 诚



陈毓祥

与台湾基隆隔海相望的钓鱼岛自古就是属于中国的领土。钓鱼岛,祖国的宝岛。它的周围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据估计,钓鱼岛周围

海域石油资源储量约 30—70 亿吨,渔业资源年可捕量 15 万吨。早在 1885 年以前约 500 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就发现、开发和管理这个岛屿。但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政府,从 1885 年开始觊觎钓鱼岛,并在 1893 年前先后三次讨论在钓鱼岛上设立“国标问题”,均因清政府对这些岛屿早已知道,并一一定名而暂时罢休。中日甲午战争第二年,1895 年 4 月 17 日,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逼中国人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近的岛屿包括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

二战后,战败的日本随着经济的发达,其对外扩张的野心又日益膨胀。从 1969 年 5 月开始,日本在钓鱼岛上不是树立“标志牌”、“警告牌”,就是发表各种“公告”、“命令”、“正式见解”等,并对钓鱼岛周围进行武装巡逻,钓鱼岛成为日本海上防卫的重点。

在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确立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十分清楚,如果占有钓鱼岛,并以钓鱼岛为基础划分东海的经济区,那么,它将占据我国近 20 万平方公里海域,而且还可成为日本对外



“保钓号”出发

抢滩登陆训练,训练项目包括运送橡皮快艇以及沿绳梯坠至海面等动作和协同。由于“突击队员”大都是普通市民,以前从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因此,在海上练习中对如何运送快艇和操纵快艇显得十分吃力。但大家义无反顾,再苦再难再险也要向世人展示中华儿女保卫国土的决心和壮举。

为了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插上钓鱼岛,在“保钓号”出发时,陈毓祥的妻子刘舜卿发表讲话,为丈夫送行。

9月22日下午4时许,“保钓号”离开鲤鱼港。香港市民高举标语,祝“保钓号”一帆风顺,保钓成功!

此时此刻,陈毓祥始终站在船头,气宇轩昂地高唱爱国歌曲……

当“保钓号”抵达钓鱼岛海域时,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20多艘舰艇的层层封锁和空中近10架飞机的监视,致使“保钓号”难以靠近钓鱼岛。

9月26日清晨,船队正式进入钓鱼岛12海里海域,日本保安厅19艘舰艇尾追前堵,“保钓号”乘风破浪开始闯关,结果到距钓鱼岛8海里处被阻拦,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叫骂。

9月26日7时左右,日本保安厅的舰艇为防止和“保钓号”相撞,让出了空间。“保钓号”乘机加足马力,全力朝钓鱼岛前进,船上人员个个精神抖擞,口号声响彻大海。

日本舰艇见状,十分紧张,全速追赶围堵,并长鸣汽笛示警,要求“保钓号”减速,同时空中直升机也紧贴“保钓号”船盘旋,企图用武力威吓“保钓号”,阻其前进。

8时左右,“保钓号”在总指挥陈毓祥和船长魏立志的指挥下,不惧对方武力恫吓,继续乘胜前进,离钓鱼岛以南只有3海里时,日本舰艇赶紧增加船只堵截。此时,只见陈毓祥挥舞五星红旗,用扩音器向日本船只呼喊:这是中国的领海,你们马上撤出去!日舰则无理回答说:闯入日本领海范围的是“保钓号”。双方据此僵持对峙了20分钟,现场气氛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一方是气势汹汹的20余艘军舰,一方是单枪匹马的民用船只。面对武装侵略者,陈毓祥

扩张的可靠军事基地。于是,1996年,又一次出现了侵占钓鱼岛的罪恶行动。

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团体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再度在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上兴建灯塔,插日本国旗。日本无视中国领土主权,无视中国人民感情的侵略行径,又一次激起中华儿女全球性波澜壮阔的保卫钓鱼岛领土主权的运动。

面对风起云涌的保钓浪潮,香港著名爱国人士、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会长陈毓祥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决心用无畏的实际行动保卫钓鱼岛,捍卫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9月22日下午4时30分,由陈毓祥担任总指挥、魏立志担任船长的“保钓号”,满载香港各界的愤慨,从香港出发开赴钓鱼岛。

“保钓号”共载79人,其中突击队员18人,中外记者42人。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是63岁的谭成佳,他行前“悲壮”地向记者表示:人生难免一死,最重要的是死得有意义,能够为国家捍卫钓鱼岛就非常有意义。

“保钓号”出发前,“突击队”在船上进行了

等人没有退却。为了表达抗议之心,陈毓祥等五位保钓先锋决心纵身入海登岛。

陈毓祥先是继续手持扩声器,向日本船只呼喊:“这是中国的领海,你们马上撤出去!”稍后与朱韶洪、陈敏斌、徐玉亲及方裕源等四人身穿救生衣,走上甲板,这一行动使日本保安厅舰上人员紧张起来,一艘日舰更紧贴“保钓号”,相距只有10多公尺。此时,陈毓祥做了数十秒的热身运动后,便与其他四人用长绳系腰,登上船舷准备跳水。9时25分他们全部跳下汹涌的海浪中。

当时,“保钓号”并没有停下来,只是放慢时速。一分钟后,陈等四人被海浪冲到船尾。虽有救生衣,头部也不时被浪冲击所掩盖。这时,朱韶洪在海中畅游了一阵后,他身手敏捷地从绳梯爬上来并面露笑容。海中四人,方裕源的情况最令人担忧,因为他的救生衣差点被大浪冲脱,头部露出海面的时间也很短,其余的三人已开始挣扎,在船上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后,都高声地呼喊停船,也有人向台湾的传媒渔船求援,要求他们放下救生器材,但对方只顾自己采访,并没有把救生圈放入海中。



陈毓祥全身覆盖于五星红旗下

四人被拖了十多分钟后,由于他们奋力拼搏,已差不多都快返回绳梯的位置,陈敏斌拉着绳梯,纵身而上,其中三人仍在海中挣扎。

据香港一记者现场目睹:此时,一架日方直升机在距海面不到20米处盘旋,令海面顿时风力达八级,浪头高达三米。“保钓号”上的人见状不妙,不断大叫停船。当时,陈、方二人仍在水中挣扎,不久即见陈没有反应,身体“U”字形伏在水中只露出背部,头脚全浸在水中。在“保钓号”附近采访的3艘传媒租用渔船,一度欲驶过来抢救,由于在上空盘旋的日方直升机激起的滔天巨浪,令渔船根本无法救人,只能遥望两人在海浪中浮沉。

直至“保钓号”停下来后,一名缅甸船员奋不顾身,以绳索系紧自己身体,纵身下海救人。经一番努力后,才从海中捞起陈、方二人。不过,陈毓祥与方裕源被救起时已经昏迷、面色苍白,方仍有生命反应,但陈已口吐白泡,没有呼吸。船上人员见状,凄然恸哭,轻轻地将一面五星红旗覆盖在他的身上。

“保钓号”总指挥陈毓祥牺牲后,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陈毓祥的死讯震动了香港,香港同胞悲伤不已,二万多港人参加烛光晚会,悼念这位以身殉国的勇士。

陈毓祥的妻子刘舜卿得知丈夫殉身后,心里非常平静,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的出发,家人都作好了思想准备,即使发生不幸,也一致支持他的做法,因为他一生都希望能为国家干一件轰轰烈烈的事。刘舜卿恳切希望当钓鱼岛归还中国后,能在岛上为陈毓祥建一块纪念碑,以示纪念。他的姐姐、妹妹和弟弟说陈毓祥死得值得。

人民不会忘记“保钓号”,不会忘记陈毓祥。

(责任编辑 刘文)

船王董建华

和他的父亲董浩云

● 吴跃农

“九七”香港回归，首任特区行政长官人选举世瞩目，董建华在 400 张选票中以 320 票的多数当选。董建华当选前主持的董氏集团“中国航运公司”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他的名字是与父亲董浩云连在一起的。

30 年代，中国的航运业一片凋零，太古、蓝烟囱等英国航运公司几乎垄断了中国的沿海货运，经大连港的货运则由日本船舶垄断。“内河航运权”是列强在不平等条约下拥有的特权，它们的浅水小型货船还径航于海河、长江和珠江。

1928 年，进入“天津航业公司”的董浩云，因其勤奋和进取，很快进入公司高层，担任天津市轮船业同业公会常务理事。董浩云虽然没有进过大学，但他好学不倦，除中

文根底厚实外，还通晓英、法、日三国文字。由于天资聪颖，董浩云娶了老板的女儿为妻，这对他舒展凌云壮志是极为有利的。中国民营航运业那种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困境，刺激着董浩云这样的有志青年，24 岁那年，他草拟的《整理全国航业方案》充分显示出他对中国民族航运业的宏观把握志向。他力主将各大小民营轮船公司台合，以成立一家大型的、力求与外国及国营招商局抗衡的公司，同时将船舶统一调配，加强营运定期航线，并办理有效的信贷制度。

董浩云的这一构想，被严酷的现实击得粉碎。两年之后，沿海重要港口悉数被日军全面封锁，中国的船舶或被日军扣留，或毁于炮火。1941 年，董浩云辗转至香港，利用上海英租界的掩护，悬挂英旗

或巴拿马旗航行于中国沿海及东南亚，然而，就是这样的险境，也未能维持多久，半年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董浩云名下的船舶被日军侵夺。抗战胜利后，董浩云申请复业，遭当局驳回，于是，他重新组建“中国航运公司”，由于当局的腐败无能，没有形成振兴航业的气候，董浩云孤帆远影，艰难跋涉，到 1947 年，他名下的“天龙”号货船首航欧洲，“通平”号货船首航美国旧金山，这是中国近代远航业的创举。1947 年，董浩云又创办复兴航业公司，从美国购入三艘万吨级货轮，意欲闯出一番天地。

50 年代末期，香港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世界经济成长最快的地区，董浩云以香港为基地发展航运，适时以低价吃进一批美国、西德的二手

船,奋力拓展远航业务,远东和北美均在他的航行范围之中。是时,董浩云分析了世界形势,看到了中东兴盛带来的海运业的辉煌前景,果断地向日本订购六艘各二十多万吨的极大型油轮。这时,日本为了挽救衰退的造船业,实行了“造——租”优惠政策。董浩云“草船借箭”,以租金抵购船款,得到了机会迅速发展。

紧接着,中东的埃以第二次战争,6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侵越战争的急剧升级,航运业处于超需求之中,董浩云集团的航船在东至美国、西至远东和西欧的航线上乘风破浪,企业资产迅速累积,董浩云这三个字在国际航运界成为熠熠显赫的名字。70年代初,第三次中东战争使北欧和希腊的航商备尝苦果,董浩云趁机低价吃进他们的油船,使自己的商航业务在稳定中推进。与此同时,他还使自己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经营船务保险、投资美国及香港的货仓、码头业、修船厂以及教育公益事业——当时著名的“海上学府”。70年代末,董浩云集团和香港中华造船厂、欧普多船舶工程公司联合组建“欧亚造船厂”,并且,祖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董浩云集团与祖国大陆的关系开始趋近。

董浩云集团的“中国航运公司”总部设在香港,所属“金山轮船公司”和“中国航业公司”在东京、纽约、洛杉矶、伦敦、新加坡、台北都有办事处,已成为世界顶级航运集团,拥

有各种船只110多艘,1100万吨,比已故希腊船王多一倍,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船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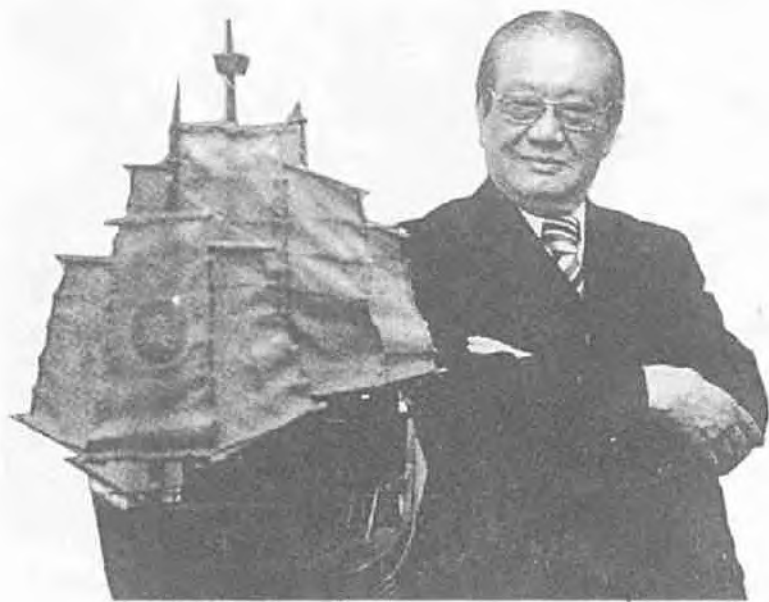
除发展航运业外,董浩云还投资于银行业、保险业、石油钻探业和房地产,他还是星岛报业集团董事局成员。正当他还准备向电脑和飞机制造业挺进的时候,1982年,因心脏病逝于香港。

掌舵董浩云集团的使命落到了长子董建华肩上。董建华,1937年生于上海,1960年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获理学学士。现任香港董氏集团“中国航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东方海外实业集团主席、金山轮船国际有限公司主席等数十职。1973年,董浩云集团将远东至北美航线上的五艘集装箱船及一些附属设置组成“东方海外集装箱航业

集团”在香港上市,紧接着,“东方海外”与日本和西德合作,开辟了远东至欧洲和澳洲的航线。由于经营得法,“东方海外”成为香港股市的强势股,被股民追捧。而坐镇指挥“东方海外”的,就是董建华。

董建华自主持董氏家庭企业后,正遇世界航运业衰退,“东方海外”的盈利势头受到遏制,1985年面临清盘厄运,董建华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没有被击倒,在朋友霍英东的帮助下,充分运用其经商才华,成功地将一度陷入严重债务危机的家庭生意拯救过来,成为今天的“东方海外实业集团”。是时,董建华还重组了“金山集团”,与祖国大陆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1985年,董建华被委任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咨询委员会



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

委员,1992年,受聘为港事顾问,1993年,任全国八届政协委员。自1992年10月至1996年6月,董建华担任香港行政局议员,累积有丰富经验,对香港制度的架构、模式有充分的了解,港人对由他来参与制定1997年后的方针普遍持欢迎态度。

名誉并非仅是名门之后,董建华在香港的声誉,还来自于他的经营能力,来自于他的踏实作风。他处事沉着洗练,为人和善、平正、诚信而有原则,有着较高的国际地位,他不仅是霍英东的好朋友,也是香港巨富李嘉诚最崇尚的人。对于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的人选,李嘉诚希望能熟悉经济事务,了解商界运作的人士来担任,李嘉诚相当欣赏董建华的商业才干,认为董建华有足够条件担任此职,霍英东曾公开表示,董建华是未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合适人选。董建华在国际商界,在香港、台湾商界和海外华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1996年下半年,关于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人选问题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个焦点,这是“一国两制”基本国策下第一位中国人肩负着对治理香港大局的重大责任,到9月份上旬,已有多位著名人士表示有意通过推委会的确认,成为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的人选,而是时,被广泛看好的董建华正不动声色地做着首任行政长官的参选准备,1996年4月,他聘请了一位美国资

深银行家出任东方海外(国际)集团董事长兼首席财务总监;5月,其弟董建成出任东方海外集团副主席,这是董建华部署将其家庭航运生意逐步交给他人管理的重要决定,6月,他辞去了香港行政局议员职务,更引起轰动性议论,认为是角逐行政长官的信号。

1996年9月19日,董建华公开发表声明,决定“缜密思考并积极准备参与候选”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之后,他一改向来的与新闻界的低调态度,多次回应新闻界的采访,并为参选与香港社会各界频频晤谈,倾听香港民众对行政长官的要求,为此,他于10月下旬开始向新闻界透露了他的治港方针,目标是在“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之下,继续保持香港的成功和活力。

董建华做事慎重,不想提早迈步,他说:“按照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步伐,一步一步地去做。”

1996年10月18日,董建华辞去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及行政总裁的职务,前往筹委会秘书处索取参选简历表并正式宣布参加角逐特区行政长官。

为了符合参选条件,董建华将放弃英国属土公民护照及英国国民(海外)护照,他表示,这是人生的一条路,“我有更重要的任务”。

现在,船王董建华已开始了新的航程,而且是在祖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样的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责任编辑 刘家驹)



董建华(右)与香港特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鲁平在一起

斯特朗热爱中国，苏联克格勃生嫉

● 舒 云

一

国际著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斯诺、史沫特莱一样，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她曾六次访问中国，几乎每次都是在中国革命最紧要的关头来到中国。在她 72 岁那一年来到中国后，她决定定居中国。1970 年，她逝世后，被以最高荣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1946 年 6 月，斯特朗第五次访华来到延安，毛泽东在会见她时，发表了举世闻名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谈话，在世界上广泛传播。这一位美国女作家的名字才在中国家喻户晓。

胡宗南的大兵压境延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坚决要求和毛泽东一起转战陕北，她说她可以据此写出一本很好的书。一天晚上，周恩来在自己的窑洞里邀请还在延安的外国人马海德等吃饭，毛泽东和朱德也来了，也邀请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德对她说，你年纪大，部队要东奔西走，没有固定的地方，也没有地方洗澡，到处是虱子和臭虫，你在那样的条件下是无法写作的，写了也没有地方发表。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哭了起来。朱德和周恩来都安慰她。周恩来说，毛泽东决定交给她一份很重要的材料，只有她才能成功地送到国外发表。她像个孩子似的泪汪汪地说，那我的离开对大家都有好处？

在她临离开延安的前一天晚上，她最后一次同毛泽东谈话。毛泽东说，大约两年，我们就可以同外界再一次取得联系，那样你就可以回来。毛泽东还要她不要在莫斯科浪费时间，应该直接回美国去。

她作为最后一批离开延安的外国人到东北

等地旅行采访，她每日撰写的电讯都传到了美国。本来，她预计在上海写完《中国的曙光》一书后，返回美国。就在她订好机票，准备回美国时，接到苏联大使馆的通知，说她一个月前非正式地提出访问北朝鲜的请求已经被批准，她可以途经北朝鲜回国。于是，她从上海坐苏联的伊里奇号货轮到了苏联。

二

她来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她从苏联《红星报》上看到一篇题为《历经两年的中国内战》的文章，最后一句话是：延安不幸的撤退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失败敲了丧钟。苏联的官方认为毛泽东已经失败，他们丢失了所有的城市，没有工业，也没有无产阶级，他们不会胜利的。读了这篇文章使斯特朗感到了一种义愤之情，她想把中国共产党的成就、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公之于众的心情更加迫切。她认为，苏联仍然摆脱不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种思想模式，牺牲成千上万的人来保卫每一寸土地。尽管毛曾经告诉她，要她离苏联人远一点，她还是决心要把中国的形势真相告诉他们。三周后，她的文章在苏联文学报上发表。她没想到这篇文章引起了苏联当局的不快。

1947 年底，她离开苏联到巴黎，见到了中国工会组织的代表刘宁一。刘对她说，周恩来要他转告她，说形势发展比预料要快，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都同意她可计划在近期内返回中国，并请她负责做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的出版工作，说她的散文体的文字风格与毛主席的风格比较一致。斯特朗高兴极了，马上和刘宁一商量到中国的最佳路线。当时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经过香港和国统区，二是走陆路，经过苏联和中国



1965年，周
总理在上海祝贺
美国进步作家斯
特朗80寿辰

的东北。刘宁一认为，她应该走苏联这条路，因为解放后的东北可报道的东西很多，到时她还可以和林彪的部队一起南下。

后来，她又表示希望来年美国总统大选时能留在美国一段时间。刘宁一说推迟来华也没有关系，往后将通过太平洋学会理事陈翰笙或美共的中国籍党员唐明照与她联系。于是，她回到了美国，一面写作，一面做着去中国的准备。

当她提出申请时，纽约的苏联领事馆拒绝给她前往中国东北哈尔滨的过境签证。她又只身来到巴黎，请刘宁一给她写一封进入东北解放区的邀请信。刘宁一给哈尔滨的政府写了一封信，说明她是周恩来特别邀请来的，请将她送往党中央所在地。刘宁一说，你到了莫斯科，去要一张进入东北的火车票就行了。虽然没有正式签证，用这封中英文写的介绍信就行了，这足以使她进入边境到达哈尔滨。

斯特朗途经华沙时，接受了波兰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的采访，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胜利在即的谈话。苏联塔斯社报道了这条消息，全苏联的报纸都对此作了报道。到了莫斯科，她首先去外交部新闻司，说是要一个前往中

国东北的签证，并出示了刘宁一给她的邀请信件。苏联官员问她是否持有中国的过境签证。她说你想要蒋介石的签证吗？我没有，当即与他们大吵起来。不久，她收到一个美国进步人士团体邀请她到布达佩斯出席国际妇女大会的信，苏联外交部马上给了她签证。在布达佩斯，她见到了中国妇女代表团，好多人她在延安就认识，当即邀请她与她们一起从莫斯科坐专列到哈尔滨。她太高兴了，马上打电话给苏联外交部，请他们快点给她办签证，她自己也返回莫斯科作准备。但是，苏联对她穿上无以伦比的中国旗袍出席在苏联的美国领事馆活动表示厌恶，也对她到处宣布朱德的队伍胜利在即更是不那么高兴。

这时候，苏联的报纸上还是没有一点关于中国革命胜利的消息。直到1948年12月初，《真理报》才有一条报道沈阳已经被攻下的四行字的短讯。12月6日，又有一条消息说位于北平南边300英里的徐州，这一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最后防线，也已经落到了共产党手里。她曾经问过鲍罗廷，为什么苏联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保持沉默？既无消息报道也无分析文章。鲍罗廷说，高层领导正在重新考虑对中国形势的

分析,在此期间,报纸不作报道。她说:但是他们正在取得胜利,难道不是吗?难道这不能证明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吗?

出境签证在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以种种想不出来想不出来的理由拖延,甚至说中国当局称铁路上有土匪,不准外国记者去。

为什么苏联对一个美国进步记者如此刁难呢?恐怕最根本的,是苏联对美国人进入东北极端的不高兴,尽管这个美国人是曾在苏联近30年与苏联极友好的美国人,那也不行。苏联想自己一家垄断中国的东北。

这一段时间,她通过国际上的力量,向苏联施加压力,还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通讯社及伦敦的路透社提出要她写一组中国前线情况的连载文章,以便让她到中国。但是苏联仍是置之不理。

到了1949年2月初,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已成定局,鲍罗廷告诉她世界工会联合会已决定下届大会在北平召开。她马上意识到,代表来华的手续只能在莫斯科办理,当刘宁一来到了莫斯科时,欣喜若狂的斯特朗给刘宁一写了一封信,请刘宁一以参加工会大会为由帮她弄到签证。

第二天上午,她见到了刘宁一。刘告诉她,主管边境的那位苏联将军是自己的好朋友,现在正在莫斯科。刘宁一答应尽力而为。

斯特朗大大松了一口气,她马上回去收拾行装。还给苏联外交部打了一个电话,说他们不必为她的请求费神了,邀请我到中国的那位中国同志现在正在莫斯科,我的签证由他来办。晚饭不久她就睡了。10点钟,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把她吵醒,两个佩戴武器的人大步进来说,马上跟我们走,你被捕了。一辆黑汽车把她送到了苏联秘密警察的中央监狱。《真理报》报道了她被捕的消息。审讯时并不承认她是作家,而是说她是记者。在苏联,记者和间谍差不多是同义词。苏联确认她是一个危险人物,宣布她因犯有危害苏联国家利益的间谍活动被驱逐出境。

在辗转回美国的路上,她给中国有关方面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苏联攻击我是间谍,是因

为我一味在寻求去中国的途径。……假如她还能对中国有什么用的话,哪怕是默默无闻,哪怕是与世隔绝,哪怕是受到监督,她都愿意立即前往。她期望能把她最后的10个工作年度——她认为她还能工作10年——用于伟大的中国革命事业。她坚信中国革命将使半个世界改变面貌。

三

被从莫斯科驱逐出境六年后,莫斯科终于撤销了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控告。

得到撤销控告的电话是她坐在洛杉矶家中的书房里,那是1955年的一天,一家晚报来电话问:“你是几年前在莫斯科被称为间谍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吗?你听说莫斯科撤销了对你的指控,说你是无罪的吗?”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太好了。”

第二个电话是《纽约时报》:“我想你知道我为什么打电话?”

“我刚刚接到一个惊人消息,我正在想它是不是真的。”

《纽约时报》说这消息是莫斯科无线电台发出的,说控告是贝利亚搞的,已经被发觉罪名是不真实的。

接着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打来,都是问这件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给苏联驻美国大使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得到正式说明。大使馆的参赞给她寄来了剪报。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把这个剪报读了好几遍,反复想了好几天。应该说它是清楚的和令人满意的。但它没有说贝利亚是错误的和恶毒的或者说是根据上级指示,也没有说为什么要指控,更没有说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撤销指控。不管怎么说,有这个平反的消息就足够了。

1958年,她终于第六次来到中国。10月1日,她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见面。

毛泽东与她握手,对她说:如果当时我们知道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你才能回到中国,就不会叫你离开延安了。

(责任编辑 刘家驹)

华人文杰王方宇在美国

● 甘耀樱

美籍华人书法家王方宇，有一次回国向艺术界的同仁讲演，第一句话就说：“我是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但我又是曹禺舞台上的‘北京人’”。

有着中西方文化熏陶的王方宇，其祖上是专门供应清宫春夏秋冬各色帘子的商人，京城人称“帘子王”。后来皇帝没了，“帘子王”家也败落了，但还可以卖古玩、字画维持生计。王方宇生于1913年，从小喜欢京剧。他18岁那年，看梅兰芳演出，一个人溜到后台去看化妆，竟和梅兰芳聊起天来。王方宇中学读的是教会学校，因为爱好书画，他在著名艺术教育家王云阶办的书画传习所学习。王云阶见他性格活泼，

指导他钻研草、篆，这对他以后全身心投入书法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王方宇1936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教育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了重庆，参加出国留学考试，顺利录取留美。

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后，一次开同乐会，他唱了一出“法门寺”，一位美国人立即走过来向他祝贺，用流利的中国话自我介绍是耶鲁大学中文教授都礼华，并说：“我父亲是传教士，长期在中国，我就是在南京金陵大学毕业的，现在耶鲁大学教中文。”两人从此结识，成了好朋友，都礼华发现他中国传统文化素质很高，又讲的是一口北京话，就邀请他去耶鲁教中文。美国的大学中，哈佛、耶鲁是名牌，而汉语教学水平又以耶鲁为最高。一个中国人能到耶鲁任教，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事。王方宇当时虽然学业尚未完成，却欣然答应，他利用假期前去教课，直到1946年，他在哥大获得教育硕士后，仍在为耶鲁教学奔忙。他编出了一部侧重口语教学的《华语对话》，继而又编出了一套完整的《华文读本》。他还主持改编了汉英《中国话辞典》以及《普通话辞典》。

他在美国留学时，正是风华正茂的年岁，很快引起当时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名家的关注。

1946年，老舍和曹禺受美国国务院邀请到美国访问，他们在聚会中相识，后来又交往了三年。王方宇当时教授中国小说和戏剧，一天正在上课讲《骆驼祥子》，忽然一位朋友把老舍带到课堂来了，在热烈的掌声中，王方宇向学生们介绍了老舍，并请作家本人上了这节课。老舍过50岁生日时，王方宇还和老舍一起说相声逗



本文作者（右）与王方宇合影

乐。老舍曾给王方宇题过：“方圆合度，宇宙洪荒”，将王的名字写进去以示崇敬。

王方宇与胡适的交往更是频繁，他们经常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交换心得，考证版本。

二

在耶鲁大学任教 20 年之后，王方宇于 1956 年转至美国西东大学任艺术系教授，后又任该校亚洲学系系主任。

王方宇自幼爱好艺术，特别是书画，在美国与他过从最密的是张大千。50 年代，张大千到美国后，二人常在一起研讨石涛、“八大山人”的作品。王方宇劝张大千推掉社会应酬，潜下心来作画三年，多创作些好作品。张大千听了王方宇的话很以为然，但住在美国作画三年所需费用巨大，而一时又难以筹到，就向王方宇表示，自己收藏的 30 幅石涛作品，20 幅“八大山人”作品，愿意出让，以筹生活费用。王方宇本来就喜爱收藏艺术珍品，如今张大千肯让出众多“珍宝”，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他虽在耶鲁大学任教待遇不薄，但要一次拿出大笔款项也办不到，于是就下狠心，买下了张大千 20 幅“八大山人”的画，而且只能分期付款。张大千慨然应允。王方宇一下成了拥有“八大山人”绘画作品最多的收藏家。他精心研究“八大山人”绘画后，写成《八大山人论集》。研究中，他发现“八大山人”的书法是“初学欧阳询，40 岁后转学董其昌……形神俱似。55 岁以后学黄庭坚放纵字形，笔划夸张……以及追求王羲之那种晋人的气度”。“八大山人”的理论最主要的是“书画相通”和“文章为人世间的书画”，正是在这些论点的启发下，王方宇开始了新体书法的创造、追求。

王方宇认为，中国书法的最高标准、最高境界是“法自然”。从宇宙宏观太阳系到人体，到微观的一个细胞，他都看成是统一的整体。书法艺术中一点、一划、一字、一行……每一个层次都要血脉贯通，浑成一气，笔法的轻重疾徐，结构的疏密大小，都要有变化；从第一笔开始，一笔笔，一字字，从不回头，延续到底。他还从张旭、怀素、徐渭以及郑燮的那种趋向险绝的草



墨舞

书中，感到了都是从不对称中求得了平衡，形象而又生动。王方宇还认为，无论真草隶篆，从笔画到整幅，都十分讲究把自然界的韵律运用到书法中去，当这种运用和谐成功时，人们就称之为“得天趣”的高品。

王方宇说：“我们正处在变革的时代，许多传统的文学艺术，诸如诗歌、绘画、戏剧、舞蹈、雕刻和建筑等都在不断地求新，唯独古老的书法艺术例外，长期以来无人敢于突破。所以至今无人超过王羲之、颜真卿和柳公权。”

王方宇在教学之余，他潜心钻研，默默耕耘，直到 1974 年，他的书法作品首次参加西东大学艺术系主办的书画展，获得首奖。顿时引起轰动，后又陆续在纽约、新泽西州等地展览，还在纽约公共电视台做过示范表演，影响越来越大。他的作品在日本、新加坡、韩国、瑞士、瑞典、德国、台湾及沈阳等地展出时，获得世界各地艺术家与观众好评。

哈佛大学杨联陞教授说：“王方宇书法，深觉已入超境……”宾索维尼亚大学电子学教授顾毓秀说：“王方宇为中国文化开辟一新战场。”艺术史家、圣约翰大学教授张隆延说：“如摩诘（王维）的画迹，其中有诗。”加州大学教授曾宪斌说：“有太极拳姿势。”夏威夷大学教授、画家曾幼荷：“是从智慧、学识、修养品性的根上滋长

出来,并且时常闪出隽永幽默的火花。”书画家、作家许芥昱:“王方字……好像把中国文字变成一种世界语言。”纽约市立大学教授、系主任、史学家唐德刚:“王方字的书法将成为中国书画史上一绝。”耶鲁大学教授、艺术史家班宗华:“王方字的艺术,生动地展现了世界上最优秀、最古老的文化传统之一,显示了这种艺术形式在20世纪的发展。”

中国书法协会主席启功:“王方字书法不但笔法见功夫,并且别具巧思,看来似是走在时代前端。”书画家黄苗子:“王方字先生把传统的书法现代化了。”

一位女士曾以八千美元买去他一个字。

三

王方字既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又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艺术品种——墨舞。

1976年,肯特中学的美术馆落成,邀请王方字展出书法,他就用一张六尺宣纸,铺在地上,写了“墨舞”二字,作为这次展览的标题。主持者白夫人将王方字的一本新体书法集,送给了以色列现代舞蹈家欧哈达·那哈林。引起舞蹈家极大兴趣,她们和纽约亚洲协会合作,编演了“墨舞”。他们的舞蹈,是以简单的黑白色服装,用人物的形象和动作,配合放映在银幕上的中国书法的神采,表现

书中淡雅飘逸或浓厚、沉重的气氛,使一些不认识中国字的人,领会中国书法艺术的气韵。中国对外友协闻知此事后,于1986年邀请以色列舞蹈家来华演出。中央电视台导演、舞蹈家余琳,早已在钻研王方字的书法,受其感染,她一定要抢在以色列舞蹈团之前演出!于是她紧急策划,自己编导,请了国内著名的舞蹈艺术家:赵青、刘敏等参加演出;请书协主席启功题了片名。经费不足,她连自己买家具的钱都贴进去用了。终于在以色列舞蹈团到达中国的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了中国的“墨舞”。当然以色列舞蹈团热心表现中国的书法艺术也是应受到欢迎的,她们先后在北京、上海、杭州、西安四个城市进行了演出,受到中国观众的热情鼓励。而更出人意外的是,余琳编导的“墨舞”因为有了一流的编导、演员、舞台设置等条件,加上自己对炎黄文化的理解,演出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引起了国内书法界、舞蹈界、文艺界强烈反响,受到高度重视和很高评价。美国亚洲协会“墨舞”表演团领队戈登夫人,看了中国艺术家的表演后,说:“这是我从1979年以来多次来华访问,看到的最美的舞蹈。拍得很好,希望能到美国演出。”不久,余琳又拍了“墨舞”续集。这部专题片,获得全国首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节目奖。“墨舞”还作为经典作品,载入了《中国舞蹈五十年》。

这一切,都来源于王方字的新体书法的启示,他当初是绝对没想到新体书法具有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的。

我和王老在往来通信中,他曾寄我一首题为《方字八十自嘲》的诗:

不堪回顾且前瞻,
虚度八十只等闲。
岂夸伏枥千里志,
卒不过河亦向前。

这首充满豪情壮志的诗,我不禁想起他纽约的书斋取名:“食鸡跖庐。”鸡跖,就是鸡爪。《吕氏春秋》载:齐王喜吃鸡跖,每次要吃一千只才满足。王方字以这命名书斋,就是要以此精神做学问。

(责任编辑 刘家驹)



四

黑天鹅

李准率水师 驱出入侵 西江英军

● 杨肇林

英国殖民者窃踞香港后，利用迫近珠江口的地理优势，不断武装侵犯我国内地。清光绪三十二年，英国一艘轮船在广东省西江的三水县被窃，英国殖民者以中国保护不周为借口，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悍然派军舰侵入西江，开炮轰击沿岸城镇，英国殖民军沿着西江上溯至广西梧州，直入中国腹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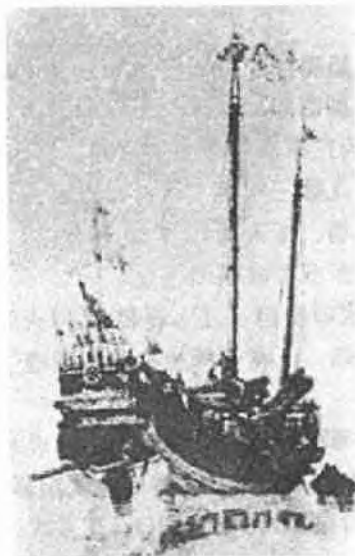
两广总督张人骏一面派人与英国驻广州领事交涉，一面急令被贬的原广东水师提督李准速回广州。

李准，号直绳，原是四川邻水县的一介儒生，光绪十三年他17岁时，因父亲被任命为广东河源县知县，随家来到广东。曾三次赴京应试，都落第。他在北京参加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正赶上中日甲午黄海之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而沉痛的印象。后来，他纳款捐官为记名道台，在广州等地办理赈灾筹款，深得李鸿章的赏识。光绪二十五年，李准29岁，任广东钱局提调，受命为广东厘金局总办。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为了保护税收，保护航运畅通、安全，整顿了原有防营，加造了“广福”等浅水兵轮，又仿湘军水师，建造了二百多艘舢板，在东江上组建了惠安水军，在西江上组建了肇庆水军，在北江上组建了韶安水军，更组建了广安水军，专事防御珠江口“港汉纷歧之地，以辅小兵舰之不足”。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他统巡广东各江水师，在珠江口和东江、西江、北江上征税、缉私、防盗。因与当时担任两广

总督的岑春煊意见不合，谋求调离广东是非之地，以躲避灾祸，得到张之洞等的支持。但岑春煊是慈禧的宠臣，为了他个人在朝廷斗法的需要，倒向慈禧举荐李准。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十六日、二十一日，慈禧和光绪皇帝连续三次召见李准，任命他署理广东水师提督。时过不久，李准突然被贬为北海总兵。李准猜不透获咎被贬的原因，黯然离开广州。原来是岑春煊调离广东后，当面向慈禧太后说李准“威权太重，骄蹇难制”，“必稍加裁抑”。

李准被贬，心灰意冷，以养病为由，住进了法国人在北海开设的医院，他深感宦海沉浮，如履薄冰，从个人身家性命计，决心再“不为此可畏之官”。英军入侵，李准接到新任两广总督的指示，原不拟应命。但是，想起以往在珠江口缉盗，每每受到窃踞香港和澳门的外国军警掣肘，他们纵容海匪越境逃逸，香港、澳门成了海匪躲避打击的渊藪。今天，自己多年巡营的各江，英国人竟然入侵内江，岂能坐视外人横冲直撞、耀武扬威？！于是，束装启行。

李准赶回广州，即刻与侵入西江的英军头目马镇迪严重交涉，要求立即停止对沿岸城镇的炮击，英军舰艇不得在中国内河上自由行动。马镇迪骄横霸道，对于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英国舰艇依然在西江上肆意拦截中国内河船只，掠夺财物。面对英国武装入侵和继续扩大侵略的威胁，广东全境都要求驱逐英国舰艇。清廷也觉“民气可



广东水师大战船

用”。于是，李准调遣肇庆、广安水军的舰艇迫近英军舰艇，加以团团围困，使英军舰艇无法随意行动。沿岸城镇人民和商家，同仇敌忾，奋起对英军实行抵制，入侵舰艇上的英军既买不到必须的菜蔬，连淡水供应也几乎全被断绝。但是，英国人仍然不愿撤离。

李准深知，英国人武装入侵到了内河，仅用言词交涉、抗议是没有力量的。他催促原来订造的四艘浅水兵舰尽快投入西江使用，一面先租用商轮，改装德国制造的武器，立即投入西江巡逻。

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人诉之以理，同英国人据理力争，加之广东水师的有力行动，特别是人民的抗议和封锁，侵入西江的英军十多艘舰艇，不得不于光绪三十四年年底撤出西江，退至香港。

宣统元年六月二十九日（1909年8月14日）清廷“命广东水师提督萨镇冰开缺作为海军提督；以南澳镇总兵李准为广东水师提督”。以后，李准率舰收复被日本人窃踞的东沙岛，并率舰巡视西沙群岛，遏制了法国等外国殖民者的野心，为保卫海疆，维护中国海权做出了贡献。（责任编辑 刘文）

上海滩青红帮元魁

张锦湖传奇一生

● 肖 石

提起上海滩青红帮，他们的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可以说家喻户晓，但若问起位列黄、杜之上的帮会老大是谁？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这位老大性情温厚，颇擅文辞，兼有一身好功夫。他曾护送孙中山先生赴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与孙先生称兄道弟，后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民国初期，他在青红帮中辈份最高，影响最大，故有“军界宿星，帮会元魁”之称。蒋介石、黄金荣、韩复榘等各方巨头，都曾拜在他的门下，而杜月笙则是他的徒孙了。

晚年，他不爱抛头露面，平日深居简出，行踪神秘，一般人很难见到他。他却颇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

你道此人是谁？他便是青红帮“太上皇”张锦湖。

1865年1月，张锦湖（字仁奎）出生于山东省滕县一个贫寒家庭，全家靠他父亲给地主扛活为生，张锦湖进不了私塾，每天放完牛，便跑七八里到表叔家学习武术，果然，经过十几个寒暑的刻苦磨练，把他常使的一把雪亮的钢刀，挥舞如风，威猛异常，人称“张大钢刀”。

1889年，滕县开科考武秀才。

张锦湖不费吹灰之力就中了头名。他便在家乡设馆教习武功，多次率徒成功地打击土匪的抢劫，威震乡里。

就在此时，张锦湖加入了当时的最大民间组织——安清帮。他的师傅叫马风山，是北方会门中的老大。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马率徒弟孙护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避难西安，很得老佛爷的赏识，此后安清帮的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安清帮又名安清道，安清原为“闾清”，是灭清的意思，是明朝遗老山东即墨人杨如来为反清复明而创立的。杨死后，他创立的道派被清政府招抚，从此改为安清。清雍正年间，安清帮承担漕运任务，所以他的信徒便在长江、黄河、运河流域传布下来。安清道徒均有标志，以青布包头者称青帮，以红布包头者称红帮，缘此，安清帮又称青红帮。后来，青帮多从事贩运私盐，而红帮以赌博劫盗为业。

1893年，张锦湖毅然决定以自己一身武功和在帮会中的影响，一展心中埋藏已久的报国救民的愿望。他投身于当时清军海门缉私营管带徐宝山的麾下，当了一名清兵小队长。由于他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屡立战功，不久，他被提升为中队长。徐宝山是个爱才之将，他发现张武功超群，治军有方，颇具将才，就多次向上司推荐，于是很快张

锦湖就升任清军巡防营管带。

1906年，张锦湖所率清兵被编入新军。新军中遍布帮会会徒，也有许多革命志士。同年冬，张锦湖经友人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

二

1911年夏天，辛亥革命烈火燎原，张锦湖专程赴澳门，晋谒他向往已久的孙中山先生，共商江淮流域国民革命之大计。在澳门期间，他与孙先生彻夜长谈，深为孙先生的救国方略和领袖魅力所折服。中山先生陪他进餐，给他介绍一些他久闻大名而不曾谋面的革命志士。

经过一番精心筹划后，张锦湖携中山先生手谕北归，在新军中联络仁人志士，传播革命思想，1911年11月7日，张锦湖在镇江策动清军缉私营起义成功，宣布成立镇江军政府，公开拥护孙中山先生。接着，张锦湖协助许绍楨组织江浙联军近万人，由许任联军总司令，张锦湖任前敌总指挥，开始攻打南京。

这一仗中，张锦湖亲手砍下张勋麾下第一员大将人称“瘟神”韩虎的首级，清军顿时士气颓丧，张勋如惊弓之鸟，狼狽逃到徐州。是年12月初，成立中华民国时，张锦湖自告奋勇，护驾南京。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

布中华民国成立。张锦湖以他在辛亥革命中的突出贡献,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七混成旅旅长,晋授陆军中将,镇守江南重地扬州。

1916年,张锦湖调任通州镇守使,被北洋政府嘉封为杰威将军,晋授陆军上将军衔。其管辖范围包括南通、上海、真如、泰州、崇明、启东及江浙沿海各地,并代理两淮盐运使,还兼管长江水路八百里。

由于张锦湖在东南沿海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那些军政要员、工商界人士、三教九流,甚至地痞流氓,无不凭关系找门路,求人引见,拜倒在张锦湖的脚下,并以此为殊荣。有些人求见无门,只好拜他的徒子徒孙为师,取得庇护。他的徒子徒孙则敬称他为“张老太爷”。据后人回忆,最盛时张锦湖有徒弟3000多人,若把徒子徒孙加起来不下几万人,故当时流传着:“张老太爷吼一吼,半壁河山抖三抖。”

张锦湖任通州镇守使的时候,清末状元、中华民国政府实业部长、南通财经实力派代表人物张謇倡导实业,并以改善农村、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富国强民为己任。张锦湖与他结为知己,从各方面大力襄助,并亲自参与张謇的“棉铁政策”的制定,以通海军政府的名义下令实施。特别是棉铁政策的实施,大大促进了通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此地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成为全国发展近代实业的典范。

三

青红帮发展到清末民初,它的恶势力越来越大,成为当时的一个特殊阶层,产生了像张锦湖这样神通广大的人物,也出现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那样的流氓大亨。

张锦湖是行伍出身,在军界和政界中声势很大。他在军界的门徒职位较高者有:浙江督军卢永祥,山东督军张树元、田中玉,河北督军王

占元,江西督军李纯,淞沪和兖州镇守使何丰林及其弟何丰钰,北洋政府第一师师长蔡成勋,烟台镇守使朱泮藻等。在政界的门徒,如国民党元老杨虎,国民党新军阀韩复榘及地方大员吴铁城、贺贵严、许世英、钱大钧、俞鸿钧和军统头子郑介民等人,还有大汉奸陈群、胡兰城等,都曾拜倒在他门下。工商界则有王晓籁、俞佐庭、秦润卿、盛老三、李祖莱等商业巨头和大老板。

那时候,青红帮会中各门各派的头子基本上都是他学生。如大汉奸张啸林,东南三老中的张飞、张象珍,各省在上海滩的帮会首领吴昆山、陈世昌、高士奎、王亚樵、曹幼珊等数十人。

现在说说黄金荣。黄是浙江余姚人,仅比张锦湖小两岁,从小文不成武不就。1900年,法国巡捕房公开招考华捕,黄金荣被招取为一名三等华捕。辛亥革命以后,黄金荣虽然已爬上法租界巡捕房探长的宝座,在上海滩毕竟势单力薄,经朋友介绍,投在张的门下。

再说杜月笙,原名叫杜镛,上海浦东高桥人,自幼家境贫寒,杜为人聪明机警,满腹心计,就在人的引荐下,正式拜黄为师。从此,两人狼狈为奸。

再提一下另一个更重要人物——蒋介石。蒋介石早年在上海督军陈其美手下当差,与陈的侄子陈果夫、陈立夫及同学戴季陶等人结成拜把兄弟,经常干些鸡鸣狗盗的事。陈其美死后,蒋失去了靠山,便和戴及陈氏兄弟一起,跑到上海物品交易所搞投机生意。由于不善经营投机失败,欠了一屁股的债务,处境十分狼狈。颇有政治头脑的蒋介石决定离开上海,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先生搞政治投机。因逼债者盈门无法脱身,又缺乏路费,蒋就由友人虞洽卿介绍投拜当时已当上法租界巡捕房探长的黄金荣。黄见这笔交易好做,不但破例赠送蒋200块大

洋做路费,而且还引荐蒋拜见他自己的老师张老太爷。请求老太爷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

1925年,张锦湖做60大寿,前来祝贺的军政商巨头、帮会各门派首领有八百多人。张老太爷的大客厅里,一连三日人头攒动,热闹非凡。那时候,蒋介石还在广州任黄埔军校校长,也派人专程赴上海送上一幅他亲自撰写的寿联:“军界宿星,帮会元魁。”时人以为蒋校长的话并非溢美之辞。

熟悉民国史的人大都知道,20年代初,山东临城发生了一件曾轰动国内外的劫车绑洋票大案。这起曾让北洋政府和列强大大伤脑筋的所谓“民国第一大案”,最后以政府招抚有关人员了结,没有酿成悲剧事件。但人们很少知道,案子背后张锦湖的努力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23年5月6日清晨2点30分,由浦口开往天津的2次蓝钢皮快车,在临城至沙沟车站之间,被早已埋伏在铁路两旁的中华建国自治军劫持。车内有中外重要乘客71人,其中外国人39名。这就是轰动中外的临城劫车绑洋票案。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外国公使纷纷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立即采取措施释放人质。

黄金荣借助张老太爷的神威,入鲁仅两三天,便斡旋成功。自治军无条件释放了全部人质。

四

1933年9月13日,号称“山东王”的韩复榘临时决定召开全省军政会议。开会时间已过,而应命莅会的高级将领却只有孙桐萱一人,政务方面的要员则更是十有八九缺席。韩复榘见状大发雷霆,严令究诘原因。

原委很快就查出来了:这天全省军政要员皆赴滕县参加张锦湖长公子的婚礼去了。

韩复榘得悉此情,心想,自己的高级将领除孙桐萱外,几乎全是张锦湖的门下弟子,张老太爷一言九鼎,四方趋之若鹜,今后万一有事,我韩复榘的安危荣辱、兴衰际遇,岂非他掌中之物?

于是,他即刻从济南发急电,一向张老太爷贺喜,二请老太爷大驾光临泉城。并电令滕县驻军的孙旅长为护驾北行。

抵达济南之日,韩复榘身穿蓝袍黑褂,早早地来到车站迎候。张锦湖由韩陪同,坐上他的轿车直达省政府内。大厅里香案上蜡柱高烧,烟雾缭绕;案前绣帷锦垫,富丽庄重。张刚步入大厅,顿时军乐齐鸣,煞是隆重。韩复榘就将张老太爷请入正中宝座坐定,自己则退到下面,毕恭毕敬地行了三跪九磕大礼,随之将预先准备好的门生大红帖双手过顶呈给张锦湖,喊了一声“师父”。

张韩从此就有了师徒关系。

1936年初,日本特务到我国北方四处活动,山东军阀韩复榘在土肥原贤二的威胁和利诱下,签订了拒绝中央军进驻山东,接受日本所谓经济援助的《韩土秘密协定》。

蒋介石对此一时举棋不定,无计可施,戴笠一旁献计:“韩复榘和他的几个师长都是张锦湖的门生,要解决此事非老太爷莫属。”

蒋介石大为高兴,特意派自己的专车赴沪,恭接张老太爷驾临金陵。

在南京中山陵旁的私邸里,蒋介石执弟子礼接待张老太爷,恳请老太爷“移其闲云野鹤之身,北走齐鲁,宣达政府德意,力劝韩复榘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统一为上,并相机釜底抽薪,消弭隐患。”同时表示:“若韩能回心转意,以国事为重,保证即刻增拨协饷,以示慰劳。”

张锦湖听了蒋的陈述,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便满口答应。蒋介石见张如此爽快,急忙派专车送张老

太爷上路。

张锦湖一到济南,韩复榘急忙矢口否认此事,张锦湖微微一笑,也不去深究,只以古哲先贤为例,开导韩万万不可贪图一时小利而饮鸩止渴,认贼作父,成为民族罪人。韩复榘赶紧表白:“弟子不仁,甘当小狗!”

张锦湖在济南逗留了一周。会见了山东境内的众多门徒,其中包括韩的军政要员、各界知名人士,倾吐自己的爱国热情。众门徒们对他的民族情怀钦佩不已。这种做法虽属惯例,但此时此地却起到了断韩复榘的后路的目的。

五

上海沦陷后,张锦湖因年事已高,隐居在法租界内。当时,他已近八十高龄,平日,除黄金荣、杜月笙、吴昆山等帮会头子偶尔登门问安外,一般不接待生客。

1942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日军上海司令官光田恒一得知张老太爷精于武功,欺他年老体衰,想通过比武打击张的意志,迫使他不再为抗日出力。于是,便派人给老太爷送去了一份挑战书。

这光田是日本有名的武士道高手,擅使一柄长剑,在日本曾打败四州无敌手,剑术非常了得。

这天下午3点多钟,光田恒一身穿和服,手提长剑,带着两名武士,以拜访为名闯进张锦湖的寓所。张锦湖已知来者不善,也欲借此挫一挫日寇的嚣张气焰,便道:“老夫一生刀不离手,还真想见识见识日本的剑术,看是中国的刀厉害还是日本的剑厉害!”

在后院的空地上,光田抽出他那把寒光逼人的利剑,叫随从拿来一根碗口粗的木头竖在地上,他双手举剑,大喝一声,挥剑朝木头劈去,木头顿成两瓣。这是显示自己的臂力,想先在心理上把张压倒。

然而,张老太爷连看不看,倒提着大刀微笑道:“别要把戏了,请先生赐教吧!”

随后,两人凝神屏气,只见光田双手握剑,“呀”的一声,步随声进,剑伴音落,身步剑气浑然一体,朝张的头顶劈下去。张锦湖不慌不忙,在利剑快要劈着头皮时,他才把身躯向右一闪,对方扑了个空。同时,张顺势用刀背在对方剑上着力一击,使对方的剑猛朝地面下沉,然后他疾速来一个“苍鹰旋翅”,横抹对方颈项。光田见状大惊,急忙后退脱身。而张锦湖却已紧贴对方,把他逼向墙根,此时,光田已无法再使剑了。张老太爷见光田已败,便半开玩笑半讥讽道:“光田先生,你怎么如此小气,不肯把日本剑道的‘精诣’赐教老夫呢?再试一回,务必大方一点喽!”

稍息片刻,两人再次交锋。几招过后,张锦湖来了个“仙人指路”,用刀尖直指对方前胸。光田慌忙闪身回剑劈张的手臂。张锦湖一个挽手躲开剑锋,随即用刀柄闪电般点击对方腕部。只听“咣啷”一声,光田痛得情不自禁地撒手丢剑,羞得满脸通红。张锦湖急忙拾剑递给光田,说:“老夫失手,多有得罪,请再比试一次。”这一次,光田恒一说什么也不干了。

张锦湖捋着胡须,笑道:“还是回去再练上几年吧!”

光田恒一向张锦湖深深鞠了一躬,说道:“张将军果然名不虚传,敝人敬佩!敬佩!”说罢,领着随从灰溜溜地走了。从此,日本特务再也没有找张闹事。那年,张锦湖已是78岁高龄。张老太爷宝刀不老,在上海滩技惊敌酋,国内报刊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

1944年12月24日,张锦湖与世长辞,终年80岁。

(责任编辑 刘家驹)

百岁剪纸艺术家胡家芝

● 王明永 许康波



剪纸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一枝十分古老美丽的艺术花朵。早在商代时，就有把金属锤打成薄片进行雕刻成花纹的工艺。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剪桐封弟”的故事。巾帼英雄花木兰“对镜贴花黄”，指的也是在额部贴上一个剪影的花纹。这些，都说明在纸发明前后，这种艺术式样已经相当普遍。各种喜花，又以江南民间最为盛行。自明清以来，一直经久不衰，并产生了不少优秀的民间艺术家，她们在民族剪纸艺术的百花园中，表现出了无比卓越的才华。她们创作的一幅幅如意吉祥、美丽动人的喜花作品，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美的享受。

胡家芝 1897 年 1 月出生于浙江富春江畔桐庐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胡传泰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叔叔是名画家。著名画家叶浅予是她的表弟，是她童年的伙伴，叶老说他小时画画是深受表姐的影响，直到去世前的半年里，还来南京向表姐学习，并为表姐的剪纸艺术展览题了词。胡家芝 16 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县立第一女子学校。她从小就聪慧手巧，在家庭的艺术熏陶下善刺绣，爱描绘，更精于剪纸。以

前桐庐一带盛行一种风俗，每逢喜庆节日，老一辈的大娘总喜欢剪些“喜花”、“礼花”、“窗花”、“灯花”和“鞋花”，以增强欢乐的气氛。为此，每逢亲友婚嫁喜事，人们总要邀请小小年纪的胡家芝制作各类剪纸。胡家芝总是热情地操起剪刀，用这种独特的艺术语言抒发自己的情感。那些花样，团团簇簇，层层套接；祥禽瑞兽，吉意无穷。她善于创造，常以人民喜闻乐见的谐音隐喻、借物寓意的象征手法来表现，含意巧妙，耐人寻味。如送给新郎新娘的《鸳鸯双喜》剪纸，上面一个大双喜字，下面一对鸳鸯在荷塘嬉戏，亲密和谐的情景，十分逗人喜爱，旁边衬以如意、万年青、并蒂莲、蝙蝠、寿桃，以梅花形作外框。一经她这样的艺术处理，使内容含意更丰富、更富有联想。就这样，16 岁的胡家芝便成了闻名乡里的剪纸能手，还被大家称赞为传播美的“小福星”。

1952 年，她随子女迁居南京，在城市生活和新的文化环境中，不断吸收各类艺术营养，从民间美术各种不同的风格中丰富自己的剪纸创作。因此，作品在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取得了新的发展。胡家芝创作的喜花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在塑造作品的形象时，十分着重注意刻画形象造型的艺术性和完美性，无论是一朵花，一种果实，还是鸟禽、树木或图形，她都以最简练而生动的剪纸手法，剪裁得栩栩如生，表现出无限的生机。由于造型精致而又善于在构图和组织中富于变化，所以每幅作品均能取得极大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这种以写实和会意相结合的图案造型能力，成为胡家芝剪纸独特的“语言”，故而她的作品质朴而雅致，富丽而隽秀，经久耐看，特别惹人喜爱。

剪纸艺术离不开活跃的思维。老人在空闲

时,总要研究他人的剪纸作品,取其长,吸其精。一旦开始创作,老人便宁心静神,沉浸于形象构思中,待想法成熟,立即将构思畅流于纸笔之间,斟酌再三,方才敲定。剪纸本身是线条的运动,须正其身,竖其背,回其腕,脑、手、眼,三位一体地指挥线条的运动。这种全身心的运动,更促进了老人的思维。老人对自己的作品爱凝神观赏,好似进入了一个美妙仙景。

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她抚今追昔,激情满怀,思绪万千,创造了一幅“万寿无疆”即祖国万岁的剪画,构思了一个大寿字围在百花丛中,寿字的空当中,又剪了12个谷穗,象征着我们的祖国五谷丰登万年长青。展览会上,这幅剪画受到了中国美术专家的一致好评。

1962年7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吴山教授《巧心、巧手、巧安排——谈胡家芝的剪纸艺术》一文,全面评价了胡家芝的剪纸艺术。文章说:“巧的构思,巧的安排,巧的剪技是胡家芝老人剪纸的最大特色。”“……作画要求‘意在笔先’,……她的作品里,内容的组织和用途的结合,总是那么恰如其分,巧于组合。”

1987年3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主办的《中国民间工艺》杂志第三期,刊登了胡家芝剪纸专页,发表《喜上眉(梅)梢》、《美满民间》、《鸳鸯戏荷》、《荷花金鱼》、《万象更新》等作品和胡家芝简介,同时发表了著名画家叶浅予教授《关于民间美术的一封信》。在

给胡家芝的信里,叶老叙述了童年的回忆后说:“由于你的启发,喜爱造型的细胞在我身上发了芽,因而当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学画时,我乐于提起这件事,认为你是我的启蒙老师,你是我走向艺术的引路人”,“1962年在南京见到你,我们都已白发苍苍,然而我们对艺术的追求仍然锲而不舍,你的剪纸艺术早已誉满江南,国家出版社将为你出版专集,你的作品必将培育和催发更多更多的艺术细胞,使之发芽开花。”

已是百岁的老寿星,思维依然敏捷,视力很好,剪纸看书看报不戴眼镜。100岁,胡家芝仍然精神矍铄,她长寿的秘诀何在呢?

他的儿子振藻说,老人心胸开阔,待人和善,她的剪纸艺术虽然高超,但她从未因剪纸而索要过一分钱,凡抱着其他目的花多少钱也不走,凡是心地善良的人和她要,他总是毫无报酬地送给客人。她对记者说:“永无止境的追求是我长寿的主要原因。”她整个身心都沉浸在美的创造中,每天,她除了做点切菜等力所能及的家务外,然后就坐在书桌前看书学习,构思创作、剪裁,在艺术王国的遨游中新地平线不断展现在她的面前,墙上那个镜框就是她不断更新艺术的见证,每剪一幅喜花,她便高悬镜中津津有味地欣赏,仔仔细细地琢磨,在认真总结的基础上再构思更新颖的喜花。

(责任编辑 刘家驹)



万象更新



美满民间

一个刊物,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也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炎黄春秋》能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让我们高兴,让我们振奋,更让我们感到今后的担子很重。本刊创刊五周年纪念时,我们陆续发表了各界知名人士的题字或贺词,本期再从近期报刊中选出几篇有关本刊的评介文章予以转载,主要目的在于立此存照:看我们今后是否发扬了自己的优良,既往的缺点克服了多少,又以哪些新进步来回答读者的希冀。

有空不妨翻翻《炎黄春秋》

● 于光远

《炎黄春秋》是发表我国当代历史,特别是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和建设历史的文章的刊物。不久前庆祝了它的创刊五周年。

在庆祝这个刊物五周年的时候,我感到这个刊物很值得更多的读者去重视它,不论从事什么专业的人,每个月从这个刊物里都会读到若干篇使其喜欢并得到教益的文章。我有时也在这里写些回忆过去的文章,当然对它也就更加关心。

在庆祝它创刊五周年的会上,我念了一段我几年前在这个刊物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这一段话是:“历史上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化的。这也是历史发展的一条规律,这种不可避免的,自然而然的淡化是一回事,而通过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使得那些不该淡化的东西淡化得慢一些是另外一回事;而有意使某些事实人民头脑中淡化起来,则又是一回事。应该把三者区别开来。”“我喜欢说一句话:‘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将来’。”“该淡化的东西就让它淡化吧,不应该淡化的还是要通过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让人们记得牢固些。”这里说的“该”或“不该”是从社会未来发展需要来判断的。

我的这样一段话是想说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意义。历史教育的任务就是让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多了解一些不应该淡化的历史,从中得到教益。而这种历史知识是经过历史研究,检验它的准确性,并

经过历史研究明了它的意义所在。

历史教育需要在课堂里进行。在我国的小学、中学(包括初中和高中)不仅应对我国古代、近代的历史要很好地进行教育,对于当代的历史也要给予高度重视。我国当代历史中有不少是不应该淡化的,对中国人民的教育太深刻了,而且已经作了总结,有权威性的文献可以依据的东西,应安排在学校历史课中。

但历史教育仅仅靠课堂教育是大大不够的。时间不够是原因之一,同时离开学校之后,人们还有学习历史知识、历史经验的必要,即使

上了岁数的人也应多学一点历史,我自己就有这种要求。所以,以历史教育为内容的书刊也就十分重要。

《炎黄春秋》并不直接为历史教育服务。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对某一段历史有深切的研究,甚至是作者亲身经历的文章,它对于历史研究可起到提供研究资料的作用,同时它也可起到在广大读者中普及历史知识的作用,深得读者的欢迎。它也能对教师们阅读和消化后丰富课堂上历史教学有所帮助。加上刊物又重视文学的功用,不少文章写得生动具体,更可以使读时得到文学方面的享受。总之,我认为这是一本值得读一读的刊物。

(原载 1996 年 11 月 3 日《羊城晚报》,11 月 23 日《团结报》。作者为著名社会科学家,曾任中顾委委员)

《炎黄春秋》炎黄情

● 张黎群

《炎黄春秋》于我,已成知交。自创刊号起就每期在手,不经年便自费订阅而迄今。遇有认为意义重大的文章,还增购多本作为礼品相赠。例如,刊载“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那期,我买了 200 本,送给江西省共青城的老共青团员。

本人可算得上“老青年报人和老青年工作者”,有责任向青年推荐好的读物。1994 年我发现香港出版的《双飞记》,于青年特别有益,便以《向全国青少年推荐这本好书》为题,作为内地版本的“代序”,该书为共青团中央所认可,已纳入推广的 100 本好书之一。

《炎黄春秋》应该作为知识青年读物的理由,根据我长期阅读的体

会认为:它的文章注重真实,富于科学性;注重读者求知愿望,提供近代史中有影响的人和事,叙事清楚明白,评点正确,时有新意。所以,对于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用得着“开卷有益”这句话。

再进一步说,当代青年应当学点历史知识,特别是近代革命史,《炎黄春秋》刊载这方面的文章,有相当的篇幅,它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不断地看下去,使我们受到良好的生动的历史熏陶,它是学校历史课的课外“辅导员”。

(原载 1996 年 10 月 16 日《新闻出版报》,11 月 3 日《中国青年报》。作者为《中国青年报》第一任社长兼总编)

我们的看法应该一致

● 李 庄

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爱国,进而爱革命、爱共产党、爱社会主义,这是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和近代历史发展铸成的。

中国现代史是一部受屈辱、受欺凌、充满血泪的历史。知识分子接触信息比较多,敏感、清醒,面对祖国危难,走出书斋,矢志救亡,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代不乏人。

有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了,许多知识分子移居国外。新中国建立,我国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有一段时间,不少知识分子遭受极左路线的批判和迫害,一旦平反,更加热爱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的外国朋友难以理解这种现象,我认为这正是显示中国知识分子之为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识大体,顾大局,善于用历史发展眼光看待一切事物。

许多知识分子成为《炎黄春秋》杂志的挚友,我认为就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素质同这个刊物的风格完全一致。

《炎黄春秋》创刊已经六年,发行量稳步上升。她坚决执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选题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迄今我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人、事,思想性、政治性、可读性结合比较好。有些事情,许多革命老干部经历了,但不悉其详,或不明其故;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知识分子更愿意了解许多重要人、事的内情。《炎黄春秋》受到广大读者,首先是这些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读者欢迎,是很自然的。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个刊物登载的一些文章涉及新中国建设的某些起伏,谈到有的决策失误,介

绍个别冤假错案的平反,似乎同通常理解的正确舆论导向精神相悖。我认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着眼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全面、客观地介绍某些历史人、事,正是坚持正确舆

论导向。在我们这么一个拥有多少亿人口而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进行前无古人的革命和建设,要求事事如意,不犯一点错误是不可能的,只要不是指手划脚,唯尚空谈的“批评家”,而是以人民利益为重,老老实实总结经验,以便把事情做得更好的革命者,是不会拒绝这么做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应该一致。

(原载1996年11月13日《中国老年报》。作者为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

说说《炎黄春秋》

● 李 普

这份杂志创刊五年了。说良心事,当初我不是积极的支持者。我担心他们很难长期维持下去。

一位朋友竟有同感。他还在台上,熟悉行情。他说,现在办杂志,第一要有上级拨款;第二要有一批直属单位和许多管得着的单位,你叫它订多少份,说一不二。这两条,《炎黄春秋》有吗?对不起,她没有。

但是,她不仅维持下来了,而且站住了。她别无依靠,只能靠市场上的上帝。她的销数已经接近七万份,都是靠那些上帝们自掏腰包。

在庆祝创刊五周年的集会上,新闻界老前辈温济泽说,他每期必看,而且全家老少都看。我跟一位朋友谈起他这种勤奋认真的精神,这位朋友又告诉我一件有关《炎黄春秋》的事。他的邻居中有一位老人,看了最近一期上日本学者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认为那篇文章有分量,想买几本送给朋友们。他跑了两家书摊,回答一样:老先生,您来晚了,卖完了。

上帝之所以为上帝,是他们先要看货色,才肯慷慨解囊。我也是上帝之一,每期到手,先翻一翻再说,这就远不如温老兄了。不过,每期总有三几篇吸引我看下去,使我

受益不浅,或者增加了知识,或者振奋了心志,或者激发起义愤。例如今年登载的香港的历史,1958年那条“总路线”形成前后的争论,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以及萧克老将军的读书笔记,都是给了我很多启迪的很好的文章。

说到萧克老人,这位令我深深敬仰的老前辈,照我看来,应当说是这份杂志的灵魂和支柱。听说有些很好的文章,是有赖他的支持才登出来的。写到这里,我忽发奇想,如果没有萧老,我们能看到如今这样的《炎黄春秋》吗?

这本杂志以介绍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主,我有两点希望。第一是把时间的跨度伸长些,往远伸到明清两代及其以前。特别是第二,把内容扩大些,从着重政治扩大到文化。我国历史上,有许多重大的文化事件和文化巨匠,可以给我们许多极有价值的启迪和鼓舞、经验和教训。我们不可以不知,不可以忘记。最近读了《陈寅恪最后的20年》,尤其感到这两点十分重要,不知《炎黄春秋》的各位编者和读者先生和女士以为如何? (原载1996年11月8日《书刊文摘导报》。作者为著名记者,曾任新华社副社长)

炎黄春秋



黄炎培（左）、叶剑英（中）、蔡元培（右）



1931年的上海大同幼稚园。前排左五为李锐，二排左一毛岸英，右二毛岸青，右一毛岸青，后排左二李力，左三李锐。

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

红四方面军铁流三千里

老科学家陈芳允60岁入伍

李立三和他失落的女儿

“保钓号”保钓吟悲歌

上海滩青红帮元魁传奇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4.00元